



## 北京師大女附中·文革專輯（三）

### 編者說明

2010年4月28日《記憶》第47期刊發《北京師大女附中·文革專輯》（一），發表了葉維麗的《好故事未必是好歷史——我看卞仲耘之死》，馮敬蘭、劉進等人的《也談卞仲耘之死》等文，引起較大的社會反響。2010年5月23日《記憶》第49期刊發上述《專輯》（二），發表了朗鈞、馮敬蘭、王里、王銳、王容芳、葉志江、童話等人的文章，以及丁東、范世濤、可父等人的來信。一時間，輿論沸騰，詰疑騰於眾口；責斥踵出，風議遍及海外。與此同時，函電交馳，來稿紛至。本刊遂定於同年8月推出同題《專輯》（三）。

就在諸文已備，正待出刊之際，意外發生，編者束手，不得不壓下來稿，停發專輯。經過一年零五個月的等待，此話題終可重啟，此專輯卒底於成。今後，本刊仍將關注相關討論，並願意為各種觀點的理性聲音提供平台。

## 《记忆》八十期目录

### **【特稿】**

宋彬彬：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

### **【访谈】**

本刊特约记者 面对历史的责任——刘进访谈录

### **【往事】**

张亦鸣 从卞仲耘之死说起

刘 进 给梅树民老师的道歉信

### **【评论】**

叶维丽 从女附中“八五”事件谈起

梁幼志 政治符号与被符号——大寨、陈永贵、邢燕子、宋要武

韦 陀 谣言是怎样炼成的？

乌扎拉 文革研究杂谈

### **【争鸣】**

鲍国芳 关于童话《回答质疑》的回复

### **【书评】**

叶维丽 与安迪·沃德商榷——关于北师大女附中的文革

### **【文摘】**

莫 力 对红卫兵不能混为一谈——兼谈卡玛《八九点钟的太阳》

马悲鸣 宋彬彬杀人比赛之谜

乔海燕 红袖章，白丝带——八一八祭

敏一鸿 追究卞仲耘惨案真凶

方影竹 关于一则比赛杀人传闻的辨正

### **【网文选登】**

徐 军 迟来了四十年的道歉

### **【网络言论】**

谁该道歉？谁是受害者？谁是害人者？

## 【特稿】

## 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

宋彬彬

文革爆发至今四十多年过去了，面对社会上关于“宋要武”的传说我一直保持了沉默。一方面是因为传说不等于事实；另一方面我深知自己无论说什么都只会引起更大的波澜。想到文革中那么多人受到冤屈、迫害，甚至致残、致死，和他们相比，我这又算得了什么，不说就不说了。近几年，为了搞清楚在那个年代、在那一天，在我们身边究竟发生了什么，许多人站了出来，从不同的角度记述或讲出自己的经历和反思，渐渐复原出当年的真实面貌。作为当事人的我也问自己：在那些天我做了些什么？我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在寻找真相和反思自我的过程中我最终明白，再继续沉默，不仅是对历史不负责任，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那些因说了真话而直面社会质询和责难的校友们的伤害。我应该讲了，哪怕风波再起，哪怕再次面对灵魂的拷问。我相信，这已不是四十年前。

## 一、关于两宗“罪行”

综合各种文章和传说的内容，我的“罪行”大体归结为两宗：一是文革初期组织过红卫兵的杀人比赛，自己亲手杀了七八个人。二是1966年8月5日下午北师大女附中（简称“女附中”，现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下简称“实验中学”）部分学生游斗校领导发生了暴力行为，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不幸遇难。我被认为是施行暴力的“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

第一宗罪名，早在1966年大串联期间就开始在各地传播并广泛流传、形成文字见之于多种书刊杂志，比如某著名学者在其《自撰年谱》中就加以引用。但也有文章表述了不同的看法。2008年，原北京十一学校的一位老师撰文指出，他若干年前所写文章中提到打死七八个人的学生，并不是宋彬彬。

第二宗罪名，虽然在80年代实验中学已经为我做过明确的组织结论，说宋彬彬在学校文革中没有打人和暴力行为，但此结论无人理会。90年代以来，在一些文革研究者的笔下，我成为“八五事件”的责任人。这个说法更被国内外多人援引而逐渐扩散。2002年美国出版的一本严肃的学术论文集中有一篇文章也

持类似说法。我觉得不能再回避了，从此时起，我开始认真地回忆和整理我在文革初期的经历。

2003年春，我给刘进打电话说起这个想法。之后，我开始找同学了解当年情况，帮助自己回忆。2006年，我和一些同学集中走访了不少老师、校友，后来还开过几次座谈会。在我们班（女附中66届高三3班）两次班级座谈会上，十几位同学敞开心扉，从文革前的教育、切身的感受一直谈到文革初期学校发生的几件大事，她们具体、生动的叙述唤起我不少记忆。还有校友找出了文革时期的笔记或给我写了文字材料，有的校友和我一起做了多次的交流，帮助我回忆、梳理、分析。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基本理清了自己文革前的思想状况和文革开始后头三四个月的经历。

## 二、 文革前后

1960至1966的中学六年，我都是在女附中度过的。上初中时大家都很简单，除了上课，脑子里没有别的，就是玩，直到初中毕业我连入团申请书都没写过。1963年我升入高中后，学校阶级斗争教育开始明显加强。虽说有“讲成份但不唯成份”的阶级路线，但团内还是做了在发展工作中贯彻阶级路线的报告，要重点培养干部子弟。在团组织的帮助下，我高一入了团。入团后，我觉得自己政治上比较幼稚，所以愿意和比我成熟的同学接近。那时我每天给刘进补习俄语，因为她一贯反对同学中的骄娇二气，反对干部子弟特殊化，在早锻炼和劳动时特能吃苦，还敢于在课堂上提问题，所以我对她的印象很深。我觉得要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应该像她那样自觉锻炼。那时，我们班组织过不少活动，像从学校步行去爬鹫峰，给革命母亲夏娘娘扫墓，请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讲革命故事，等等。我们每天学毛选，以古今中外的英雄人物为榜样，批判头脑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雷锋的很多话成了我们的口头语：“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还有王杰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班里同学的思想也很活跃，大家常在政治课上提出各种问题展开讨论，不清楚就问老师，但课任老师经常回答不了，于是学校派教导处副主任梅老师教我们班的政治课。

1966年春季开学后，报刊上的批判文章不断，给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那时我们高三年级已经学完了全部高中课程，进入复习备考阶段，可我们无

法静下心来学习，觉得不让“江山变色、国家变修”比高考更重要。1966年4月我入了党，学校16名学生党员组成了学生党支部。当我们得知，1965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背景下，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发生学潮的消息时，都很羡慕，认为他们提前经受了阶级斗争大风大浪的考验，希望女附中也能有这样的机会。在学生党支部会上，大家热烈讨论国际、国内形势，积极分析什么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表现，对我校在贯彻教育方针上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还和负责学生党支部的梅老师展开讨论或辩论。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那天一早，高三的学生党员刘进、马德秀来学校找我（我是住校生）。刘进说：“现在党号召了，咱们原来提的意见可以说出来了，你愿意写大字报吗？”我想，这是保卫党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的斗争，这些意见在支部也讨论过，因此当即表示同意。我们连草稿都没有打，三人边说边由刘进写在旧报纸上。她签名后，我和马德秀也签了名。现在我已记不清楚大字报的标题和具体的措辞了，只记得是对学校不让我们高三学生参加运动有意见，说学校教育路线上有问题。近年，有几个同学回忆起大字报的题目是“校领导把我们领向何方”，开头的一句话是“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学校一心想引导的是让我们进行高考复习……”大字报贴出后，学生们议论纷纷，迟迟不回教室上课，有不少人也开始写大字报声援。学校一下子乱成这样，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有老师批评我们这样做是“反党”，校党总支的老师也害怕我们滑向右派学生。当天下午他们在一间大阶梯教室里帮助教育我们，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贴大字报就是反党。6月3日晚，团中央的几个干部来到学校，他们说我们贴大字报做得对，做得好，坚决支持！还说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好学生。听到他们的肯定，我们激动得热泪盈眶。

6月4日，由团中央干部组成的工作组正式进校。上午，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传达了北京市委提出并得到中央批准的八条意见，<sup>1</sup>强调要把全校师生团结在党团组织周围，有序地开展文化革命，不要搞过激行为，让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文化大革命，把学校的运动深入下去。听到这些话，我心里踏实多了，觉

<sup>1</sup> 八条要求：（1）大字报要贴在校内；（2）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3）游行不要上街；（4）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5）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6）注意保密；（7）不准打人、污蔑人；（8）积极领导，坚守岗位。摘自郑洗《共青团历史上的人和事》中国少年研究中心，青运史研究文库，2005年内部出版，第219页，

得有党派来的工作组，学校乱的局面就可以扭转过来了。工作组进校后，我们每天都忙忙碌碌的，但具体忙的是些什么多已记不清。经过这几年的调查了解，忆起了一些，特别难得的是一位同学还保留着当年的笔记，据此我整理出以下记述。

6月6日，在工作组的主持下成立了“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其中学生代表会（简称“学代会”）主席是刘进，副主席4名，我是其中之一。我们分头负责，把工作组开展运动的要求布置给各年级的核心小组，年级再布置给各班的核心小组。每天还要收集执行情况向工作组汇报，大家天天十几个小时地忙碌着，也不知道累。教师代表会只有两名老师，由他们负责组织老师的学习和写大字报。不久，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学生都在本班教室按布置的计划来学习毛选和党报社论、写大字报，下午在校园看大字报。

6月17日，学校贴出了第一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学生立即分为保、反两派，聚在宿舍楼前展开大辩论。当时，我们学代会的同学都不同意她们这种作法，认为工作组是党派来的，运动也在有序深入，对工作组有意见完全可以提出来，为什么非要贴大字报呢？6月21日、22日，工作组在大操场主持召开了两个半天的揭发批判会，主要是批判以卞仲耘为首的校领导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会上，一位管过人事的老师揭发卞校长是假党员，激起了学生的愤怒。随后，校外人员袁某带着儿子和母亲在工作组没有允许的情况下哭喊着冲到台上控诉卞校长有生活作风问题。她们边哭诉边揪打卞校长，会场一下子就失控了。几个原来站在台上拿木枪的高年级同学开始用木枪捅打卞校长，还不断有学生、老师跑到台上喊口号质问、推打，卞校长当时就吐了。揭发出卞校长的这些问题让师生感到惊讶、气愤，但是出现打人的混乱局面，我觉得这不符合中央八条，即便是出于义愤也是不应该的。6月27日，出现了第二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这一次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6月底，工作组在全校公布了“卞仲耘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7月初，女附中被划为四类学校，卞仲耘和胡志涛两位校领导被划为四类干部。全校师生集中对卞、胡等校领导的所谓罪行“梳辫子”、深批深挖。工作组除了具体安排运动进程外，还提出了“边学习、边议论、边揭发、边批判”的口号，学生按班级每天半天学习、半天揭批。一位同学当时的笔记记录了6月底传达了李雪峰、胡克实的报告，布置的讨论题有“放手发动群众和加强领导的关系”、“文斗和武斗

哪一个水平高”等等。

7月5日上午，胡启立、张世栋（女附中工作组组长）带着刘进和我到中南海向邓小平汇报学校运动情况，卓琳也在场。当时主要是工作组汇报，邓插话或集中讲几点。很多原话我已记不清了，记得最清楚的是听到袁某带人冲会场时，邓当即说这是个坏人。邓强调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尽快恢复党团组织正常工作；一定要制止在校园出现红卫兵组织；恢复团组织的办法就是把学习好、思想好、有影响和号召力的学生吸引到团组织周围，让闹事的没有领头人。还说要和反工作组的同学辩论清楚这些问题，缺席辩论也可以；说运动每发展一步都要排队分清左中右；还说哪里有那么多修正主义，一个学校顶多一两个，要抓紧解放大部分的干部和教师。当天下午，张世栋在全校讲话，号召开展“要不要和工作组争夺领导权”的辩论，辩论进行了三个半天。那几天满校园贴的都是批驳反工作组同学的大字报，有些同学还被追着打骂，一些人回到家里还有家长找谈话。

7月20日前后，大部分同学去邢台军训；少部分从高年级各班抽调的同学参加对校领导和教职员工的集训；一部分所谓有问题的学生还被安排到郊区农村劳动。我参加了集训。集训是按照“四清”的方式进行的，当时把所有教职员工都编成小组，先自己做准备，准备好就在小组发言，由学生主持小组会帮助他们，让他们早点“洗澡、下楼”和争取重返讲台。

集训开始不久，传来了毛主席批评工作组的消息。

7月29日，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李雪峰在会上宣布了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30日下午女附中工作组宣布撤出学校。那几天听的最多的话就是让学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还说革命就是要“运”，要“动”，要靠自己。虽然我知道这是中央的部署，可撤了工作组的感觉就像找不到组织一样，我搞不明白自己怎样去“运动”，不明白工作组怎么就成了阻碍文化革命运动的消防队，也不明白我们跟着工作组走怎么就犯了错误。

8月1日军训的同学返回学校时，校内外已出现血统论的对联，校园里很乱。当时有不少干部子弟为对联叫好，认为是长了“红五类”的志气；但也有说这样刨个三代四代，咱们“红五类”也要变成混蛋的；更多的同学因感到喘不过气来的压力而沉默。在辩论对联时，我觉得它不符合党的“重在表现”政策，不利于团结大多数，对这种霸道和咄咄逼人我很反感；但有不少人说它客观上起到推进

运动的作用,而且矫枉必须过正。在对联问题上,我是有困惑和有保留的,但我没有公开质疑。

工作组在校期间,少数反工作组的学生已游离于校外,并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红旗”。工作组撤离后,“红旗”的骨干学生回到学校。据初三和高三几位同学回忆,原来“红旗”的骨干学生于7月31日在食堂布告栏贴出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的大字报。党中央、毛主席肯定了反工作组是正确的,她们成了革命的左派,而我和原学代会的成员都跟着工作组犯了错误,成了“保守派”。对于下一步运动应该怎样搞,学校的形势会怎样发展,自己应该怎么办,我感到很迷茫。

8月5日下午,发生了因本校学生的暴力行为导致卞校长死亡的严重事件。我事先不知道要游斗校领导,事后了解是高一部分学生发起的。那天下午,刘进、我和一些同学聚在东二楼原工作组的办公室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几个初中学生跑来告诉我们有人在大操场打人了。刘进、我和几个原来学代会、核心小组的同学赶快跑到操场,看到卞校长等五个校领导被学生押着游街,他们有的拿着簸箕,有的头上扣着纸篓,脸上身上都很脏。我们劝她们不要打人,她们说,现在工作组撤了,“黑帮”都神气了,今天让他们游游街有什么不对?!我们说,不是不让斗“黑帮”,但斗“黑帮”也不能打人呀,打人不符合党的政策。她们不说话了,我们让围观的同学散开后,就回东二楼了。后来,低年级同学又来告诉我们说后操场上打人了,刘进和我赶去,看见后操场聚了不少同学,校领导被人逼着挑土,筐装得很满,挑不动就要挨骂挨打。刘进和我劝告那些监管校领导的學生,说劳动就是劳动,一定不要打人,筐那么大,他们的确抬不动。看她们没有表示异议,我们就离开了。

8月5日傍晚,又听说卞校长躺在后操场,人快不行了。刘进、我和一些同学赶快跑到后操场,当时李松文老师也在场。刘进让工友打开了后门,大家一起用手推车把卞校长推到邮电医院。起初大夫不敢救,说是“黑帮”分子不能救,于是我们和医护人员发生了争吵。刘进说必须抢救。据一位同学回忆,我当时说共产党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俘虏还要优待呢。据李松文老师近年回忆,医院要求出示学校证明,但当时不可能开具这样的证明,李老师说是否可以签名作证?医院同意了,并说必须有老师的签名才行。于是李老师说带头签名,并征得几位在场高年级学生(包括我和刘进)的同意,写下了6个学生的名字。李老师说把签字

的纸条交给大夫后，医院才开始抢救。一个多小时后，卞校长抢救无效死亡。

近年来我听到一个说法，说我在事发后对卞校长的丈夫王先生说，我从远处看到了卞校长躺在宿舍楼前。我不记得与王先生交谈过有关卞校长之死的事。我曾找了一些同学、老师询问，她们对此也没有印象。所以在这里我只能说，我确实不记得有这次会面，也不记得在文革中与王先生有过其他个人接触。

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和看到这种场面，我很害怕，也很紧张，卞校长问题还没有定性就被打死了，这可怎么办啊。刘进说应该赶快向市委汇报，于是我们和一些还在医院的同学连夜走到北京饭店去找市委领导，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接见了我们。吴德听了汇报后半天都没有说话，后来才慢慢说的。刘进和我都记得他说的大意是：这么大的运动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也难免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人死了就死了……你们不要担心、害怕，回去注意保密，不要扩大影响。

走回学校后，大家心里很乱，几个人坐了一夜。我们刚跟着工作组犯了这么大的错误，还不知道怎样才能继续参加运动，学校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现在虽然上级讲话了，但“这么大的运动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该怎么理解？“人死了就死了”该怎么理解？我们又该怎么办？但无论怎样，应该尽快将卞校长死亡的消息和吴德讲话传达给全校师生。刘进是原学代会主席，她说就由她来说吧。第二天早上，刘进通过广播向全校宣布卞仲耘死亡的消息，传达了吴德的讲话，包括那句“死了就死了”，还说以后不许打人了。

在那些天里，我们在一起议论最多的是再这样乱下去不行了。8月8日，刘进、我和一些同学一起商量怎么办，有同学提出成立女附中的“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想以筹委会这种有组织的形式继续革命、参与运动。于是，按工作组在校时学生代表会的思路，由刘进担任筹委会主任，我和其他几个同学担任了副主任。

通过2003年以来的调查和回忆，女附中的红卫兵应该是筹委会成立之后出现的。那时红卫兵运动开始席卷北京城区各中学。说出现，是因为女附中的红卫兵没有贴大字报宣布成立，也没有章程和组织机构，很松散，所谓家庭出身没有问题的同学，认为自己是红卫兵的，那就是了。红卫兵和筹委会由同一批人负责，我也是负责人之一。8月18日前两天，我们接到去天安门广场集会的通知后，各班都开始做准备，主要是制作红卫兵袖章和标语牌，为了能戴着袖章参加集会。

8月18日那天，是由刘进带队去的，学校的队伍很早就到达了天安门广场。

听到广播中说让一些学校派人到天安门城楼下集合（分配给女附中40个名额），刘进让我选人带队去，她留下照看学校的队伍。到了天安门前，我们才知道是要上城楼。那时，毛泽东等多位国家领导人已在天安门城楼上。被邀请登上城楼的中学生有上千人之多，学生中胆子大的都去给中央领导人戴红卫兵袖章。我本来戴的是没有字的红袖章，临上天安门时，有个同学说她的袖章有“红卫兵”三个字，比我的好看，就把她的给了我。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身后一个男生（后来知道是师院附中初中生）看到别人都上去给领导人献了袖章，就推了我一下说：“你这袖章挺好的，为什么不去给毛主席献呢？”当时，我旁边站着公安部长谢富治，他原来跟我父亲在一起工作，也认识我。我问他，我能不能去给毛主席献袖章，初二年级的一个同学也说要去献红领巾，他同意后我俩就过去了。毛主席并不认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哪个学校的。他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又说：“要武嘛。”当我从天安门下来见到同学们时，大家围着我问长问短十分羡慕，都觉得这不只是我而是大家的光荣学校的光荣。

8月18日下午返回学校后，《光明日报》一位年轻的男记者来采访我，我就把那两句话讲了。他让我写下来，我说就这么两句话不用写了吧。后来我和几个同学说起记者约稿的事，她们也说就这两句话有啥可写的？我没有想到，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看到那篇文章我很生气，对同学说，怎么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随便写文章登报呢？怎么还把我的名字也改了？我的名字是父母给起的，我根本没有想过要改名啊。我们班一个同学也说，怎么能叫“要武”呢？太不好听了。现在重读那篇《光明日报》的文章，文中对“要武嘛”三个字大做文章，这哪是我能写出来的。接着《人民日报》转载了《光明日报》的文章。从此，宋要武的名字满天飞，全国各地都有人给我往学校写信，大部分写的是宋要武收，也有写宋彬彬收的。这么一来，别说宋要武，就连宋彬彬这个名字我也不能用了。几个月后，班里几个同学帮我改名，她们翻字典翻到“岩”字，我就改名叫宋岩了。当时我曾对刘进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她问什么意思？我说猪壮了就该被杀了。

当天回到学校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几个同学来找刘进和我，其中有一个是反工作组的骨干。这个同学对我给主席献袖章很气愤，她认为我们犯了保工作

组的错误，没有资格给毛主席献袖章。还说这样做是不分是非，不利于运动向正确方向发展，应该纠正。我们觉得她说的对。原来我们是想自己解放自己，继续参与运动，没有想到这种作法是延续了保工作组的错误，所以我们不应该也没有资格再担任筹委会的职务了。8月19日，刘进和我写大字报声明退出筹委会。大字报贴出后，筹委会陷入瘫痪。此刻，我多少感到了斗争形势的复杂，之后还有不少记者想来采访，我一概谢绝。外校红卫兵有事来找我，我也回避了。有学生来学校设法找到我，看到我后很失望，说“要武”怎么是这个样子啊。对“8·18”后的暴力升级、打人成风，我感到不解，我们班曾抄了几个同学的家，我没去，也没有参与社会上的“破四旧”、抄家等打砸抢暴力活动。

8月底，王任重把我和刘进叫到钓鱼台，动员我们去武汉保湖北省委。刘进不去，她说不是要自己解放自己吗？为什么湖北的事让我们去？我答应去了，因为抗战时期王任重是我父亲的老部下，在冀南抗日根据地发生大灾荒时，他俩还同拉一个犁杖一起耕过地，我信任他，对他有感情，同时也觉得反省委不对。9月初，我和高一2班的4位同学一起去了武汉，我们都是女附中的红卫兵。到武汉后，湖北省委安排我们住在省委招待所，在我们之后来的清华附中的几个学生也住在这里。当时，有好多保省委的大学生来找我们，让我们支持他们。我说我们得先了解情况，然后再做结论。于是我们去了武钢和好几所大学看大字报，开座谈会。跑了几天后，大家一起讨论，看该不该炮打省委。最后的结论是，湖北省委基本是好的，应该三七开。当时我们是边讨论边写草稿，都是分析说理的，没有带一个脏字。文章写好后就交到了省委。

记不清楚是第二天早上还是第三天的早上，我们看到当地报纸中夹带着署名宋要武等人支持湖北省委的公开信，一看我们5个人全都傻了。因为这根本不是我们的原稿，对湖北省委，公开信说的不是三七开或者二八开，都成了一百一十开了，不但措辞激烈，还夹带着当时流行的骂人粗话。我非常气愤、不解，立即去湖北省委找到负责同志询问。他和我谈了很长时间，声泪俱下地说：“我们跟着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抗战八年吃了多少苦，牺牲了多少同志，现在要打倒我们，我们怎么会是反党、反毛主席的呢？”说老实话，我很同情他们，不相信他们会是反党反毛主席的走资派。我说，我们可以声明支持省委，但你们也要实事求是，那个公开信不是我写的，你们不能以我的名义发表，而且我也不叫“宋要

武”。他们同意我写一份声明，交给省委印发。当晚我就写好了一份简单的声明，说原来发出去的公开信不是我们5个人写的，我也不叫宋要武，但我们觉得湖北省委是好的，不同意打倒省委，也不愿意看到两派群众的对立。这时有人突然通知我，说我父亲病重，火车票已经给我们5人买好了，我心里着急就把写好的声明交给他们了，请他们一定帮助尽快印发。

回到家里，见到妈妈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爸得了什么病，我妈说你爸没病啊。我这才明白，实际上是湖北省委想支走我。我跟妈妈讲了经过，她劝我以后不要再提这事了。妈妈说他们那样做的确不对，但他们是在危难关头，已经被斗、被打、被逼无奈了，处于那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出此下策，想利用“宋要武”的名声保自己。听了妈妈的话，我理解老干部们真的很无奈，以后也没提过武汉之行，但那种在不知不觉中被利用的感觉我无法忘记。从武汉回来后，班里同学见到我，说你这个不懂政治的人怎么卷到政治里去了？从此，我远离运动成了逍遥派，连对学校的运动都不闻不问，更没有去参加“西纠”、“联动”等老红卫兵组织。尽管如此，社会上关于“宋要武”的传言一直没有断过。1968年初，江青在一次大会上骂了我父亲，说宋任穷的鬼女儿去武汉保了湖北省委如何如何。4月我和妈妈被押到沈阳软禁起来，与外界基本上失去了联系。

1969年初春，我从沈阳逃出来到内蒙牧区找同学插队，人还没到，谣言就先到了，说“宋要武”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当地老乡很害怕，不敢收留我。要不是北京知青们把自己口粮、衣物匀给我，并鼓励我坚持下去，我真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样走。插队时我一直埋头劳动，得到牧民的理解肯定。1972年春，在牧民老乡和大队公社领导的推荐下，我被一所大学接收，后又因谣传被退掉。老乡和知青都去反映情况，最后是负责锡盟招生的金老师顶住压力想办法录取了我，让我走进长春地质学院的校门，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幸运地开始求学生活。此后，我不提过去，不提家庭背景，只想远离喧嚣，认真学习和工作，平静地和家人生活，与同事和朋友相处。

1995年，我校一位校友（68届高中）在香港发表了《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她在文章中第一次将8月5日校长之死和8月18日我在天安门上给毛带袖章联系起来，作为因果关系来论证。2004年，她的又一篇文章《卞仲耘之死》，更是多次提到我的名字，甚至直接指出我是导致校长之死的红卫兵暴力事件的负

责人。她举出的唯一证据是前面说到的那个为抢救卞校长而给医院作担保的7人名单，她说：“这7人中有6人是红卫兵学生。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宋彬彬，该校高三学生，红卫兵负责人。”实际上，名单第一个名字是李松文老师，我的名字写在最后。

多年以来，该校友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舆论普遍接受了她的引导，认为是宋彬彬带领红卫兵打死了校长，因而八一八受到毛的接见，毛给我改名“宋要武”，同时我的父亲还被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些中外学者也将这一讲法写入文章或专著中，以讹传讹，还被不少人添枝加叶，以耸人听闻的内容在互联网上传播，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2002年，美国出版了一本性学研讨文集，其中有一篇美国女学者 Emily Honic 研究卞仲耘之死的文章，她根据那位校友的说法，把我和“八五事件”联系在一起，并把我给毛献袖章与我父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联系在一起。有美国朋友说，这样的说法太吸引西方人的眼球了。他们认为，社会上的谣言可以不理睬，而一旦写进学术著作性质就不一样了，影响恶劣。他们建议我表明态度，说清情况，必要时诉诸法律。后来，我的一位美国朋友与 Honic 及出版社进行了沟通。他们了解真相后向我公开道歉，并承诺如该书再版会予以更正。<sup>2</sup>

在此之前，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导演卡玛也曾动员我接受她的采访，起初被我谢绝了。后来发生了这件事，大家都劝我不要再沉默，他们认为在一个严肃的场合说明事实真相，是对历史负责任的表现。这样，我才在纪录片杀青之际接受了卡玛的采访，并从2003年开始调查回忆自己在女附中文革初期的情况。有人不理解我在影片中为什么不露面？因为我不想在美国成为公众人物而再次卷入舆论的漩涡，更不愿单位同事和家人的平静生活因我而受到干扰。

### 三、 我为什么参选“荣誉校友”

2007年，实验中学要举办90周年校庆并评选90名知名校友（正式名称为“荣誉校友”）。有同学推荐了我，并通过了学校的初选。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后来，在一些同学、朋友的劝说下，我接受了他们的看法：这是为自己澄清的机会。这期间，我也犹豫过，也曾想退出，怕接受提名给母校带来负面影响。

<sup>2</sup> 美国女学者 Emily Honic 及出版社的道歉信见《亚洲研究通讯》2003年春季刊（总第48卷第2期）。

可同学们告诉我，已进入了评选程序，如退出就等于默认了那些谣言。而且，我退出也会给学校和推荐人带来不好的影响。这样，我在犹豫不决、进退维谷中参加了“荣誉校友”的评选。我是麻省理工学院（MIT）地球和大气系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女博士，这是我被推选的理由。

同年3月，我们班准备制作一张名为《六十回眸》的光盘作为校庆礼物，也是为我们自己共祝花甲。关于光盘的图文，班里形成共识，不提8·18，不用我给毛戴袖章的照片。因为我接受了“知名校友”的评选，所以班里把这个原则也反映给校庆办公室和校领导。我按班里的要求，把自己离校后的照片选了一遍，选照片时我百感交集，情不自禁写下一些抒发感情、说明背景的话，以供做光盘时参考。这些材料我在4月底发给了做具体工作的同学，没有想到这封私人邮件会上传到学校“荣誉校友”评选的网络上。7月23日，我在母校网站上发现后非常惊讶。更让我不能接受的是，关于我的“个人简介”里还有8·18我给毛戴袖章的内容。我马上找到刘进，请她和学校联系，要求校庆办公室将关于我的图文全部从网上拿下来。虽然刘进和我多次催促，但直到校庆活动结束后仍未见改变。

在校庆活动当天，更让我感到震惊的是那张照片竟然放在大幅展板上，先竖立在人民大会堂的活动现场，后又陈列在校园里。《90年辉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90年图志》的第三章也用了这张照片。

我当选为荣誉校友一事在海内外迅速被热炒为政治事件，实验中学的校庆也由此成了为文革翻案、替红卫兵张目的活动。网上流传着不少声讨我的文章，最严重的指控就是我与卞校长之死有直接关系。读了这些文字，我的心情非常沉重。一是为文革中的死难者感到伤痛；二是为谣言难以澄清而心力交瘁。我希望过平静的生活，可是这个简单的愿望却难以实现。我想说清真相，但说什么都会被误解。我终于明白，试图通过一次校庆活动澄清自己的想法，在政治上是多么幼稚；同时也认识到，实验中学的校庆之所以会演化为一个事件，是因为它再次触动了文革受害者心中难以愈合的伤疤。文革的阴影还远远没有散去，我只考虑为自己澄清名誉而去参加荣誉校友的评选是错误的不明智之举。

#### 四、 我的反思和道歉

40多年过去了，我曾一次次地问自己，为什么会参与写女附中的第一张大

字报？答案是，在那个年代自己满脑子想的都是保卫党、保卫毛主席，不让资本主义复辟，都是响应党的号召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自觉地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经受锻炼。后来，我逐渐认识到，尽管文革是全国性的运动，但具体到我们学校，这张大字报实际上起的是拉开学校文革序幕的作用。我参与写了，就应当承担责任。作为女附中的一名学生，我永远忘不了1966年8月5日这一天。校长被自己的学生殴打折磨致死，这是女附中的奇耻大辱，也是我和许多同学心中无法解开的结。我从内心感到深深的自责，我不能原谅自己那天的阻止不力和反应迟缓，正当盛年的卞校长因受尽自己学生的凌辱和折磨而失去了生命，卞校长的丈夫失去了妻子，卞校长的儿女失去了母亲。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八五事件”中不幸去世的卞仲耘校长表示最深切的悼念，向她的家人和所有“八五事件”中受害的校领导及其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文革后，我一直想去看望王晶垚先生，当面表达我的歉意。但是，我的处境又使我不能不谨慎行事。2006年清明期间，几位同学去看望了王先生，向卞校长的遗像献花以表达我们40年来的思念、哀悼与歉意。我想去又不敢去，我不想因自己的敏感身份，给老人带去刺激和哀伤。

女附中的“八五事件”，是长期以来“阶级斗争教育”的产物。当时，工作组因为犯了压制群众革命的错误而被撤走，党报社论号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因此，绝大多数同学想的也是怎样才能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8月5日，学生发起游斗所谓“黑帮”，出现了暴力局面，导致卞校长不幸去世。“阶级斗争教育”让我们大多数人在看见校领导被施暴时，虽然心里同情，但不敢说什么，更不可能站出来坚决反对。一些无力的劝阻虽暂时缓解了事态，但根本无法制止新一轮的殴打折磨。现在我认识到，这种对生命的集体性漠视也是发生悲剧的重要原因。最后我想说的是，我对上述所说的每一句话负责。我将以对母校、对文革受难者、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继续进行反思。我更期望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永远不要再发生那样的动乱和悲剧。

写于2007年12月，2012年1月改定

## 【访谈】

## 面对历史的责任

## ——刘进访谈录

本刊特约记者

按：原北师大女附中 66 级高三三班学生（党员）刘进，是文革初期该校第一张大字报的发起人，在 1966 年 6—8 月间，担任过学生会主席和校文革筹委会主任。作为“八五事件”的目击者，近八年来，她在反思的同时，走访调查了上百位女附中的师生。2010 年 11 月 25 至 29 日，《记忆》特约记者对她进行了采访。

记者：今年的《记忆》47 期是师大女附中的文革专辑，有读者对其中的五人访谈中，主讲人不是宋彬彬而是刘进有疑问，因为宋彬彬一直被舆论认为是该校红卫兵的头头。刘进，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主持人冯敬兰总是针对你来提问？你是有意把责任揽过来帮助宋彬彬从舆论漩涡中解脱吗？

刘进：（笑）我能揽得过来吗？该是谁的就是谁的。宋彬彬陷于舆论漩涡里已经四十多年了，不是谁能替代得了的。仔细读过五人访谈的读者会注意到，1966 年 6 月 2 日一早，我听到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立即想到我和其他学生党员在党支部给校领导提的意见也可以公开写在大字报上，是我找到马德秀、宋彬彬，一起写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我是倡议者。当时就是一股革命的激情，根本没有想过别的。工作组进驻学校后，任命了学生会，我是主席，宋彬彬等四人是副主席。工作组因“镇压学生运动”突然撤走，我作为“学生会”主席，同样受到很大打击，感到迷茫和困惑。我们无力控制局面，随后就发生了 8-5 事件。鉴于学校秩序的严重混乱，8 月 8 日，我们部分学生协商成立了文革筹委会，以图解困，恢复校园秩序，我又担任了筹委会主任，8-18 组织全校学生参加天安门广场的集会就是筹委会组织的。从 1966 年 6 月 2 日贴第一张大字报到 8 月 19 日我退出筹委会的 80 天里，学校发生不少事情，有两件事情具有全国性影响，一是 8 月 5 日卞仲耘校长惨死于学生暴力游斗，一是 8 月 18 日宋彬彬上天安门给毛主席戴袖章。我作为学校文革初期的亲历者、参与者或主导者，所以，五人

访谈的主讲肯定是我，难道我能推卸给别人吗？

**记者：你认为你对学校的事负有责任，这是你决心调查 8-5 事件的起因吗？**

刘进：对。卞校长的死一直在心里放不下，她的惨死让我感受到的不止是震惊和悲哀，还有一辈子的歉疚和悔恨。对 8-5 事件，文革后我至少接受了两次调查，给组织写过材料。1978 年我参加了卞校长的追悼会，我把讣告保存到了今天，大会发言和张静芬老师给王晶垚先生的信给我很深的印象。还有宋彬彬，几十年来一直在误解和骂声中度日，我觉得这和我有关。因为第一张大字报是我倡议写的，8-18 我校 40 名学生代表上天安门城楼是我派她带队的，所以才会发生后面的事。这些事实这辈子说不清楚起码应该记录下来，而且应该由我来说，这是我的责任。

随着调查的深入，让我逐渐从小我或“我和宋彬彬”里走了出来，和许多校友、老师的深入接触，他们的经历和感受让我明白调查和留下学校文革初期的记录，不仅仅是自己的或彬彬的事情，而是面对历史的一种责任。对历史负责不再是一句空话，而成为一种力量，让我能够一直坚持下来。

**记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调查学校文革初期的运动过程和事件的？**

刘进：90 年代初，我曾经到实验中学组稿，接触了不少老师，如梅树民、王本中、李松文、艾立川等多位，虽然不可能跟谁都说起文革的事情，但和一些老师也有交流。和校友接触时，有人提到这个话题，大家也有回忆和议论。1996 年看一本书里有王友琴的文章，说卞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后来送到医院发现人早死了，我参加了送医院抢救的全过程，清楚地记得不是这样。当时我工作很忙，想着等我退休了一定要把学校文革初期的事情调查清楚。这里我还想说一句，王的《文革受难者》是 2004 年出版的，这本书说梅老师因被迫害而导致过早离世也不属实，因为梅老师至今健在。

**记者：王友琴没有采访过你吗？她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提到你，在每篇涉及学校或红卫兵的文章中公开点名的是宋彬彬。**

刘进：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我对她也没有印象。王友琴的《1966：学生打

老师的革命》1995年8月发表在《21世纪》杂志上，我姐刘青峰是该杂志的编辑。这篇文章说到8-5当晚到北京饭店找吴德一事，该文注释7说“据其中一人和作者的谈话，1993年9月10日。”当时我就在注释旁画了个问号，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她也不可能见过宋彬彬。07年王通过刘青峰想找我采访，我说自己还没有调查完，就没答应。

**记者：真正促使你去调查的契机是什么？**

刘进：2002年8月我和叶维丽在内蒙插友聚会上第一次见面。她问了我很多文革初期的问题，她说调查清楚8-5事件是她的心愿，校长的惨死曾经让她做过噩梦，这对我是一个触动，她回国时间很短，还坚持做调查，我为什么非得等到退休呢？

2003年春，宋彬彬来电话和我聊了很长时间，回忆文革的事情，我们发现很多事情记不清楚了，感到调查和记录的必要。这年夏天，叶维丽回国，找到我调查校长之死，我曾给她两份1978年我写的调查草稿。2006年春天，叶维丽回国期间，为修改在美国英文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卞仲耘之死》，特地约我和彬彬三人聊了很长时间，进一步核实一些细节。以后每到插友（也是本校不同年级的同学）或本班同学聚会，我都会主动提及文革初期的事，让大家回忆。近几年，专门为谈学校事情的聚会就更多了。有一次同学聚会近20人，看胡杰电影《我虽死去》的光盘，大家边看边议，收获很大。

2004年秋天，班里同学（指66届高三3班——编者注）来我家玩，好久没见过面的梁二同（文革初期反工作组、工作组撤走后发起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编者注）也来了。我问了她不少文革初期主义兵、红卫兵的情况。开始的调查就是这样有机会抓住就问就讨论，回来后做简单记录。虽然很粗糙，但恢复了不少对学校文革初期的记忆，了解到一些具体情况，重要的是和不少校友、老师建立起联系。

高二二班同学罗治听说了我的工作，拿出她四十几年前的笔记，笔记从1965年一直记到1966年工作组撤走，认真而详尽地记述了校领导和工作组在全校的讲话。这本笔记是母校文革初期情况的重要文字依据。特别是工作组进驻学校后的活动、讲话，记录得很详细，其中还有我在6月18日全校的讲话（见《记忆》

第47期《也谈卞仲耘之死》——编者注)。她说给学校历史提供真实的资料是一种责任,她愿意借给我使用。

参与的同学越来越多,调查就像接力一样进行。但是有针对性的调查是近几年做的工作,譬如对某个关键细节、某个人提供的证据,某个质疑点,必须找到相关目击者、知情者核实才行。我体会到做这件事情的难度,非一般的调查访问。如果对方不信任你,绝不会和你讲实话。必须坦率诚恳,不厌其烦,一点点积累,才能水到渠成,理清脉络,找到真相。在这里,我要感谢所有参与和帮助我调查的同学。

**记者:看来你有意识的调查在时间跨度上也将近十年了,有详细统计吗?**

刘进:准确地算是8年吧。我按时间顺序列了一个名单(给记者展开一沓A4纸打印出来的表格)。在交给学校的调查报告里(2010年4月)注明“走访老师16人(13人为女附中老师,3人为工作组老师),同学96人(92人为1966年的在校生,4人为其他届别的学生),得到了众多人的回忆、印证资料。”因为和多位老师、同学谈过不止一两次,按人次计算就更多。这个调查过程也让我经常受到感动和震动,促使思想认识不断在提升。

**记者:请讲讲最感动你的采访。**

刘进:2006年2月的一天,我和宋彬彬与当年进驻我校的工作组组长、原团中央干部张世栋老师约好见面。我们从胡同东头往西走,边走边查看门牌号码,当和一位行走缓慢的老人擦肩而过时,我忽然意识到他就是老师,猛一回头,白发苍苍的他也慢慢转过身来看我们,我们赶快喊了一声张老师,这是我们40年后的第一次见面。没有想到张老师还约了副组长王润芝老师到他家,后来我们还一起去找了工作组最年轻的叶礼艳老师。张老师讲了接到工作组任务时的紧张心情,如何紧跟党中央和工作中的困惑,还讲到干了50多天工作组,却为此挨了五个多月的批判,隐性的影响时间更长。还说到初中学生到团中央揪斗他和马娴华,马被当场剪成阴阳头,随后被揪回学校去,张老师给马老师找了草帽带上回去的。8-5游斗校领导时,他们也受到恐吓并被迫到现场。学校斗他们时,初中学生从后面用劲踢他一脚,一位高一学生说:“你们这些小孩儿!忘了毛主席说

不许随便打人吗！”那天我们谈了很久。不论你在文革任何时期，处于任何位置，都有不堪回首的经历，文革怎么看都是无人幸免的浩劫。

再譬如：我、宋彬彬接受叶维丽的采访，三人一起长谈过好几次，像对8-5那天，叶心中有个时间表，她顺着一点点捋，问我们当时在哪里？正在干什么？是怎么想的？除了你们还有谁知道这些情况？你们做了调查没有？还能够找谁调查等等，另外还据已有事实谈自己的分析和看法，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叶维丽多次问到，卞校长倒下后的那一段时间，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她的追问也变为我对自己的追问，也成为我调查和回忆的内容。之前没有一个人像叶维丽这样，对我们进行深入细致的采访，不放过一个疑问。她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让我看到自己的调查差距实在太大。以后，我把零零碎碎的字条改为笔记本，时间地点人物都注意记录，没有条件记的，一般都及时补写记录，这样做工作量很大，常感到力不从心，但还是一直坚持着。

**记者：曾经听你说，你给梅树民老师写过道歉信，有过多次交流，他终于原谅了你，并且说出了8-5事件的真相。**

刘进：梅老师是我的恩师，文革前对我做过重点培养（我在博客中写过《恩师》一文），所以插队一回来我就去看他，在他家吃过炸酱面，有时也到学校去找他，那时我们都很回避文革。2006年6月，我给梅老师寄去道歉信，信中说：“我感谢老师对我的教育，永远忘不了老师告诉我应该如何做人，忘不了老师指出我的问题和我特别关照的教诲（我从来没有认为那是老师对学生的所谓迫害）。我向老师表示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为了40年前那一天没有保护好老师表示道歉！希望老师能够接受我的道歉！”随后的一次电话中，我们谈了近2个小时。

2006年4月22日下午，我和叶维丽、宋彬彬、于羚一起去梅老师家，虽然事先和他联系过，但他看到有陌生学生谈吐很谨慎。我们问了8-5的情况，到底是哪些学生干的？梅老师说不知道，他头上有纸篓看不见。后来他反复问我们，当时在哪里，在干什么？为什么不来救他们？梅老师的问话对我触动很大，我看到了文革初期的批斗会给老师带来的伤害有多深。

后来我多次去看望他，终于得到了老师的原谅。他是8-5事件受害人中唯一

健在的证人。虽然我们从许多目击者那里已经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但梅老师作为受害人之一，他的进一步证实仍旧很重要。后来，我把自己写的调查报告初稿交给了梅老师，请他帮助。2008年4月9日我应邀去了老师家，我俩围在小台灯下，一页一页过着稿子，从下午四点半一直到七点多。梅老师最后说，你头发都白了，头脑还像上学时那样简单，这次你就听我的，把稿子改好交给学校留存备案。那天从老师家出来，天色已暗，我高兴得很，感觉天是那么晴朗。我和老师终于像40多年前一样，可以推心置腹地谈心里话了。

**记者：可以说，你在调查的过程中，自己也一直在回顾、反思和忏悔。这是一个人格升华的过程，也是成长的过程。**

刘进：没错儿，文革初期自己经历的只是一个很窄的面，非常有限。几十年后的调查让我有了从不同的角度去重新认识、反思文革的机会，也让我实实在在体会到调查不是我个人或几个人的事情。

这种调查让我重新去理解一些事，重新认识一些老师和同学。譬如李松文老师勇于担当的精神，就让我们特别感动。

**记者：你是说那个7人名单的事情？**

刘进：对。高一三班王友琴最早写出学校的8-5事件，我佩服和赞同她的勇气，对她文中有事实错误也觉得可以理解，但对她至今一直坚持指控宋彬彬，是我和许多校友、老师不能赞同的。她的证据就是一张字条，上面写了校名和7个人名。她在文章中说：王晶垚先生在卞去世后赶到医院，因为不认识在场的人，王先生请求“女附中权力当局”写下他们的名字，事后他保留了这份有七人名字的纸片。这七人中有六人是红卫兵，名单的第一个名字是宋彬彬，该校高三的学生，红卫兵负责人。

名单竖写，从右向左，校名后第一个名字是李松文，第六个是我（但是我毫无印象），第七个才是宋彬彬。发现这个错误很容易，重要的是应该弄清谁写的名单，为什么写。2008年初有校友告诉我是李老师的字体，我立即去找他，他看了名单的打印件没有否认，只是说要仔细回忆一下。不久，李老师约我见面，说了名单的来历（详见《记忆》47期《也谈卞仲耘之死》）。原来，这个名单是

当时作担保的，把卞校长送到邮电医院，没有学校介绍信医生不给抢救，情急之下李老师签名作保，并经在场学生本人同意，写了6名学生的名字。五人访谈公开后，有读者坚持质疑，于是我再次访问李老师并征得他的亲笔意见“同意在《记忆》发表”，《记忆》49期刊发了李老师对我采访记录的亲笔修改。

李老师平时给大家的印象是谨言慎行的一个人，但是他不仅在8-5那样混乱的局面中敢于挺身而出承担责任，而且四十多年后仍旧承担着这个责任，我们都非常敬佩他。8-5晚上也在医院、近年对我有很大帮助的赵桂英老师也感慨地说，李松文老师在那种情况下写这个条子，是敢于负责的表现，在场的很多人都做不到。

**记者：听说健在的几位老师在你调查中给予了很多帮助？**

刘进：赵桂英老师原来是党办的，她特别支持调查，多次对我说，你写的每一稿都要给我看，我可以帮助把关，不要出问题闹笑话。每一稿她不但自己看，还打印出来给其他老师看，汇总意见，告诉我。一次遇见吴观玉老师（也是党办的），她说看了我的稿子后，回忆起文革初期她和赵老师因为对运动不理解，两个人曾抱头痛哭，说不管怎样，咱们一定要把党办的档案保护好。

赵老师还帮助我联系需要访问的老师，遇到不清楚的问题，每次她都详细给我解释。近年我才得知她有心脏病，还得过乳腺癌。我们每次说这些事情后她都睡不好觉。几年来赵老师就这样一直支持我，直到今年《炎黄春秋》摘要刊登出五人访谈后，她还打电话告诉我，文中有一处错误，就是周学敏不是特级教师。

还有一个老师我也特别感谢，她是女附中60年代前半期的教导主任，文革前夕调离，80年代当过北京四中校长的刘秀莹老师，许多校友对她印象深刻，很喜欢她。刘老师特别支持对学校文革的调查，她说，对这一段历史应该说清，说清不仅是为个人，更是为了历史。还说，责任不在学生、老师，要想想我们的教育。“文革问题很复杂，需要很好地交心谈。知心而谈，说真话才行。刘进要有思想准备。”刘老师多次让我们去她家说情况、提意见或建议。2008年4月，我把稿子给刘老师寄去后，刘老师仔细看了稿子，约我去家里，我们谈了5个多小时。刘老师告诫我说，事实要说清，要有自责心，承担该承担的责任。最后老师把她写的一份意见（6、7页）和改过的稿子（逐页批注）都交给我，让我不

要着急，回去看一看，再想一想。刘老师的教诲帮助我沉下心来，边看书边调查，边修改稿子，直到调查基本结束。顺便说一句，刘老师有严重肾病，也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了。

2009年10月22日，路遇当年初三四班班主任金元老师，她热情肯定了我们的调查工作，感慨地说：“我当时是学校的青年教师，现在都老成这样了，学校也没有几个人了解情况了，再不做什么时候做呢？”

是啊，岁月沧桑，如果我们不能说出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不能给后辈留下自己的反思，我们将愧对历史。今天，我能有幸得到许多老师的教诲和帮助，觉得自己真有福气，虽未一一列出老师的名字，但我衷心感谢他们。

**记者：还想问一个技术性问题，围绕“孤证”，你们是怎样做甄别的？**

刘进：所谓“孤证”就是只有一个例子证明某事。法律上讲“孤证不立”。其实调查是可以使某些孤证不再成为孤证的。比如，那个7人名单，有一校友认定是李松文老师写的。在没调查的时候，我以为它是孤证。其实不是，我去问李老师，他不但承认是自己写的，还回忆了名单的来龙去脉。这就不再是孤证，而是有人证物证。

在我看到的材料里，真正的孤证有两个，我把它们分成“待考”和“记忆错误”两种。比如，网上流传的高二4班陶洛诵的“证言”，说在游斗校领导时，“宋彬彬正好站在我的旁边，她半天憋出一句话来，像是自言自语‘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因为没有上下衔接，就是这么几个字，无从找到旁证。这就是待考的“孤证”<sup>3</sup>我问过宋彬彬，她完全不记得有此事。凭我对彬彬性格的了解和对当时情况的记忆（我和彬彬基本上是在一起的），我也对此说持否定态度。许多人不了解我们当时的心态，以为我们跟那些游斗老师、制造暴力事件的学生一样也充满“革命狂热”，处于亢奋状态，实际上，我们在那之前刚因跟着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犯了错误而受挫，正陷于迷惘之中，看到部分学生游斗老师，这在当时是当然的“革命行动”，我们哪里还敢反对、阻止或驱散？后来出现了暴力行为，我们虽然也去劝阻了（她们当即也停手了），但是我们尴尬的身份和软弱

<sup>3</sup> 陶洛诵此语出自陶著《生之舞》一书。此书有两个版本，一是2004年由亚太经济导报赞助出版的，国际书号：ISBN:0-9751469-2-0，定价：A\$（澳元）18.00。此语出自此书的第81页。此书另一版本是香港星辉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出版，国际书号：ISBN:962-388-278-5，定价：HKD（港元）88.00。

无力的劝阻并没有挡回事态的最后结果——出了人命。

另一种“孤证”来自记忆错误。譬如女附中老教师陈洪涛（笔名林莽）举证文革中宋彬彬曾经提审了他，而且穿着绸衬衫和裙子，坐在桌子后，旁边站着身材高大的男生（见旅居海外的女学者王容芬文章《为历史作证》）。陈老师的证言为什么是错误的呢？因为我和宋彬彬1966年8月19日公开宣布退出了运动，起因是8-18宋彬彬给毛主席戴袖章，回到学校后，我班同学梁二同（反工作组同学之一，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代表人物）找我和宋彬彬谈话，当场还有许多同学，她对宋彬彬说：“为什么你要给主席戴袖章？你们是犯了错误的人，你给主席戴袖章是对主席最大的侮辱！”我和彬彬都觉得她说得对，她们反对工作组是真正的左派，应该由她们去戴袖章才对。我俩已经跟着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怎么现在又犯了错误？心情很愧疚。所以第二天我写了大字报，退出“筹委会”，宋彬彬也签名了。后来我还把梁二同的袖章上交给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希望他能转交给毛主席，换回宋彬彬的那个袖章。很幼稚吧？可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

**记者：对不起，我打断一下，你说的第二种“孤证”，不应该叫“孤证”。它是记忆引起的错误。这种错误有的来自个人，有的来自历史文件。比如，《关于卞仲耘的昭雪决定》就把卞之死的责任说成是“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纵容、支持坏人”的结果。1966年8月哪有什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呀！**

刘进：可能你说的对。反正以后我们从未出现在学校运动的中心和主流当中，也不曾参加或担任任何派系、组织的头头，没有机会和资格“提审”老师。工作组进校后斗争对象是“当权派”而不是群众，更不存在宋彬彬“提审”的可能。但是陈老师的“孤证”很重要，他说同时被提审的还有另一名老师朱学西，这是第二个证人。我经高三年级一位校友引荐去朱老师家核实。朱老师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是学校引进的重点人才，不料1957年在女附中被打成右派，从此剥夺了教学资格，一直在后勤做杂务，1965年借调到37中做历史老师，1966年11月初被揪回女附中后即被打入劳改队，是在劳改队呆的时间最长的老师之一。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朱老师被长期关押，还多次遭到（新招进校的）男生们的毒打。他不仅帮助澄清了“提审”问题，还以平静、坦然的心态和冷静、

理性的分析回顾了从解放初期至今的人生经历，讲述了女附中文革前的历次运动怎样整人。<sup>4</sup>让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仿佛触摸到了历史，看清了自己从少年时代开始的成长环境。朱老师作为有历史大视野的知识分子，让我非常感佩。

**记者：看来你在调查中，对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也有了新的认识 and 了解，这比单纯搞清女附中一校、一时、一人的情况更有意义。**

刘进：是的，回顾的过程也是重新理解的过程。2008年7月1日，高一三班的一位同学和我谈了8月5日那天的情况，她们班几个同学是怎样发起的，还回顾了游斗的过程。她说校庆前她看过校史，觉得文革写得很乱，事实不清。她觉得写校史的年轻一辈，没有找当时在校的师生深入调查，看来是根据已发表的文章包括王友琴的文章来写的，因此感到有许多问题。

在调查中，我还了解到许多当时不知道的情况。譬如高二二班文革初期斗争学生很残酷，给12位同学戴上不同罪名的帽子，无情斗争、长期歧视。各班都有斗争学生的情况发生。这些伤害往往陪伴她们多年，甚至现在仍难以平复。

2008年2月4日，我班14位同学聚会给我的调查初稿提意见，一共谈了6个小时。她们回忆起许多往事，说到当年我很激进，光批骄娇二气，自己体力好锻炼多能吃苦，以为别人也一样应该做到，在早锻炼、劳动、民兵训练时，给同学无形中造成特别大的压力。有的同学身体单薄，也要抢着去干重活，有的同学以后都不敢穿新衣服，都怕自己是不革命的。我贴第一张大字报在情理之中。还说文革发生，有革命性的人必然要起来，即使刘进没有贴这张大字报，也会有其他人贴大字报。大家说文革不是偶然爆发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就特别强调阶级斗争，造成的压抑在文革前就沉淀了。彭真在北京市就特别强调，咱们学校在北京又是很左的，学校树立的学生样板给人的压力很大，导向性极其厉害。班里从高二就开始暴露思想，使劲挖思想根源，要争取进步就得压抑自己。这就引导大家在政治上向极左看齐，当时班里分化得很厉害，不同出身的分化，相同出身的也有分化，大家都得表现革命、紧跟形势。学校对出身不好的是压抑，对出身好的是强调使命感。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干部子弟是当然的革命者，除了自己要革命，还要帮助别人革命。同学们也肯定了我平民化的一面，像劳动人民。有人还

<sup>4</sup> 见刘进 整理：《朱学西访谈录》，载《记忆》2010年，总第49期。

记得胡校长曾说过“刘进把教育部的厕所（卫生）都给包了”（刘进家住教育部大院——编者注）。她们说干部子弟也不是铁板一块，咱们班有人是革别人的命，刘进和彬彬是自己要革命。时隔40多年，同学们坦率直言，以诚相见，让我受益匪浅。文革初期，我班也发生过伤害同学的情况，造成彼此之间的隔膜。1997年，班团支部书记向同学们公开道歉，成为和解的第一步。2007年我班为祝贺母校90周年校庆，做了“六十回眸”的光盘，征集了全班同学的资料，这是同学之间深入交流的更进一步。应该说，我所在的高三三班同学们给予我和宋彬彬许多理解和温暖，对我们的调查提供了许多帮助，我要在此衷心感谢大家。

**记者：你做的调查报告就是五人访谈的那些内容吗？是否还有更详尽的版本？**

刘进：五人访谈提炼了主要内容，是公开的版本。我自己做的调查已经在2010年4月13日交给实验中学存档，内容有三部分，一是给母校的信，二是《女附中文革初期的一些情况》，三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学校史”文革部分的几个问题》。其中《女附中文革初期的一些情况》内容更详细一些，有100多条注释。

**记者：为什么要分为两种版本？**

刘进：原来做这个调查，没打算公开。宋彬彬也觉得这辈子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自己的罪名了。我们只能交给学校，留待后人评说。后来冯敬兰出现了，是她推动我们一直往前走，并寻找机会和平台，让我们公开说出8-5事件的真相和自己的文革经历。2007年实验中学的校庆成为当时的一个政治事件，媒体也炒作很厉害，有文章提出永远把宋彬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冯敬兰觉得这些非理性的观点不能接受。12月12日她和我通话了解宋彬彬的情况（她们不认识），随后就在博客上写了《请放开宋彬彬》一文，引起的震动和争议至今未了，引起的骂声至今未绝，反而激发她深入到这些事情中。她说：不要怕听难听话，别人的嘴是堵不住的，我们该说的话还要说，该做的事情一定要做。那就是一定要公开站出来，大声说话。她不但自己做还催着你做，就像强能源就像催化剂。

2008年1月18日，叶维丽、于羚、冯敬兰采访了我和宋彬彬，谈了6个小

时，一周后再次对谈，长达10个小时。后来，我们多次在一起讨论，提出质疑，再作重点采访。后来冯敬兰在网上发现高三一班校友刘沂伦曾在三味书屋就8-5事件做过演讲，就把她也请来了。2009年6月16日，我们在一个座谈会上，第一次公开说出自己在学校文革初期的经历和我们所知道的8-5事件。倾听者是长期关注女附中8-5事件并有著述和电影作品的校外作家、学者郑仲兵、徐晓、徐星、田晓青、李宇锋等。今年四月，在《记忆》公开发表的五人访谈即是那次座谈会的结果，刘沂伦的部分由本人独立成篇。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请谈谈实验中学2007年校庆，这个活动因为评选宋彬彬为荣誉校友在海内外掀起轩然大波，人们质问女附中：为什么将敏感的、完全是负面形象的宋彬彬评选为荣誉校友？**

刘进：2007年是实验中学建校90周年，学校准备隆重庆祝，其中一项活动即评选90名知名校友（后来更名为荣誉校友）。4月初，我们班（66届高三3班）准备做一张班级光盘《六十回眸》作为校庆礼物，还选出9人小组做具体工作和分头联系班里其他同学，我负责联系宋彬彬等四人和向她们征集资料。按照光盘小组的要求，宋彬彬4月23日把她的照片、材料发给我，当天我又转发给小组的其他人。与此同时，校庆办公室希望我们班有人推荐宋彬彬为知名校友。推荐人和宋说后，她考虑了一周多才接受推荐。我理解她在长期沉默后接受推荐是想借此机会讨一个清白，为自己40年来的被妖魔化正名。5月4日，班里就光盘的编辑工作开第一次协调会，同学们对宋当知名校友是否合适发生争论。反对推荐宋彬彬为“知名校友”的同学提出，难道是因为8-18她给毛主席献了红卫兵袖章而“知名”吗？赞成一方则认为，宋彬彬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地球行星科学系第一位大陆女博士，即为评选资格。会上明确强调推荐宋不能有涉及文革的文字，不能使用戴袖章的照片，这点必须和学校说清楚，班级光盘也照此原则。之后，这些意见均反映给学校校庆办公室。

后来我一直忙于班级光盘的具体事务，没有注意学校网评知名校友的内容。7月23日，宋彬彬自己发现校网介绍她的引言中有“在1966年8月18日，主席接见红卫兵时，为主席佩戴上红袖章”的文字，而且把她为班级光盘选的照片和随手写下的感言全部搬到校网上，她很震惊，说感言不是给班级看的，只是给

我看的，怎能原封不动地搬到网上呢？这种作法让她蒙羞。我知道后立即发邮件要求学校拿下有关图文，当日我就收到校庆办公室回复“收到，尽快修改”，以后又多次催促，一直催到2008年1月，也没见修改。

2007年8月30日上午学校老师来电话，说上午讨论了荣誉校友的事情，会上对宋当选发生争议，因为找不到宋，所以想听一听我的意见。我下午2点到校，和有关方面谈了自己的意见，一是认为评选宋彬彬为荣誉校友已经进入了程序，再拿下来对她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大；二是文革中的“三种人”或其他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均已定案，宋不属其列；三是宋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够格。9月2日，学校和宋直接交流后决定保留。

校庆当天，我在人大会堂看到展板上那张戴袖章的照片时，说实话，非常震惊和意外。之后，实验中学的校庆活动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遭到海内外一些著名学者的猛烈抨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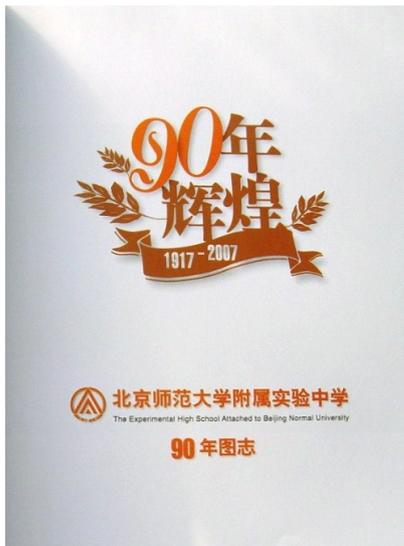
因为这件事情涉及到同学、学校，理解到大家的善意，我们一直不想解释。宋彬彬说，我绝不能为摘清自己把学校、校领导和我的推荐人置于尴尬地位，这是我做人的原则。由于承受的压力很大，她在当年12月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澄清事实，一篇是四十一年来的感谢和道歉。原想在班级博客中贴出，同学们认为不是恰当的时机，所以就搁置下来。

**记者：在宋彬彬的问题一边倒，网民和读者对真相完全不清楚的情况下，想通过评选荣誉校友为她正名，起码是不明智的，效果适得其反。而在展板上使用那幅著名照片，也折射出学校年轻一辈领导对文革缺乏正确认知。听说还有一本画册也用了那张照片？**

刘进：画册名为“90辉煌（1917——2007）——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90年图志”，全书分为6个部分，用了286张图片。其中第三章是文革部分，有前言600字左右和12张黑白照片，戴袖章的照片和卞校长的正面标准照分别在对开的两页上。（刘进把画册递给记者看）

**记者：好，我会把这个文革部分的前言附在最后。谢谢你接受采访**

2010年12月1日



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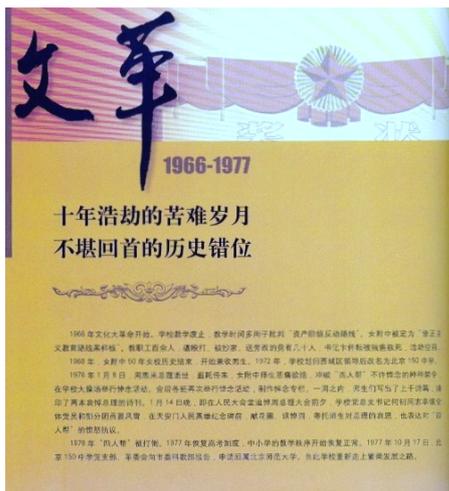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90年图志“90辉煌（1917——2007）”》封面

附二：

《90年图志“90辉煌（1917——2007）”》

第三章“文革1966——1977”首页文字：



十年浩劫的苦难岁月

不堪回首的历史错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教学废止，教学实践多用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女附中被定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黑样板。教职工百余人遭殴打、被抄家，送劳改的竟有几十人，书记卞仲耘被残害致死，浩劫空前。

1968年，女附中50年女校历史结束，开始兼收男生。1972年学校划归西城区领导后改名为北京市150中学。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噩耗传来，女附中师生悲痛欲绝，冲破“四人帮”不准悼念的种种禁令，在学校大操场举行悼念活动。会后各班再次举行悼念活动，制作悼念专栏。师生们写出了上千诗篇，油印了两本悼念总理的诗刊。1月14日晚，即在人民大会堂追悼周总理大会前夕，学校党总支书记何钊同志率领全体党员和部分团员冒风雪，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读悼词，寄托师生对周总理的哀思，也表达对“四人帮”的愤怒抗议。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中小学的教学秩序开始恢复正常。1977年10月17日，北京150中学党支部、革委会向市委科教部报

告，申请回属北京师范大学。自此学校重新走上繁荣发展道路。

附三：《90年图志“90辉煌（1917——2007）”》第三章“文革1966——1977”  
图片及图注（12幅照片分别排在4页上，并未按照时间顺序排列）：



第一页

上：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归西城区领导，改校名为北京150中学

下左：我校学生宋彬彬为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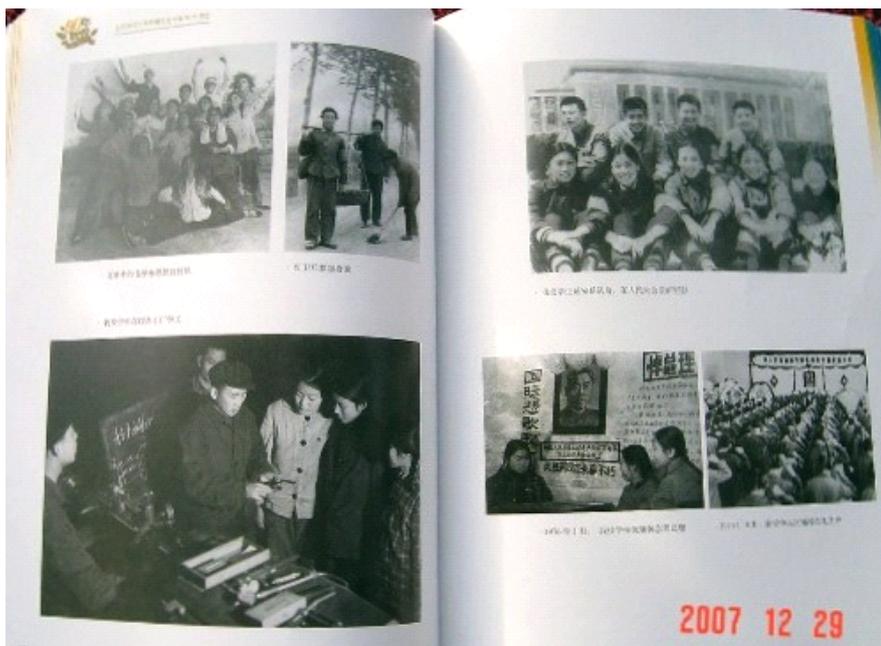
下右上：与贫下中农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

下右下：冬季拉练

第二页

上：1966年8月5日，书记卞仲耘被打致死

下：为迎接全运会，女民兵在校内进行刻苦的训练



第三页

上左：文革中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上右：红卫兵参加拾粪

下：我校学生在校办工厂学工

第四页

上：我校学生延安插队前，在人民大会堂前合影

下左：1976年1月，我校学生沉痛悼念周总理

下右：1976年9月，我校学生沉痛悼念毛主席

## 【往事】

## 从卞仲耘之死说起

张亦鸣

我是原北师大女附中高二（2）班学生，一个当年很不起眼的、既不是红卫兵，也不是“黑五类”的被团结对象。关于卞仲耘之死，作为当年事件的目击者，我想我有责任为还原历史场景、澄清一些被严重歪曲的事实出点力。

1966年8月初，女附中在工作组被撤走后，整个学校处于极端无政府状态。

8月初的一天，一些学生在学校大操场揪斗校领导，主要是绕着大操场“游斗”，卞仲耘也在其中。<sup>5</sup>当时虽时有殴打，但并未到真正暴力的地步，真正的残忍是在对校领导的集体揪斗以后。当时，高一的几个女生在对校领导的集体揪斗后，将卞仲耘拉到实验楼前的后操场，有3至4名高一女生用棍子和带铜头的皮带抽打卞校长。可以听到皮带打在身上的“扑扑”声，可以看到被抽打后卞校长背上白色衬衫下渗出的血迹。当时正是午后，天很热，卞校长没有一点声音，只是额上渗出汗珠，低头忍着……。

我没有勇气继续看下去，跑回南楼我们班的教室，呆呆地坐着。我的良知使我无法接受那样的残暴，但同时又有有一个声音在告诫自己：你这是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者要坚强。没多久，就听说卞校长不行了，但我再没有勇气下去看一眼。

第二天刚到教室，我班一个干部子弟就告诉我，卞校长死了，她也是随同送卞校长去医院的学生之一。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文革中的许多事渐渐淡忘了，唯独这件事，深埋在记忆中。不仅因为当时场景的残暴，还因为我曾在良知和“革命”的双向挤压下痛苦不已：当年我感觉自己是个逃兵。后来，多少年，我都认为自己像个帮凶，面对那样的暴行没有说一句制止的话。所以，我对当时情景的记忆至今清晰。虽然我不能证实卞校长是何时倒下的，但是我能确认，当年毒打卞校长的就是高一的几个女生。

我至今似乎还能记得她们当时的相貌、样子：身着军装，没有红袖章，也不

<sup>5</sup> 详见刘沂伦：《我的记忆：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二三事》，载《记忆》2010年，总第47期。我所记忆的，与该文的描述相符，这里不再赘述。

记得穿有军靴，其中特别凶的是一个瘦瘦高高的女生，但我叫不出名字来；我还能确认的是，当时宋彬彬并不在场，她多半也是事后才知道的，因为在大操场对校领导集体揪斗后，学生大多已经散了。所以卞仲耘之死并不是“那么多学生对她不停地殴打”，而确实确实是“个别学生特别残忍而造成的”（引王友琴语）。

写卞仲耘之死的文章，可能王友琴的是最早、最被广为引用的。但当我在2007年读到她的文章时，却感到十分惊讶。王友琴也是女附中老三届的，但她对当时场景的描述怎么会和我记忆中的相差甚远。<sup>6</sup>对于她所描写的一些场景，诸如“游斗、劳改的同时……她们还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推进厕所里，当头淋了屎尿。宿舍楼的白色墙上，留下她们的斑斑血迹”，卞仲耘“倒在宿舍楼门口台阶上，仍然有红卫兵继续踢她的肚子，踩她的脸”等，现在我还不敢说这样的事没有发生过，因为当年在工作组撤走后，揪斗校领导完全不是全校有组织的行为。所以，到底校领导们被揪斗了几次、什么时候、被哪些学生、在什么地方、怎样揪斗和劳改的，还需要做调查；但是在8月5日那天大操场的游斗和后来对卞仲耘的单独殴打致死中，没有这样的场景；卞仲耘倒下的地方也不是宿舍楼前，而是实验楼前的后操场。

所以我认为，王友琴关于卞仲耘之死的描述，至少存在时间、地点上的错位和叠加。作为文学作品，将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人身上发生的事，集中在一个虚构的人物身上，是被允许的，但是写历史不允许。类似的情况，王友琴记述闻佳的文章遭到闻佳同班同学鲍国芳的质疑。以我的分析，闻佳同班同学和班主任金元老师的话更可采信。作为历史研究者，王友琴不应该忽视她们的证言。

王友琴在她的文章中肯定当时宋彬彬在场带着人打死了卞校长，并说“刘婷婷参与过1966年8月5日殴打卞仲耘致死的暴力行动”，不知道这种指控的出处何在？女附中老三届、尤其是老高中的学生都知道，宋彬彬不是个张扬的人，就是在因给毛戴红袖章而名扬全国后，在学校她仍然很低调，并很早就淡出了女附中的文革运动。文革期间就听到社会上有传言，说宋彬彬打死了多少多少人，但女附中的人没有人会相信；而在卞仲耘被打死后，学校里也从来没有人说过是宋彬彬打死了校长。那么，王友琴的结论是怎么来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怎么开始的？野史变成了正史？后来知道王友琴是当年高一（3）班的学生，就更

<sup>6</sup> 为此，我曾于2007年12月8日在“五柳村纪事”网页上发表了《该谁负责》一文。

让我不解了：如果当年她就在现场，那么她肯定认得那几个打手而且至今不会忘记；如果当年她不在场，那么多年后，当她要写有关文章时，总要做一些调查研究，应该更有机会了解到真实的情况。我想，王友琴总不至于也遵循这样的逻辑来得出结论：因为宋彬彬给毛带了红袖章，而毛说了“要武嘛”，宋彬彬就变成了“宋要武”，就成了红色暴力的标志性人物，她就应该为一切暴力事件负责，所以，卞仲耘就是宋彬彬打死的。

对于我的质疑，也许也会有人说这是“鸡蛋里面挑骨头”，但是我认为，只有将宋彬彬去妖魔化，才能搞清历史真相；只有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才能清楚卞仲耘之死，在当时是集体施暴还是个别人的特别残忍造成的。而两者的不同，对女附中文革的研究就会有不同的方向，得出不同的结论。

还值得研究和思考的是，女附中作为与四中齐名、同样是高干子女云集的重点中学，为什么在文革期间自始至终没有像四中那样，形成过在一定程度上能掌控学校运动的学生核心领导？四中没有打死过老师或同学，女附中却打死了校长。而面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这样的血统论，同样是“黑五类”或出身一般的“被团结对象”，在四中，很快就有学生起来反抗，自己解放自己，并形成声势；而女附中的这些学生，绝大多数或者心惊胆战，或者自我改造，力求证明自己也是要革命的。

比较典型的例子，我所在的班级是全年级、乃至全校学生斗学生最严重的，一位被批斗的同学，批斗者不许她带毛像章，她为表忠心，就将像章偷偷别在自己胸前的肉上。这样的经历，对于一个十七、八的女孩子，在当时，以致之后的几十年，该是怎样的精神摧残和屈辱。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是女附中的教育使学生丧失了自我，丧失了独立思辨的能力，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这还有待更深层次的研究和探讨。而女附中学生的这种特质，难道不是直接影响了女附中的文革态势，也在客观上纵容了对卞仲耘的施暴而置她于死地吗？

我对王友琴提出质疑，还因为她是研究文革史的先行者。我敬佩她的勇气和执著，但正因为她是“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她的文章有太大的影响力，所以，她才更有责任严肃地对待历史，客观地、理性地、公正地进行反思和总结，让自己的研究成果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也是对死者的尊重和告慰。

看了冯敬兰主持的，有刘进、宋彬彬、叶维丽、于羚参加的访谈录《也谈

卞仲耘之死》（《记忆》第47期），我为她们的社会责任感，她们的真诚和努力而感动。要理清那段历史很不容易，但我认为她们做到了，她们“把真实的记忆留下来”并交给现在的实验中学存档，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对文革史的研究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我们作为那个疯狂年代的亲历者，有责任将真实留给后人；至少，不要再给本已纷繁复杂的历史增添混乱。

---

**【往事】**

按：这是女附中66届高三学生刘进六年前写给梅树民老师的道歉信。写信的时间是2006年6月14日，那一年是文革发动四十周年。

**梅老师，您好！**

上次能和老师见面，老师谈了那么多心里话，令我感动、难忘。

今年是文革40周年，是卞仲耘老师被文革迫害致死的第40年和卞老师的90寿辰。想起40年前8月5日那天学校发生的惨剧，虽然在“文革”背景下受当时的思想认识所限，自己只是用一般的语言来制止打老师，虽然在当时严重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下，的确靠一己之力不可能回天，但是卞老师被打死、校领导被殴打、侮辱却是残酷的事实。对此我的内心一直感到不安和痛苦，我多么希望这一切不要发生啊！

我曾经觉得作为一个中学生自己已经尽了力，但是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什么之类的问题在不断地敲击着自己。尤其是那天老师问我们：“你们都到哪里去了？你们这些学生党员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你们写第一张大字报前不和我商量一下？”等问题时，我更感到一个师者、长者责问的分量。

对那疾风暴雨的非常年代，需要我们去面对和正视的追问和自问太多太多，对这一连串“为什么”的回答，能够促使我去反思，这种反思不仅是为了个人，更是为了历史。如果每一个文革的亲历者都能够真诚地回忆和反思，那么连接这些回忆的碎片才有可能使历史接近真实，建筑在真实历史基础上的研究分析，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才更有价值，如果再有什么不可预料的事情发生，我们和我们的后人才会更清醒地面对。

历史永远在无情地考验着每一个人。在历史的大潮面前，人们往往来不及思索而表现出自己最本质的那一面。最本质的那一面就是自己的本性，是自己的天性加上所受教育及社会、生活环境综合作用所造就的那一面。这个最本质的东西既有个性也有共性，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把这些想清楚，就能更好地回答自己行为产生的原因，回答许多追问和自问，从个性中找出一些那个时代最具共性的东西。

我知道找问题固然重要，但也不想一味地找问题，而否定一切，因为那个时

代有太多美好、光明的东西，特别理想的东西，也是我一直追求和坚守的东西，是一些让我特别留恋的东西。这种对时代批判和留恋的复杂感受，我们师生恐怕会有不少相通之处，因为从某种角度看，学生是老师的作品。

我感谢老师对我的教育，永远忘不了老师告诉我应该如何做人，忘不了老师指出我的问题和对我特别的关照、教诲。我要向老师表示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为了40年前那一天没有保护好老师表示道歉！希望老师能够接受我的道歉！

保重身体！

您的学生 刘进

2006年6月14日

## 【评论】

## 由师大女附中“八五事件”谈起

叶维丽

作为1966年文革开始时原北京师大女附中（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在校学生，我对1966年8月5号女附中卞仲耘校长被害致死的一案（“八五事件”）的关注和调查，从2001/02年开始，断断续续有十来年了。主要的研究结果，是2006年用英文发表的一篇学术性文章，该文在网上有经我授权的中文译文（白芳，“卞仲耘之死”，发在[www.edubridge.com](http://www.edubridge.com)（二闲堂）“来稿存真”档中/译文省略了原文大量注释）。中英文文章的影响均有限。去年以来，《记忆》杂志提供平台，为围绕卞校长之死一案的女附中文革做了几期专辑，我在《记忆》第47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的短文，主要是讨论近年来关于“八五事件”的两个不同叙述或“版本”。按说，要说的话差不多都说了。下面这十条，有些是重复说过的观点，觉得不妨再说一遍，有些是多年来憋着没说的话，有些则是最近看到有关讨论（纸媒和网上的）而新生的感触。拉拉杂杂，没有系统，写着写着，就成了“十全大补”；因为是杂感，表达上也不严谨。但不管怎样，在这些想法的背后，确是一个当年16岁、如今60岁的人，对少年时代身历的一段国家往事的不敢遗忘，是对能有此不易之机会与读者再次交流的珍惜，也是表达对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特立独行、勇于直面历史的《记忆》杂志由衷的感激和支持。

在正文之前，我想就自己的“双重身份”讲几句不应算做多余的话。做历史、特别是审视本人亲历的历史事件，无法回避研究者本人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在调查写作“卞仲耘之死”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我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我是个史学工作者，同时，我也是一名1966年在校的女附中学生，是广义上“学生斗老师”（王友琴女士语）那代人中的一员。这个双重身份，使我在面对卞校长之死“谁之责”的问题时，无法站在“外面”或“高处”来评点事件、臧否人物，而是把自己“放进去”，怀抱愧疚忏悔之心，感受历史难承之重，即使“八五事件”发生时我本人并不在场。第一次见到卞校长丈夫王晶垚先生时，在送给他的一本书的扉页上我写了下面的话：“作为女附中学生，我感到有罪”。

面对王先生，我恍如见到多年前遇难的卞校长，这时，我就是当年女附中的一名学生，背负着这个学校有史以来最沉重的集体耻辱。这样一种逐步获得的自觉帮助我从不同的视角来感受和分析与“八五事件”有关的问题。

### 一. 不能脱离历史场景和语境

做史，切忌做事后诸葛亮，但这又往往是最难避免的。身在历史现场中的人，是无法预知事件会如何发展的。历史工作者面临的一个基本挑战，不是“还原历史”，因为历史无法“还原”，而是尽可能将你所研究的历史事件放到它所发生的历史场景和语境中去（这里涉及研究者如何理解和建构当年的场景和语境）。文革发生在四十多年前，和今天已经隔了几个时代。今天的我们，站在道德高地上容易，持有“历史感”难。对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所谓“历史感”，其实是当年我们每个人生存须知的常识。

文革中我虽是少年，但也记得当时铺天盖地的“抓叛徒”、“揪特务”、“揭[历史]老底”风潮。我父母在抗战爆发后离开北平，辗转到抗日前线山西参加抗战，那时阎锡山领导的二战区，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但阎锡山后来成了“反动派”，我父母的这段历史就成了被审查的重点。文革中这样的事情几乎发生在每个有点经历的人身上，因为“历史问题”而挨整、自杀的人不计其数，到后来都“一风吹”平反了事。今天回过头去看，当年所谓的“清查历史问题”，其实是在和历史强词夺理、胡搅蛮缠，“外调”人员的提问常常令历史当事者啼笑皆非，“清查历史”完全沦为现实政治的工具。文革后虽然有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错案”，但制造大量冤假错案背后的脱离历史场景和语境的思维方式，并未得到认真反思，而似乎成为我们中国人的痼疾。

最近有人指责文革一开始时女附中给校领导贴第一张大字报的人，说这张大字报的出现最终导致卞校长被打致死。此说令我瞠目结舌。如此脱离历史场景和语境，好似拔着自己的头发以求挣脱地球引力，只能将文革研究引向一条通往天方夜谭之路。说到底，无论是女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还是除了北大聂元梓七人之外其他机关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都是大势所趋，在一定程度上是那个时代的“规定动作”，张三不写，李四也会写，和后来发生的暴力没有必然联系。当然，这“张三”或“李四”，一般来讲是当年的革命积极分子。

## 二. 文革的再次发动和暴力在其中的地位

我自认为本人在卞校长之死研究中两个最重要的观点，一是将“八五事件”放在“文革再次发动”的政治大背景之中；二是高度重视暴力在这场由最上峰直接发动的“十级政治地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我最关注的人物是最高领袖，我关注的是他无人可以取代的、决定性的地位。

1966年七月底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不但突然，而且背离了中共指导历次政治运动的常规，导致了从中央到北京市、区二级的不知所措，造成包括女附中所在内很多基层单位相当程度的无政府状态，达到了最高领袖所希望的“天下大乱”之效果。此为“文革再次发动”之端倪。<sup>7</sup>领袖放手让学生们“自己解放自己”，暴力的出现就几乎成为必然，对此，干了一辈子革命的行家们应该比谁都心中有数。刘邓式的工作组，用“四清加反右”的方式搞运动，整干部，整学生，但到底还多少讲究个“度”；此时的文革，则毫无底线了。在一定意义上，文化大革命经过“再次发动”才真正揭幕，才称得上“史无前例”。女附中的“八五事件”恰恰发生于“再发动”期间，发生在上层政治激烈震荡（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刘公开摊牌）、中层因思想困惑导致不作为以至瘫痪、基层“革命群众”拥有前所未有的革命“自主权”（需要强调，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革命的）这几条“线”的交点上。它有重重的背景，不是一个单纯的“学生打老师”事件。

为什么伴随着“文革再次发动”，首都北京会出现1949年共和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群众性“红色恐怖”？放纵它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可否应用在这里？暴力与“革命”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在中国20世纪革命史中是如何形成和确立的？为什么在和平时期成长的一代人会那么迅速地“拥抱”暴力？……

我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我的文革记忆带着抹不掉的1966年“红八月”的血迹，也是因为这些问题至今仍然值得追问。

我以为，虽然卞仲耘成为北京（乃至全国）中学生暴力的第一个受害者，但从文革宏观图景来看，她和她之后一大批受难的基层干部教师以及“地富反坏右”并不是此一波（也是第一波）文革暴力的真正威慑对象，威慑她/他们这样毫无

<sup>7</sup> 我对这一时间段文革史的理解，受到王年一先生《大动乱的年代》的启发，该书于1988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还手之力的弱者没有意义，她们是祭坛上的牺牲品，借她们的生命来制造一种震慑的氛围。文革这样一场前所未闻、最高领袖自毁执政基础的超大规模政治运动，需要强悍有力的“开场锣鼓”，需要以 shock and awe（震慑）来开道。

当年给北京民众留下极端恐怖印象的“红卫兵小将”，是文革第一波暴力的卖力执行者。多年后我听到一个意味深长的观点，说这些青少年是“天桥打场子的”，为文革在中国大地的推进清出了“场子”，造出了声势。过去在北京天桥，一些街头艺人在演出之前，得用一根绳子拴上一块铁块来回抡，吓得人们纷纷闪开，一块场地就被腾了出来，这就叫“打场子”。天桥打场子的艺人们并无意伤害他人，这是与“红卫兵小将”的重要区别。

### 三. “死了就死了”

我最近常常想，对生命的漠视，不是个别人的问题，当年在我们这代人中相当普遍。这漠视不仅表现在八五当天暴力的肆意横行，也表现在卞仲耘倒下后，屎尿失禁，生命垂危，被像弃物一样放在一辆手推车上，很长时间无人理睬，尽管医院离学校近在咫尺。而卞死后一些学生的反应也表露了冷血和漠视。在医院里，有人要求医生解剖尸体，以证明卞本来就有病，死因与暴力折磨无关。第二天，卞死亡的消息由一位党员学生向全校通告。在我看来，这个死亡通告的关键，是“死了就死了”五个字，它为卞之死定了调子。这个说法出自一位市级领导，是对文革以来北京市第一起死于非命恶性事件的官方表态，这个表态后面有文革再次发动的大背景。

“死了就死了”也正是卞身后的遭遇。听到卞死的广播通告后，女附中没有一个班级或个人公开表示哀悼，有的学生居然鼓掌。只有一位教师给卞家属写了悼念信，但她既不敢署名，也不敢留下自己的真实笔迹。此后，有学生造访卞仲耘家，但她们不是去慰问，而是去向卞丈夫了解女附中情况，以便深入开展文革。1966年八月上中旬北京中学的形势，一天一个样，卞仲耘的死亡很快就被其他事件遮盖过去了，其中最突出的是红卫兵运动在北京城区的风起云涌。这时，有谁还想着刚刚惨死的卞校长？有谁还关心另外几位也遭到严重摧残的校领导？其中副校长胡志涛被打得几个星期不能下地。当卞仲耘的家人去给死者火化时，他们须经过红旗招展、口号震天的北京城区。王晶垚先生说，他哀伤的心情和四

周亢奋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照，令他终生难忘。

八月五日那天动手打人的，毕竟是少数；但那天之后对卞死持冷漠态度的，却并非少数。继卞仲耘之后，北京市又有一批中学校领导和教师被学生打死。下手的人是少数，但对一个又一个的死亡持冷漠态度的，不是少数。

十年前第一次去看望王晶垚先生时，我怀着深深的自责。那自责，是因为冷漠的人群中有我。

对生命的漠视，是一代人的问题（姑且只说我们这代人）。它的背后有深层的原因，渊远流长。省思，是大家的事情。

#### 四. 软弱无力的“政策派”

我对“八五事件”的研究重心，围绕着文革再次发动和暴力等问题，而对1966年6月初工作组进校以来形成的、包括宋彬彬在内、我称之为“骨干学生群体”的若干人，并未多费笔墨。<sup>8</sup>理由很简单，她们既不是“八五事件”的发起者，也没有参与暴力。（但在对生命漠视这点上，她们有同样的问题。）对于这个基本事实，我相信任何一个当年在校的女附中学生，如果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都会承认的。

但我注意到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文革再次发动和暴力文化等问题，迄今没有得到多少关注。公众对女附中“八五事件”的注意力仍集中在宋彬彬个人身上，人们议论最多的是诸如“宋彬彬打没打人，她的责任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坦白地讲，如果纯粹从历史事实出发，我可以不理睬这个“公众热点”。但一个人“热”了四十几年，在我们这代人中，大概算是绝无仅有了，这个现象就颇值得琢磨了。

在《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下面简称《好故事》）一文中，我谈到宋彬彬在文革初期、包括“八五事件”的女附中运动中并没有引人瞩目的个人行为，她是“骨干学生群体”的一员，她的名字常常和刘进连在一起，而且是在刘进之后（刘为工作组进校后成立的师生代表会主席及工作组撤离后成立的文革筹委会第一把手）。宋的“爆得大名”是因为八·一八上天安门给毛泽东戴袖章，因此而成为尽人皆知的“首席”红卫兵，并因“宋要武”一名而被符号化、妖魔化。接着就有人把她说成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而因此要对“八五事件”负责。我在

<sup>8</sup> 有关我对她们在“八五事件”中的看法，请看“白芳”文及《记忆》47期。

《好故事》一文中，特别提到这个叙述逻辑犯了典型的“后面发生的事情”（八·一八）影响“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八·五）的错误，这是做历史的人特别需要警惕的。

我分析刘进、宋彬彬等人当时的思想脉络，觉得她们属于刘少奇、邓小平文革初期制定的中央“八条”影响下的“政策派”，这一派主张“有领导、有秩序”的进行文革。七月下旬后，派遣工作组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这一突变的形势使得中央和北京市一级的“老革命”都不知所措了，遑论刘、宋这样的青年学生。八月初的她们，既困惑，又要努力跟上“革命”；而做为工作组时期的“红人”，她们的身份尴尬，已不具备足够的权威。工作组撤离后的“革命”，已不兴讲“领导”、讲“秩序”了，兴的是“自己解放自己”。八月五号暴力在校园爆发，她们在进行劝阻时说，“斗黑帮可以，不要打人”。这样说，是符合她们的思想逻辑的。这个逻辑，是以接受阶级斗争合理性为大前提的。在这个前提下“讲政策”，特别是在最高领袖明令抛开政策（毛在恰恰在八月五号那天废除了讲政策的中发“第九号”文件）时还讲什么政策，只能是软弱的，无力的，无效的。在随后而来的“红八月”中死于非命的很多事件后面，都存在这么一个“政策瘫痪”的背景。彼时，连出来呼吁“要讲政策”的人也极少了。

在当代中国的历次运动中，从“土改”，到“四清”，再到文革，都有“政策派”这么一路。好好梳理一下它的来龙去脉，遭遇起伏，是很有意思的。

再补充一点，要让刘进、宋彬彬这样具有相当“正统”思想的人，在毛泽东公开支持红卫兵之前率先成立红卫兵，是不符合她们的成长经历和思想脉络的。邓小平在1966年七月初接见包括她们两人在内的女附中文革班子时，明确反对成立红卫兵一类学生造反组织，要求尽快恢复党团活动，这对她们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对红卫兵的态度有很大影响。近年来，有关宋彬彬是女附中成立于7月31号的红卫兵之首领的说法，广为流行，而此说奠定了宋彬彬应对八五事件负责的前提。<sup>9</sup>这个前提，既没有外在史实依据，也不符合刘、宋等人的内在思想。

## 五. 血统论、“干部子弟”和“官二代”

在《好故事》那篇文章中，我还讨论了“宋彬彬/宋要武”是如何成为文革

<sup>9</sup> 见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卞仲耘篇。

“神话”（myth）的，我认为该神话的长盛不衰，其实是反映了多年来人们持续的心理需要。

关于“宋要武”神话，我最近又有一点新想法。我感到这个神话背后的重要支撑，除了“宋要武”具有的强大符号象征力量外，还涉及到一个人人心中所有、但往往口中所无的中国社会等级现实。如果宋彬彬没有高干子女的家庭背景，纵使她在八·一八给毛主席戴了红卫兵袖章，公众对她的兴趣还会几十年来经久不衰吗？有时候没有说出来的东西是更加深刻的。1966年7月底横空出世的“对联”及其背后的血统论，虽经包括遇罗克在内的很多有识之士犀利的剖析和批判，但有些更深层的东西，似乎并没有去进一步探究。北京文革初期红卫兵的主体是“干部子弟”。我在几年前的一本小书中写到：“我总觉得干部子弟现象值得好好研究。它反映出来的血统论和森严的等级制是非常反动落后的东西，是对共产党人追求的平等理想的极大讽刺。为什么这一套在中共子弟中这么有市场？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年参加革命人群本身的问题？”<sup>10</sup>我是“营垒中人”，这段话可以算做我的反躬自问。

1949年后由主张社会平等的政党建构的等级社会，到了今天有变本加厉的演进。如果说当年的干部子弟中还有一些人以艰苦朴素为荣，今天“官二代”中为数可观的人对权力和财富的追逐则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老百姓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因为家庭背景，宋彬彬怕是承受着几十年来社会上对她所属阶层越积越深的不满。我以为，“宋要武神话”生命力的一部分即由此而来，舆论对宋彬彬本人缺乏同情也与之有关，这个现象背后有深刻的当代社会政治原因。

近几年来社会上对我有关“八五事件”分析的反应，也往往不注意我自己看重的观点，而一言以蔽之曰“为宋彬彬辩护”、“为红卫兵鸣冤”。我满心想再说一遍，“请认真读一下我署名白芳的文章，看看我到底说了什么，”但再一想，如何解读“八五事件”，在当今的中国，不是一个纯学术问题，不要太书生气了；“当下绑架历史”是个屡见不鲜的现象，不必大惊小怪。

因此，我虽然恪守一个历史工作者的职责，厘清应该厘清的事实，却对“宋要武神话”的消弭不抱幻想。我想它会成为一个文革传说而流传下去。毕竟，它是一个如此饱满的好故事。

<sup>10</sup> 《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新华出版社，2008，第106页。

## 六. 宋彬彬和“宋要武”

我因为调查“八五事件”，通过刘进认识了宋彬彬，并对她进行过几次采访。在一次有关活动结束后，宋彬彬骑自行车在寒风中离去。我身旁一位同学说，街上行人有谁会想到这个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老妇人，就是当年很多人谈虎色变的“宋要武”啊。我不禁想，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宋彬彬”。

一个是那个骑车远去的宋彬彬，我对她已有所了解。她性情温和，不善言辞，在人群中不抢话、不冒尖，遇事也不是总有主张，平凡得几乎令人失望。在几次访谈中，我感到她并不是一下子什么都对我讲（关于她1966年秋天的武汉之行，她就是一点点地讲出来的）。不讲的原因，倒不是为了自我保护，而是为了保护他人和维护老一辈的正面形象，尽管她自己因为“不讲”而受到多年的曲解和栽赃。我并不认同她这样做的政治理由，但从她的做法中，我还是看到了她为人的厚道。

另一个宋彬彬，更确切地说，“宋要武”，是个符号，不是真人。在一些人的笔下，她欠着六、七条人命，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

像很多人一样，我曾经不相信宋彬彬从来没有改名叫“宋要武”。领袖赐名，是何等的荣光，受宠若惊还来不及，谁会那么不识抬举？

但经过对这个问题的反复查证，我接受了宋彬彬本人的说法：她从来没有叫过“宋要武”。“宋要武”的名字是《光明日报》一位记者紧接着八·一八领袖一句“要武嘛”之后造出来的，它的出现那么合乎那个时代的情理，立即被几乎是宋彬彬之外的所有国人接受。在这个意义上，不是伟大领袖，而是全国人民给宋彬彬改了名，其中不排除许多人与有荣焉的心理。

八·一八后，我们学校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写给宋要武的信件，因为长期没人拆看，都在传达室里堆着。一位同学出于好奇，打开了其中的一些来看。多年后她回忆，说来信不外两个内容，一是向“宋要武”致敬，二是向“宋要武”汇报当地文革情况。这些人需要“宋要武”的存在，他们也参与了“宋要武”的制造。

几乎就在人造的“宋要武”出现的同时，红色恐怖席卷北京城，“要武”在霎时间化为成千上万臂戴红袖章“革命小将”的行动。八·一八是个极具象征意

义的历史事件，是个令很多人想起仍然心悸的日子，是大规模“红色恐怖”的开幕式。在很多如惊弓之鸟的百姓心中，“宋要武”——“红卫兵”——“暴力”形成一条牢不可破的逻辑链条。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从心底不能原谅“宋要武”，不能原谅“她的”红卫兵犯下的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用我听到过的一个的说法，宋彬彬从此被“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作为一个符号，“宋要武”有着太强大的象征力量，真实的宋彬彬在它的面前苍白无力。

湖北省委在1966年9月初请宋彬彬去武汉。他们请的是“宋要武”，不是宋彬彬。这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无视宋彬彬本人的意愿，坚持以“宋要武”的名义发表保湖北省委的公开信。“宋要武”成了一根省委打压他人的棍子。

很可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反对湖北省委的一派开始制造宋要武打死多人的谣言，以此来抹黑对方。我和我的同学们就是在大串联的途中在武汉或者长沙看到这样一份传单的，当时我们都觉得这个谣造得太离谱。但不管怎样，在反对派的眼里，“宋要武”名字本身即授人以柄。叫的是“要武”，她不杀人谁杀人？

北京制造的“宋要武”，转了一圈从外地回京后，已经成了血债累累、人人喊打的凶手。可以写一篇“宋要武诞生记”，会是绝佳的黑色幽默，或者写一篇“四十余年来宋要武对宋彬彬的骚扰”。

只有宋彬彬本人知道这个骚扰是什么滋味。

具体的真实无法抗衡象征的强大，这就是我们面对的荒诞的现实。“假做真时真亦假”，一个文学家可能比一个历史学者更能应付现实的荒诞。

但我还是要问：具体的、真实的、活一岁老一岁的宋彬彬和“宋要武”是什么关系？她应当对人造的、她本人从未接受过的“宋要武”及以“宋要武”名义造成的恶劣后果承担责任吗？这些问题，文学家可以不问，但做历史的不能不问。

### 七. “偶然”与“必然”，“规定”与“自选”

宋彬彬八·一八上天安门给毛主席戴袖章，是她在历史上的“定格”。在短暂的风光后，八·一八成为当时只有19岁的宋彬彬挥之不去、笼罩了她一辈子的阴影，成为她四十几年来背负的一座无形的十字架，成为她生命中一道深深的刻痕。

而这一切在开始时，却似乎充满“偶然”。

现在我们知道，八·一八那天把“革命小将”请上天安门城楼，是“上面”临时做出的决定。<sup>11</sup>据刘进回忆，女附中有40个名额（当时不知道是上天安门城楼），她决定自己不去，让宋彬彬带队去。当时的刘进，是学校筹委会的“一把手”，也是当时已经出现的女附中红卫兵主要负责人，宋彬彬应该算是刘进的“左膀右臂”。

如果我的看法不错，女附中“红卫兵”（不包括另一个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红卫兵组织）对“红卫兵运动”最大也是唯一的“贡献”，就是在窄窄的红布条上描上“红卫兵”几个字，字是从不同的地方收集的毛泽东手迹。从8.18当天的纪录片上看，当时各校红卫兵戴袖章的并不普遍，上面有字的就更少。袖章上带有毛泽东手书“红卫兵”字样，很可能是女附中的发明。（自从宋彬彬给毛戴上袖章，带字袖章即广为流行。）有女附中同学回忆在八·一八之前赶制带字袖章，说做出来的数量有限。宋彬彬说，她临上天安门前，有人特地把带字的袖章换给她戴上。点明这一细节，是因为袖章这个“道具”对宋彬彬很重要，而这个道具的存在有偶然性，就像刘进本来可以决定由她自己带队去天安门，而让宋彬彬留守广场一样带有偶然性。

不只一个人回忆当时天安门城楼上有多乱，“小将们”在党政军领导人中间串来串去，场面相当失控。据宋彬彬回忆，其他中央领导大多已经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但谁去给伟大领袖戴袖章却要更加慎重，连小将们也知道这个问题需要请示。人群中有个男生推了宋彬彬一把，说，“你上”。这个男生还说了一句：你的袖章挺好的，为什么不给毛主席献上？

请示的对象——一位中央部门的负责人，恰恰对宋彬彬的家庭背景知根知底——他认识这个孩子。这里，是宋彬彬而不是随便某一个在场的红卫兵给毛主席戴袖章就不能全说是偶然的了。“政治审查”即使在紧急时刻也不能少，而这时“脸熟”很重要。

这一切都发生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在亢奋、混乱的氛围中。城楼下，是一片喧嚣的红色海洋和无数只挥动着的手臂，数十万人含着热泪高呼领袖万岁，对毛泽东的崇拜达到了白热化，没人能说清此时此刻中国首都正在进行的是一场政

<sup>11</sup> 张辉灿口述：《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内情》，《炎黄春秋》2006年第4期，第17-23页。

治集会还是宗教盛典。在这一特定的场景中，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袖章。据宋彬彬说，戴袖章时她很有些紧张，生怕别针扎了伟大领袖。毛泽东那天穿的是军装，这是他1949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惊人之举，也是他文革“再次发动”以来一系列戏剧性举动之一。给高调支持红卫兵的“红司令”戴上红卫兵袖章是那个时刻的应有之义，是那个历史场景中的“规定动作”，而非任何个人的“自选动作”。这个动作由宋彬彬而不是别人来完成，说来颇为偶然，不知多少人对她羡慕死也。

宋彬彬的名字瞬间传遍大江南北；宋彬彬因此而成为红卫兵的“脸”。

其实风头本该由北大附中彭小蒙出的。被“江青阿姨”视为“小太阳”的是她，八·一八那天被指定代表红卫兵在大会上发言的是她。结果大家把发言的人忘得一干二净，只记住了给领袖戴袖章的，这对彭小蒙不够公平。无论讲“造反”的经历，还是讲引领时代潮流的精神（这个潮流包括语言、行为、“做派”、服装、发式等等），北大附中“红旗”的领袖彭小蒙都远远比宋彬彬更有资格代表当时的红卫兵。让既无突出个人表现又讲不清楚自己哪天成了红卫兵的宋彬彬代表红卫兵，实在是历史的误会。但自从有了“宋要武”，宋彬彬不代表红卫兵，全国人民都不答应。

历史不但充满偶然，也不断制造误会。

## 八. 红卫兵历史是一笔糊涂账

这里的“红卫兵”，特指1966年初夏开始在北京中学生中出现的青少年团体。八月初，他们由伟大领袖引领上了中国政治的舞台（而非自己“登上”的舞台）。到了这年冬天，他们成为风光不再的“老红卫兵”。

我在做“八五事件”调查时，对女附中红卫兵历史做了一些了解，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对女附中曾出现过的两个红卫兵群体，对其中被简单称作“红卫兵”（另一个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基本历史，当事者语焉不详。比如说，“红卫兵”是哪天成立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子，有无纲领，成员加入有无程序，等等，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女附中红卫兵历史是一笔糊涂账。

我本人当过“红卫兵”，是个“小萝卜头儿”。从我以为能说清这些问题的当年红卫兵负责人那里得不到答案，我只好反过来问自己：我是怎么当上红卫兵的？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我认为自己能当，也没人质疑，我就是了。有个组

织吗？好像没有，就是有时和班上一些也自认为是红卫兵的同学呆在一起。但不和她们在一起，甚至不去学校，也没人管。谁是我们的“头儿”？班上有几个比较“厉害”的人物，但她们是头儿吗？好像也不明确。问问其他一些人，感受也很近似。

有一天我恍然，原来女附中的“红卫兵”是在得知毛泽东支持红卫兵（“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之后的某一天“一轰而起”的。听起来是个“组织”，但因为是在领袖已经开口支持、大家急忙赶风潮的“大拨轰”形势下出现的，已经没人记得它出现的时间，也没有成立的仪式。和最早成立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不同，这个时期大量出现的北京城区学校红卫兵并非自发，也毫无风险。当时衡量人的唯一标准，就是家庭出身，能否当上红卫兵，全凭家庭，和本人表现无关。这也不同于初期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他们是因为共同的理念走到一起的，并不特以家庭出身划分人，成员中包括少数“非红五类”同学。

在我心目中，学校里红卫兵的“头头”是刘进、宋彬彬等人，但多年后得知，刘、宋二位早在八月十九号就不再担任学校文革领导职务，而我一无所知，从中也可看出当年松散的情况。因为种种原因，我比较早就不想在红卫兵里混了，但“加入”没个程序，“退出”也不用和任何人打招呼，心里想着我不是[红卫兵]了，我就不是了。人们往往忘记，对相当多的中学生来说，那是个自由散漫、各自为政、没人管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这个阶段各个学校的红卫兵有着严密的组织，不如说它往往是由一伙伙“革干子弟”组成的“乌合之众”。他们在八一八林彪亲自号令“破四旧”之后，杀向社会，上下直接联手，搅得周天寒彻，使北京一度成为一座在最高当局认可之下的血腥恐怖之城。这个现象，在中外历史上怕不多见，后人很难想象。

回到女附中“红卫兵”：在那样一个大形势下，它一笔糊涂账的状况并不奇怪。但从清华附中“红卫兵”5月底成立，到“西纠”8月下旬、9月份的一系列“通令”，到“老红卫兵”阶段的“联动”，这中间值得探究、有历史价值的东西还很多。据我所知，近年来当事者们已经开始写回忆，但扑朔迷离的地方仍有不少。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中“糊涂账”比比皆是。一个号称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其实对历史的态度十分马虎、非常实用。

我在此呼吁红卫兵历史的当事人都来写写回忆录，我们这代人已经到了写回

忆录的年纪。我猜测，很多人不说或不写与红卫兵被彻底妖魔化有关。今天，红卫兵在世人眼中，几乎等同暴力。我本人也认为，血统论与暴力是这一阶段红卫兵最重要的两大特征。但深入去想，我认为可以对这一阶段红卫兵做进一步分析，至少可以大致区分出“精英红卫兵”与“普通红卫兵”、“政策策略”型红卫兵与“鲁莽暴力”型红卫兵几类；此外，城区（西城、东城）红卫兵和郊区（海淀区）红卫兵也有所不同。

早在“红八月”开始之初，清华附中红卫兵就发过紧急呼吁书，反对暴力和过激行为，这些人应属于“精英”加“政策策略”型红卫兵。同属于这个范畴的，还有发布了一系列通令的“西纠上层”，他们在“红色恐怖”最猖獗的八月下旬（此时公安警察已被明令不许干预“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企图“以兵制兵”，遏制住暴力的狂潮。一度，偌大的京城在一定程度上是靠一批不满二十岁的青少年维持秩序的。对这段离奇的历史，尚无学者做认真探究。但清华附中红卫兵是“造反有理”的最早鼓吹者，而一旦人们起来“造反”，便没人能控制它表现的方式了，这恐怕令反对暴力的精英们感到尴尬。在血统论甚嚣尘上的1966年八月下旬成立的西纠，则带有一股与生俱来的蛮横霸道之气，与反动腐朽的血统论有不解之缘。西纠虽然在若干个“通令”中呼吁反对暴力，但自己并没有严格执行。我本人对西纠在“遣返黑五类”中的作为，就有很多疑问。加以西纠名义活动的人品很杂，其中有因施暴而恶名昭彰的。这些都使得全盘否定西纠十分容易，很得人心。

但红卫兵不是铁板一块。在当年那种非常时期站出来反对和企图制止暴力的红卫兵，和手抡皮带草菅人命的红卫兵还是不能等同，不应放进一口锅里煮，虽然即使是“政策策略”型红卫兵也带有极大的局限性。再进一步说，当年的历史，上层和下层交织，纷纭诡异复杂，“水”不但浑而且深，很多事情还不那么清晰。所谓“糊涂账”，也包含这一层意思。

四十多年过去了，要区分不同种类的红卫兵有什么意义吗？我问自己这个问题。我想，意义就在于这样做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而真实的历史从来就不仅只有黑白两色。在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反思，才有说服力，才是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

提出对红卫兵要有所区分，是件担风险的事。我深知以我的“家庭出身”，

极易被人攻讦，我这是将自己送到喜爱贴标签扣帽子的朋友们门上了。但这些年来做“八五事件”的经历让我明白，在当代中国做信史，就得准备挨骂。对我来说，这是历练。

## 九 教育者的责任

在最近关于当年打过人的红卫兵给老师道歉的讨论中，有人提到教育者的责任，这是我多年来欲说还休的问题，今天索性将它和盘托出。

首先要说明的是，教育者们，不管是老师，还是校领导，都是当年教育路线的执行人，而非始作俑者，审视他们的责任，应该也只能在这个框架之下，这是需要十分强调的。

回到1966年女附中“八五”事件的现场：斗争校领导的动议，是高一年级某班一些干部子女最先提出的，当时革命是要有“出身”做资格的。而文革前，这些学生曾经和全校其他干部子弟坐在一道，在礼堂听校领导告诉她们：你们的担子比一般人更重，老子打江山，要靠你们来接班。这是一次专门为干部子弟召开的大会，我也在场。

换句话说，八五那天斗争校领导最活跃的一批人，是曾经被校领导视作对革命事业有特殊责任的人。当然，不仅仅是校领导，社会的四面八方都对出身“干部家庭”的革命“骄子”们表达了同样的期许。这是文革前夕“革命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

受到“革命文化”熏陶的，不只是出身“红色家庭”的人，而是全体学生。据目击者说，八五那天参与暴力行动、上手打人的不仅有干部子弟，也有少数非“红五类”出身的。一时间，“你一下，我一下”，是个“群情激愤”的场面。但我坚信，施暴的骨干，非干部子弟莫属。

眼前的悲剧所以悲，不仅在于它导致了卞校长的最终死亡和给其他四位校领导带来终生的肉体和心理创伤，而且在于它充满了讽刺和悖论：这些女学生相信她们的所作所为是“革命行动”。我的记忆里，从1964年以来，在“阶级斗争”之弦越拧越紧的大形势下，学校政治教育的基调是如何将“革命”进行到底。无论是校领导，还是班主任老师，都是按照这个基调教导学生的。这使得文革开始后出现的“学生打老师”具有一种特别的含义。在我看来，我们这代人的“革命”，

具有相当程度的“表演”性质（performance）。文革提供了“舞台”，但对我们“角色”的培养，并非自文革始。

我后来得知，女附中的两位主要负责人卞仲耘和胡志涛，因为八月四号下午挨了莫名毒打而上告无门，八五那天离家去学校时，是做了“最坏的准备”的，说是去赴死也可以。平时衣着极为朴素的她俩，那天都穿上了最好的衣服。

死，也要死得有尊严，死得漂亮。

但不是死在传统意义上的“敌人”手里，死在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手里，而是死在自己学生手里？！卞校长，您当时想到这有多荒唐吗？

据在场的同学回忆，卞校长那天穿的是一件绸质短衫。那件衣服后来浸透了鲜血，皱成一团。

胡校长穿的一条做工精致的黑色长裙，被从下摆一直撕到胯部；她穿的浅色短袖衣，被泼满了墨汁，变成黑色。

卞校长去世后，胡校长成了学校“头号走资派”，我不只一次看到她在校园里受到一些低年级学生的围攻辱骂。她总是昂着头，挺着胸，大气凛然。我们很多人都暗中钦佩她。多年后我才知道，自从八五挨打后，她的腰必须靠金属支架来支撑。

胡校长于1995年去世。据王友琴同学说，胡校长生前接到一封学生的道歉信，对八五那天她参与打人道歉。她是多年来唯一向胡校长道歉的人，她的信没有署名。胡校长表示，她原谅所有打过她的学生。

最近，读到《读书》杂志创始人范用先生的遗嘱。范用先生和胡校长同属一代人。遗嘱写到，“我……一生……说过不少错话，办了不少蠢事。生于今世，很难有人能够逃脱这种历史的嘲弄……讳过饰非，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sup>12</sup>“历史的嘲弄”几个字引起我的注意。

对教育者的责任问题多年来我欲说还休，因为实在不忍。文革爆发后，她/他们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但我现在想，以胡校长的通透睿智，以她对教育事业的忠贞不二，以她一生坎坷的老革命经历，她一定也反复问过自己，当年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革命”出了什么毛病？

<sup>12</sup> 《追思范用》，载《读书》2010年第10期，第4页。

## 十. 道歉还是不道歉，这是个问题

最近因为原北京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向老师道歉，引起人们对当年打过人的学生对老师道歉的关注。这些年，我陆陆续续听说一些道歉的事情，包括对曾经被伤害的同学道歉，可见与文革有关的道歉并不是一件刚刚开始做的事。但学生向老师道歉的消息仍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究其原因，是因为当年“打老师”并非个别现象，连小学生都有干的，而今天公开出面道歉的人太少了，“物以稀为贵”。

在女附中“八五”事件中上手打人、动嘴骂人的，不是一个、二个，三个、五个，也不只涉及一、二个班级。但至今我们知道的、因当天参与暴力活动（包括语言暴力）而道歉的，只有不知姓名的一个人。

由于卞仲耘之死已成为恶名昭著的文革暴力案例，有人出于义愤，把女附中文革开始时所有在校生的名单贴在网，指出“凶手”就在里面，借此形成舆论压力。

这个做法并没奏效，没有人因此而站出来。

有个叫哈里斯的美国人，据说是学法律出身的前检察官，不远万里，到中国来“办案”，企图找到“杀害卞仲耘的凶手”。看来他效仿的是战后西方人士四处捉拿纳粹罪犯归案的榜样。但到最后不了了之。

即使如此，要找出杀害卞仲耘“真凶”的呼声至今未断。

所有这些的背后有个假设，即存在一个或几个不仅有杀人动机、而且在行为上直接导致卞仲耘死亡的凶犯。

遗憾的是，在现实中，“八五”事件并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罪责明确的凶手。

在《好故事》一文中，我曾针对哈里斯先生说：“我不认为卞仲耘之死的惨剧是个易于审理的法律问题。法律不是全能的，特别是应用于由最高领袖有意制造的‘天下大乱’的非常时期。在一度出现‘你一下、我一下’众人参与打人的混乱情形下，到底谁是‘凶手’？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成为很多人最高信条的时代，如何判断个人还剩下多少‘自由意志’和‘是非标准’？这样说，绝不是否认个人应负的责任，而是说，事情不像哈里斯先生想的那样简单明了、黑白分明。”

在“红色恐怖”猖獗的1966年8月，多所北京中学出现学生打死校长和教师的事件。到今天，没听说哪所学校有人站出来承认参与过此类恶性暴力，更不要

说承担打死人的责任。“凶手”阙如是个普遍现象，不只女附中一家。因为普遍，所以值得问一个为什么。

仅仅从道德的角度不能解释这个令人悲哀和失望的状况，它后面有更深层的原因。简而言之，怎能轻描淡写地放过最上峰在暴力问题上怂恿放纵的责任，而一味责难受到鼓励教唆去“砸烂旧世界”的青少年呢？更何况这些青少年在文革开始前受到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崇尚暴力革命的教育。

如此，我们面临一个历史的难题：在没有厘清上层责任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完全不谈个人应当承担的责任？

这实在是一个困扰了我们这代人几十年的问题。或清晰，或含混，我在不同场合听到不同的人在议论。一个伤害过他人的人如是说，我那时才16岁，是响应号召……

原北京外语学校那些曾经打骂过老师的人，显然有不同的看法。他们选择了向老师道歉。他们的行为，令受过伤害的老师们深感欣慰，也得到了社会上普遍的赞许。

道歉还是不道歉，这是个问题。

如前所述，这个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场景和语境去看，涉及诸多层面。要让当年的青少年担起全部的历史责任，对他/她们是不能承受之重。“推诿”的做法有它的道理，甚至“有情可原”。

但毕竟，即使在那个癫狂的时代，不管怎么有限，仍然存在一定的个人选择空间。做什么，怎么做，还是要经过每个人的心灵和大脑。有人下得去手，有人下不去手，有人呐喊助威，有人悄然离去，这中间，还是有区别的。区别在每个人的“心性”。在八月五号的女附中，“心性”的微妙差别没有改变卞校长最终死亡的命运。但“心性”可以全不算数吗？

勇于道歉的人，承担的是个人良知的责任。我一直认为，不是什么问题都可以归结于道德，但在这里，感动我们的确实关乎道德，关乎人之为人的羞耻之心、向善之心。唯其稀少，尤足珍贵。

作为“学生斗老师”那代人中的一员，我为同辈人的道歉所感动；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我不会因此而放弃对文革始作俑者的追究。

2011年6月修改

## 【评论】

## 政治符号与被符号

——大寨、陈永贵·邢燕子·宋要武

梁幼志

人类离不开符号，从商标到国徽，从甲骨文到奥运吉祥物，符号无所不在。因此有了各种各样的符号学。但是，从索绪尔到罗兰·马特，从查尔斯·皮尔士到安伯托·艾柯，似乎都冷落了政治符号。

政治的功能之一，就是将事物符号化，即将某一事物赋予某种抽象的意义。无论是思想一元的旧时代，还是以一元统帅多元的新时期，中国的政治都最擅此道。“戴帽子”是符号化的形象说法，“挂牌子”是符号化的具体演练，媒体宣传、巡回报告是符号化的必经之路。它们的功能都是贴标签，让人们一看，就知道谁是阶级敌人，谁是革命榜样。以便于教育学习或口诛笔伐。

文革十年，政治渗透到生活的每个毛孔之中。政治符号也进入史无前例的大发展时期。武训、雷锋、大寨、陈永贵、邢燕子、刘文彩、收租院这些文革前产生的符号，在经受了“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考验之后，有的打入冷宫，有的红得发紫。红卫兵、黑帮、黑线、黑五类、造反派、走资派、陈里宁、宋要武、黄帅、张铁生等新生符号，一时风起云涌，走马灯似地搅得周天寒彻。

那么，什么是政治符号，为什么某些事物会被符号化？政治符号与被符号有哪些特点？“被符号”与政治符号之间是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号学问题。笔者愿以浅见拙识就教于方家。

## 什么是政治符号？以大寨和陈永贵为例

让我试着给政治符号下一个定义：政治符号是在某一时期，由国家制造的，为完成某种政治使命而被广泛宣传的、抽象性的标识或记号。

定义总是枯燥又费解。让我举一个尽人皆知的例子——

大寨是个政治符号。此符号诞生于1964年。这一年3月，毛泽东南巡，走到邯郸，从陶鲁笳的汇告中发现了大寨。喜不自禁。以至走一路，说一路——每召见一位地方大员都要说：“大寨是一面旗帜，你们学不学？农业要过关，没有

大寨那种精神不行啊！”<sup>13</sup>同年12月，这个位于太行山脉的七八十户人家的小山村，被确立为国家级的政治符号——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宣布：“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提倡的。”

在各级政府总动员的同时，全国媒体以百倍的努力，千倍的热情将这一符号不舍昼夜地灌输给六亿蚁民。仅新华社一家，对大寨的报道每年就不少于三万字，全国媒体的报道上千万字。学大寨的书籍车载斗量，介绍大寨的会议成千上万，到大寨参观的人次突破万万。大寨成了农民的人间天堂，成了国人朝圣的“耶路撒冷”，成了第三世界国家农业的发展方向。

那么，这一符号的真相如何呢？

大寨被树为自力更生的榜样，号称没拿国家一分钱。1980年中央调查组告诉人们，十五年来，大寨占地方便宜无数，国家“吃偏饭”难以计算。架电线、建水库、修人造平原和农田基本建设，甚至农忙时的人工都来自外单位的支援。

大寨以粮食产量傲世。实际上，从1973到1977年，五年虚报粮食产量两亿七千多万斤。比这五年实际粮食产量多报了近24%。<sup>14</sup>隐瞒农田三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6%。“这么多帮忙田，不仅少缴农业税，什么‘过黄河’、‘过长江’就是一句大谎话了。”<sup>15</sup>

大寨与陈永贵是连体胎儿，陈从大寨大队的一介支书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靠的是毛泽东——毛选中这个连体胎儿，是因为它可以为三年大饥荒遮丑，为人民公社打气。

文革期间，昔阳县非正常死亡141人。农村132人，其中直接被打死的2人，上吊死的62人，跳井死的28人，服毒死的13人，跳崖死的5人，投河、水库、水池、水窖、水瓮死的7人，卧轨死的1人，因批斗致病而死的13人。县直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死9人，上吊死3人，跳井死2人，触电死1人，服毒死1人。原昔阳县委书记原耀先，一说是自杀，一说是他杀，一直没调查清楚。文革后调查，这“141人全是冤案和错案。”<sup>16</sup>

1980年11月23日，中发83号文件：“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山西省内推行

<sup>13</sup> 张英茨：《陈永贵本事》，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8，第28页。

<sup>14</sup> 见1980年7月7日《人民日报》。

<sup>15</sup> 张英茨：《陈永贵本事》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8，第81页。

<sup>16</sup> 张英茨：《陈永贵本事》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8，第115页。

大寨经验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推行左倾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sup>17</sup>

这是个舍车保帅、文过饰非的文件——大寨之害并非自文革始，把责任推给了文革，也就是让林彪、四人帮为“大救星”背黑锅。不过，阿弥陀佛，不管把责任推给谁，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这座大山总算搬掉了。其首义之功，不在中南海，而在安徽凤阳小岗村。

### 政治符号的属性：工具与骗局

大寨和陈永贵提示我们，政治符号至少有如下两个属性——

第一，它是工具，是个为了眼前的功利，而不管明天是否洪水滔滔的工具。20年前，邹谠为这个工具的生产厂家起了一个含蓄的名字——“全能主义”。全能主义的工具也很全能——它是打击政敌的棒子，是攀登幻想之城的梯子，是社会动员的宣传队，是虚报浮夸的播种机。

第二，它是个“大忽悠”，是为了政治需要制造的伪劣商品。这个商品的基本特征是虚假，常用手段是歪曲、片面、编造。其主要任务是把问题、缺点、毛病藏着掖着，把成绩、好处、优点夸大一万倍，以达到根本的目的——误导民众。

除此之外，政治符号还有一些大寨和陈永贵所概括不了的特点，比如，它的多样性。政治需要多样，符号自然多种。雷锋是为忠君爱党的，刘文彩是为万恶的地主阶级的，刘文学是为阶级斗争的，邢燕子是为扎根农村和上山下乡的，黄帅是为反潮流的，张铁生是为教育革命的，陈里宁是为打倒刘少奇的，宋要武是为号召红卫兵起来搞暴力的……

多样之外，还多变。政治是个变量，尤其是文革时的政治，就象山里的天气，小孩儿的脸。当政治变了脸，旧符号就成了废品。新政治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它扔到一边，再去制造新符号。

政治符号的特性还有，这里说的只是荦荦大者。无论是什么符号，在政治需要它的时候，都会通过国家机器，以无孔不入的宣传，无处不在的教育，把这个符号弄得家喻户晓，就像张裕葡萄酒广告似的。

<sup>17</sup> 张英茨：《陈永贵本事》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8，第279页。

### 政治符号的寿夭：雷锋与陈里宁

同为符号，其夭寿大不相同。有的生命短暂，像庄子所说的不知春秋的螻蛄。有的长命百岁，“如南山之寿，不騫不崩。”

有人以为，既然政治符号是政客鼓捣出来的，其久暂一定与选中它的政客的政治生命相始终。这是一个误解。一般来说，符号中普世价值的含量越高，这个符号活得越长；越少，活得越短。

在毛泽东时代制造的符号里，活得最长的，大约是雷锋。这要托庇于其中助人为乐、勤俭节约等普世性内容。我们今天学雷锋，大都学的是这些东西，而不是学他的愚忠，他的方向盘，他的革命螺丝钉。

在这个时代，活得最短的符号，大约是陈里宁。此人在1960年代就开始反刘少奇，批判《修养》。还多次给毛、周、林等中央领导写信，指斥刘少奇是“三反分子”。曾三次被单位送进精神病院。1967年1月初，他被清华大学的红卫兵从红卫医院（安定医院）挖掘出来。戚本禹得知其事迹，感慨：“这个人很了不起，那么早就看出刘少奇是修正主义者，我自愧不如。”

从此，陈里宁即被中央文革冠以“反刘少奇英雄”的光荣称号。大报小报一齐宣传，话剧《新时代的狂人》在天津、北京、郑州等大城市上演。这位英雄调入社科院历史所。请他做报告的造反派蜂拥而来，一时大红大紫，妇孺皆知。可是，没多久，人们发现他常常把马、恩、列、毛的话改成自己的话。于是，这位英雄成了“假反刘少奇，真反毛主席”。负责与他联系的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被捕入狱，其第一大罪就是参与包庇“反革命分子”陈里宁的翻案活动。这个“反刘少奇”的符号从红紫到湮灭不过半年。

### 被符号者种种：“顺竿爬”、“守本分”及其它

近年来，“被”什么什么成了风尚——被自愿、被自杀、被就业……。其实早在六十年前，好多人和事就都“被”起来了——被肃反、被胡风、被右派、被洗澡、被上楼、被放卫星、被牛鬼蛇神……。这其中也有“被符号”。

“被符号”的定义比政治符号要简单得多：被符号是政治符号的承载物，是具体存在的人或事。

被符号的事，也是人干的。所以，这里只说人。被符号的人形形色色，他们对待符号的态度，或者说，与符号的关系大致可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顺竿爬”。虽说所有的被符号者起初都是被动的，但这一类人一旦被符号，就会变被动为主动。他们把这个符号抱在怀里，贴在心上，爹亲娘亲不如这个符号亲，天大地大不如这个符号大。

陈永贵是“顺竿爬”的佼佼者。背靠“农业学大寨”这棵大树，他以“反大寨”、“反陈永贵”的罪名整肃昔阳，不管是谁，一旦背上这个罪名，“轻则批判斗争，重则关禁闭，办‘学习班’，甚至由法院判刑，也可私设公堂，捆绑吊打，严刑逼供，打死逼死也不负法律责任。”<sup>18</sup>

大寨是靠记者吹起来的，可在陈永贵眼里，“百分之九十五的记者是反大寨的。”<sup>19</sup>因为记者要了解情况，要采访大寨人，而这是陈永贵严禁的。“来大寨工作的各方面的人，和大寨人合不来，矛盾闹得最大、问题出得最多的，要数记者这一行。”这是他在1968年9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说的。他认为，“总结不出大寨经验，写不好大寨文章的记者，是受刘少奇的毒太深，有名利思想。”<sup>20</sup>

对昔阳之外，陈永贵祭起了两个法宝，一个是“不学大寨就是反大寨”。一个是“学大寨要不走样”。为了不走样，山区砍光了林木，草原沙化了草场。东北某大队在一马平川的黑土地上，用人力堆起了一座土山，上面造出了一级一级的梯田。不用说，这个大队成了学大寨的先进典型。<sup>21</sup>

在被符号者中，像陈永贵一类的毕竟少数。多数是比较本分的。他们没想投机，却身不由己地成了符号，虽然当上了官，有了权，为毛泽东的路线跑前跑后，但没诚心害人。

邢燕子就是这类“守本分”的被符号者。这位1958年初中毕业后回乡务农的女青年，无意之中成了上面稳定农村人心，安排城市就业，号召青年上山下乡的先进典型。被毛接见了5次，周恩来接见了13次，从大队、公社、县、市到省，从妇联、共青团到贫代会，担任过大大小小16个职务。官至中央委员、天津政协副主席、天津市委书记。但是做市委书记时，为了烧火做饭，她还得到地里捡柴禾。她唯一的特权就是开会有车接送。她最大的光荣，就是跟毛、周合影。

<sup>18</sup> 张英茨：《陈永贵本事》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8，第41页

<sup>19</sup> 同上，第42页。

<sup>20</sup> 同上。

<sup>21</sup> 同上，第37页。

在被符号者中还有一类，我们不妨叫他们“冤大头”。他们因为个人条件以及某种特殊原而被符号化。尽管他们从来不曾接受过这一符号，媒体上宣传的这个符号的事迹也与之无关，但历史需要这类符号，人心需要把这个符号。因此，不管他们多么无辜，仍然成了群体心理的寄托，成了社会泄愤的“代用品”。

比如宋彬彬。她没打过人，但是，因为她所在的学校的校长被学生打死，而她在十三天后，又上了天安门，给毛戴过红卫兵的袖章，并被毛戏言“要武”。官方媒体遂将“宋要武”强加给她，小报、传单造谣传谣，说她搞杀人比赛。学者信以为真著书立说。而造成文革的体制、思想、文化多年来不得清算，社会积怨无以宣泄，宋彬彬遂成了历史的人质。

### 被符号者该负什么责任

政治符号是工具，是“大忽悠”，是变色龙，但是，不管政客用这些符号干什么，被符号都阻止不了。就算有那位被符号者识破骗局，宣布与这个符号实行彻底的决裂也没用。政治有一万个办法让他闭嘴。

我们追究被符号的责任，只能根据他在被符号期间的所作所为——他是否为这个符号的工具性、欺骗性添砖加瓦，是否利用这个符号迫害无辜、谋取私利。也就是说，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法律上，被符号者的责任都只能依据他与政治符号之间的关系来判断。

上面说了，被符号者与政治符号之间有三种关系，顺竿爬、守本分与冤大头。

“顺竿爬”的强化了政治符号工具性和忽悠功能，这种人是应该受到谴责的。陈永贵用“不学大寨就是反大寨”，“学大寨要不走样”为这一祸国殃民的政策推波助澜，迫害良善。罪不容赦。郭风莲为他在大寨建墓园，雕汉白玉的石椅，立半身像，并不能改变上述事实，而只能说明这个时代的思想混乱。

“守本分”的，以为自己是为人民服务，其实是为符号服务。这种人是应该反省的。晚年的邢燕子对自己的一生做了这样的总结：“我这一生，就跟说笑话似的。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全是急转弯：我没想出名，却出名了，还闹到中央去了；我没想当官，却有了那么一大堆职务；可是等我想继续革命工作的时候，却突然什么也不让我干了……你说是笑话不是？”<sup>22</sup>

<sup>22</sup> 谭璐：《邢燕子：我这一生跟说笑话似的》，原载《北京青年报》，转引自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http://www.stnn.cc) 2010-01-20

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笑话。它让人们看到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制造的悲剧。它告诉人们，除了陈永贵一类的“顺竿爬”的，大多数被符号者都是政治的受害者。他们被利用、被异化、被愚弄，一旦新桃换了旧符，他们就成了陪葬品。

“冤大头”的最大心愿就是摆脱政治符号。在被妖魔化四十多年后，宋彬彬在给朋友的信中悲哀地诉说：“他们不会不用我说事儿，我的事向来不能被我控制。我的底线就是不说话，不掺合。”半年前，她向同学们吐露心声：“文革中的经历让我只想远离喧嚣，认认真真地工作，清清白白地做人。我不经商不从政，不想出名不想升迁。我只和岩石、空气、数据打交道，对身边的人，我一律坦诚相待。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无论我走到哪儿，谣言和谩骂都永远相伴。”<sup>23</sup>几十年来，被扣帽子、打棍子、揪辫子的痛苦经历，使她已经不指望人们会相信她的话：“我很迷茫、很苦恼，很无望。”<sup>24</sup>

#### “同一论”者：“政治选中你，就说明你有问题”

有人把政治符号与被符号视为一体——“苍蝇不叮没缝的蛋”。政治选中你，就说明你有问题。这是“同一论”者的逻辑。那么，被符号者的“缝”是什么呢？以宋彬彬为例，这个缝就是她的老爹，她给毛戴袖章，毛戏言“要武”，媒体以“宋要武”之名写了文章——这些“缝”丰富诱人，太值得一叮。

在“同一论”者看来，不论宋彬彬是否接受了“宋要武”这个名字，不论她是否参加过红卫兵，是否参与、组织了虐杀卞校长。作为政治符号，她都应该承担这个符号所意味的一切——负载“老红卫兵”的恶名，承担组织杀人的罪责。作为文革暴力的女性代表，她理所当然地要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出于对文革、对制度的痛恨，出于除恶务尽的责任感，这些人的激愤之情压过了理性之光，将矛头指向了一切“非同一论”者。他们认为，所谓“真相在细节”之中，不过是打压文革研究的借口；所谓公正公平，就是为宋彬彬和“无关论”者提供诡辩的机会和平台。允许宋彬彬和她的同学说话就是“替红卫兵翻案”，就是文革沉渣泛起，就是“打着索求历史真相的招牌迫害人”，<sup>25</sup>就是“忙着为可能的凶手、为已经实实在在绝脱不了干系者撇清、涂脂抹粉。”<sup>26</sup>为此，他们以

<sup>23</sup> 见《记忆》2010年，总第47期。

<sup>24</sup> 同上。

<sup>25</sup> 王容芬：《迫害何时到头》，《记忆》2010年，总第49期。

<sup>26</sup> 《记忆》读者来信

极其沉痛的语气质问《记忆》：“你们这样做“对得起卞仲耘亡灵么？对得起在1966年‘红八月’里被主要是宋彬彬们参与的红卫兵小将在街头在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下以革命的名义用棍棒用铜头皮带活活打死的1772名北京底层民众么？毛泽东是祸首！‘要武’是罪魁！这已是历史！无论谁都不可能改变这一铁铸的大历史！”<sup>27</sup>

“同一论”者没看到被符号们的差异和复杂性。他们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从情感出发。对于不合心思的事实和明摆着的错误，采取不理睬、不承认、不讲理的“三不主义”。他们以民主、自由、人权、思想文化多元为政治诉求，但是，知与行之间常有距离。这个距离没有产生美，而是产生偏执、偏见和偏激。这“三偏”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为文革制造殉葬品。在他们看来，既然当局没有惩办“红八月”的凶手，那么，“宋要武”就应该代表凶手出席公审大会。既然最大的恶人还款享着人间的香火，那么，为毛戴袖章的宋彬彬就应该老老实实在当一个“现代秦始皇”的兵马俑。

“同一论”者反对制造政治符号的体制，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当他们非要把宋彬彬等同于“宋要武”的时候，干的正是他们所反对的事。“同一论”者为文革受难者伸张正义，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制造着新的受难者。

当然，“同一论”者不会这样考虑问题。他们坚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可以不择手段的。既然是在为中国的民主自由而战，那么他们的一切手段就都是善的。这种目标和手段的天然协调统一，使他们不必为事实担忧。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只要中国民主自由了，给不同意见者扣扣帽子，贴贴标签，或者制造些冤假错案，也算不了什么。

刘宾雁说得好，每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

### 实验中学的校庆：在符号与被符号之间

2007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即师大女附中，下简称“实验中学”）的九十年校庆因评选宋为荣誉校友，展出宋的诸多照片和说明，包括8·18宋彬彬给毛泽东戴袖章的照片，引起了海内外对宋彬彬、对校方的强烈批评。

舆论质问校方：宋彬彬在炫耀其血染的历史，在向人类良知挑战，女附中评

<sup>27</sup> 《记忆》读者来信。

选杀人魔头，至少是选组织杀人的红卫兵为荣誉校友，是在为文革翻案！

校方回答：我们评选宋彬彬，因为她是麻省工学院第一位取得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女附中校友。经调查核实，宋在文革中没犯错误；她上天安门给毛戴袖章是组织行为，不是她个人的行为。不应该由她个人负责。

这里的问与答是两回事，舆论说的是政治符号，学校说的是被符号者。

实验中学是两难的：九十年校庆，不能不提文革。那张宋给毛戴袖章的照片是学校与文革关系的最重要的标志，不展它，人家会说你刻意隐瞒。展示它，就会如资中筠所说，“哪壶不开提哪壶。”<sup>28</sup>唯一正确的办法是既展示又批判，但是，校领导没有这种认识，就算有，在大唱红歌的年代，也办不到。

实验中学是蒙昧的，他们认识到的只是上面的道理——他们以为，在学校“九十年图志”上，在“十年浩劫的苦难岁月，不堪回首的历史错位”的标题下面放上这张照片，就尊重了历史。他们没想到，这张照片所代表的符号隐含着多么深巨的历史内容，多么激烈的社会情绪，他们不知道，如此尊重历史，传授给青少年的仍旧“是谎言和颠倒的荣辱是非观”。<sup>29</sup>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自以为“辉煌”的校庆，再一次将宋彬彬置于纵身有百口，也不能辩其一端之地。

从这个意义上讲，实验中学的蒙昧，是国人的蒙昧，实验中学的两难，是现实的难题。实验中学的无知与困惑，是当代社会的一面镜子。

2010-11-25

<sup>28</sup> 资中筠：《能反省历史的民族才有光明的未来》（网文）。

<sup>29</sup> 资中筠：《能反省历史的民族才有光明的未来》（网文）。

## 【评论】

## 谣言是怎样炼成的

韦陀

## 一个谣言的诞生

文革中有一句话：“造谣可耻，信谣可悲，传谣有罪，辟谣有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谣言之盛。所以，当听说林彪折戟沉沙的时候，好多人都以为是谣言。

关于宋彬彬的谣言就是那个时代中无数谣言中的一个。一般的看法是，这一谣言最早源于1966年底的传单和小报上。这些享有短暂而有限自由的造反派媒体，在反“血统论”的旗帜下，同气相求，万众一心，信心百倍地把宋彬彬描写成一个嗜血者，一个杀人狂。

除了了解宋彬彬的人，人们都在不同程度上相信了这个谣言。因为它有坚固的现实基础：

一、红卫兵抄家打人，滥杀无辜，1980年的官方媒体承认：1966年8月至9月仅北京就打死了1772人。

二、北师大女附中（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卞校长被打死，而宋彬彬不但是这所学校的学生而且是学生干部。文革初期，她参加过两个学生组织，其一是工作组时期的学生代表会，是四位副主席之一。其二是8月8日各派学生成立的文革“筹委会”。

三、1966年“8·18”宋彬彬上了天安门，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在问了她的姓名后，开玩笑说“要武”。

四、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文中洋溢着暴力气息，“暴力”、“暴烈”、“暴动”、“砸个稀巴烂”等字眼充斥文中，仅“要武”一词就出现了八次。《人民日报》等媒体迅速转载。

五、宋彬彬之父宋任穷是中共高干——东北局第一书记。在1966年8月1至12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增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这些真实准确的信息，彼此关联、相互证明，为谣言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而在这五个信息中，毛的“要武”和《光明日报》的文章是要害。

拉尔夫·L·罗斯诺给谣言下了这样一个定义：“谣言表达了试图认知生存环境的人们的忧虑和困惑。”<sup>30</sup>显而易见，关于宋彬彬的谣言，表达了民众对红色暴力的恐惧，对生命安全的隐忧。这一谣言迅速而广泛的传播，表明了社会普遍存在的不安和对这一史无前例的革命的困惑。

拉尔夫还认为，谣言“是夹杂了个人对世界的主观臆测的公众信息。”<sup>31</sup>作为个人的主观臆测，变化性，或者说不确定性，就成了谣言的先天特征。传播学也证明了这一点——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会产生变异。比如，宋彬彬打死了什么人，打死多少人的说法，就是四五种之多，有的说，打死了校长；有的说，打死了校长和老师；有的说打死了六个人，有人说，不，是八个。《南方周末》虽然没有指明凶手，却将死难者从一名扩展到五名。<sup>32</sup>

传播学告诉我们，信息在传播中的变异有一个规律——凡是具有刺激性的内容都会在传播中放大增强。这一点跟电影一样，性与暴力之所以是制片方最爱，就是因为它有稳定的票房。电影是讲故事，这类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也会变成故事，经过各种接受者的添油加醋，变得有鼻子有眼，活灵活现，完整自洽，合情合理。于是，宋彬彬就成了一个或男或女的暴力符号，今天在首善之区屠杀黑五类，明天在五羊之城拷打神父、修女，后天现身于武汉三镇，指挥保守派反击……

小报和传单是大众传播，与之相配合的是人际传播。这种口耳相传的原始方式虽然影响有限，但在添枝加叶方面却比媒体来得灵活且精彩——因父亲被审查而行动受限制的宋彬彬，在1969年初冬的一个夜里，在弟弟妹妹的帮助下，女扮男装从家里偷跑出来，到内蒙牧区投奔同学。41年后，她回忆道：“我人还没到，谣言就先到了，说宋要武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无恶不作，许多老乡都很害怕，不敢要我。”<sup>33</sup>

这种事，钦定右派钟惦棐也遇到过。1983年，他到鼓浪屿评“金鸡奖”回来，路过蒲田，初次见他的年轻人都深感失望——在他们的想象中，这个敢于敲着电影的锣鼓向党进攻的主儿，是个“手持左轮、腰系丝带的‘江洋大盗’”，谁

<sup>30</sup> 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4页。

<sup>31</sup> 同上。

<sup>32</sup> 2010年11月4日，南方周末记者杨继斌、朝格图：《一个开始，只能是一个开始》。

<sup>33</sup> 冯敬兰等：《也谈卞仲耘之死》，载《记忆》2010年，总第47期。

诚想，“却原来是个如此这般极不起眼的小老头。”<sup>34</sup>

### 谣言成为“信史”

小报和传单为这一谣言开辟了通向学术殿堂的道路。文革后，文人、学者、教授、知名人士、媒体从业者不约而同地把它写入著述之中。其荦荦大者如：

1985年，乐黛云（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的《面对风暴》，书中把“宋彬彬”误为“胡冰冰”。

1988年，徐友渔的《形形色色的造反》。

1995年，王友琴的《1966：学生打老师》。

1996年，万树英《“太子党”的青少年时代》。

1999年，千家驹的自撰年谱。

2004年，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

2005年，唐德刚的《毛泽东专政始末：1949—1976》。

在此前后，金钟、胡平、王容芬、陶洛诵等人亦有述评。

上述作者在表述上分为两派，一派是“亲手杀人派”，他们直接采信小报、传单之说，言之凿凿地认定宋彬彬有人命。如海外著名国史大家唐德刚就以自信而轻薄口吻告诉人们：“当年替毛主席佩带红卫兵袖章的、在北师大附中就读的高干子弟——小美女宋彬彬，主席嫌她芳名太文雅了，劝她要武一点。果然她就改名宋要武。其后在要武的铜头皮带猛抽之下，就有六个牛鬼蛇神被要武活活打死。后来改革开放了，这个美丽的小杀人犯、murderer（凶手——本文作者注），曾就再度改名到美国留学、结婚、流产。霜晨月夕，面对在暗处徘徊的六条冤魂，不知她姑娘何以自遣良宵？”<sup>35</sup>

另一派是“组织杀人派”，其代表据说是对女附中文革做了最认真调查的王友琴，她不再采信小报、传单上的说法，而是将谣言产生传播的五大现实基础，即前面说的，红卫兵的暴力、宋彬彬在学校的职务、宋给毛戴袖章，毛戏称其“要武”，以及宋父是东北局第一书记等信息合为一体，从逻辑上指认宋是“八五”暴力的组织者，应该对卞仲耘之死负责。

打一个不甚恰当的比喻，“亲手杀人派”走的是“浅水”；“组织杀人派”趟

<sup>34</sup> 钟惦棐：《起搏书》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第441页。

<sup>35</sup> 《毛泽东专政始末：1949—1976》，台北，远流出版社，2005年，第196页。

的是“深水”。水浅易清，宋彬彬是否杀人，很容易弄清楚。深水则不然，那里面有暗礁，有旋涡，有毒鱼……。试图一探究竟的“潜水员”即使躲过了旋涡、暗礁，也免不了被毒鱼咬上几口，不致你死命，也让你难受。

深水就是浑水。谁趟这浑水，谁就是自找苦吃。

于是乎，多年来，“组织杀人派”纵横环宇，如金庸小说中凭借一根竹枝就打败了三千甲士的越女阿青，真正是气吞万里如虎。互联网上更是山呼海啸，征引、评说、介绍无数，愤怒青年、坊间史家、社会贤达，一呼万诺。一个现代版的“曾参杀人”俨然铁案，宋彬彬组织杀人，几成“信史”。

### 艰难的辟谣

在一个法治健全、文化多元的社会里，“一言堂”不可能长久。因为它有多种纠错机制——当事人可以在媒体上辟谣，见证人可以在媒体作证，不同观点的人可以在电视上辩论，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诉诸法律……

而这在中国都办不到。

所以，最早澄清事实的在美国——2002年，因美国学者 Emily Honing 依据王友琴的著述，在一性学论文集中将宋彬彬说成是“八五”事件的组织者。在宋彬彬的努力和美国朋友的调停下，此书的作者、序作者和出版社在一家著名学术刊物《亚洲研究通讯》(*Asian Studies Newsletter*)上向宋公开道歉。”<sup>36</sup>

此后至今，宋彬彬和见证者共有四波辟谣的努力——

第一波在2004年，美国人卡玛在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中采访了宋彬彬。宋告诉人们，她从来没有打人，没有参加红卫兵，没有使用过“宋要武”这个名字，那是《光明日报》强加给她的。这是此谣言快活自在地独霸天下38年之后，第一次在大众传媒上被否定。此片问世后，王友琴向卡玛发难，为宋彬彬辩解的马悲鸣遭到了批判。马的反驳文章被《开放》拒绝。海内外众多达人以各种方式向卡玛表示了自己的义愤。

第二波在2006年。叶维丽在美国发表了英文版的学术文章《卞仲耘之死》。此文的中文版以“白芳”的笔名，发表在《二闲堂》网站上。英文版的一百多个注释，因故未译。此中文版甫一问世，作者即遭到多方指责，网民们斥其为老红

<sup>36</sup> 详见《记忆》2010年，总第47期，此期后面附有道歉方的英文原文和中译。

卫兵翻案，为文革暴力辩护。

第三波在2007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即师大女附中）九十年校庆，校方评选“荣誉校友”。为了借此机会讨还清白，宋彬彬参评，并被评上。但因为校方的颟顸无知与不负责任，使宋彬彬再次成为焦点人物，攻诘、斥骂一时如钱塘大潮。几个出来说明真相的校友亦被网民极尽辱骂之能事。

第四波在2010年4、5月间，《记忆》丛刊出女附中文革专辑，刊登叶维丽、冯敬兰、刘进、宋彬彬、于羚、刘沂伦等人的文章与访谈，再次说明真相，也再次遭到了来自海内外的指斥和攻诘。美国的王友琴、德国的王容芬、西班牙的黄河清、香港的金钟，以及与其同气相应的大陆学人、网民团结一致，众口铄金，斥责说明真相者。《记忆》亦成为众矢之的，罪名同前。

### 坚硬的谣言

按照拉尔夫的说法，谣言有多种多样。除了上面说的忧虑型谣言之外，还有表达心愿的，寄予名利的，暗藏阴谋的，或者是难以解释的。如果说，关于宋彬彬的谣言在文革中表达了人们对暴力的忧虑；那么，在文革后，在暴力的威胁已经远去的岁月里，为什么人们还要坚守它，捍卫它呢？如果说，在国内没有这个环境，那么在思想多元、信息畅通的海外，为什么人们得知了另一种说法，还要为捍卫它而不遗余力呢？如果对极少数人来讲，坚守它有利于个人的名声。那么，对于绝大多数未曾为此著书立说，而仍旧坚守它的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的理解是两个字：心愿。

是的，这个谣言关乎人们的心愿。

在王容芬的谴责中，在金钟的质问里，在敏一鸿、黄河清等人义正辞严的笔下，奔腾着一股浩然之气。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把宋彬彬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就意味着“维护红卫兵的名声和掩盖毛的罪行”（金钟），就意味着“当年的红卫兵控制了当今中国的话语权”（王容芬），就意味着放弃“追究直接责任者、凶手、以至元凶。”而使“参与殴打卞仲耘的一群人都随之金蝉脱壳，让当年全校师生有罪同当，再对毛泽东适当“宽大”，于是“摆平”一切？（敏一鸿）……”。总之，就意味着为文革翻案，让暴力卷土重来，使毛主义九泉重坐，让同胞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然而，正义感不等于具体史实，浩然气不能替代学术研究。好心愿未必有好结果，好故事不等于好历史。

不过，正义感和浩然气至少告诉我们，现实语境对文革研究的限制非但没有达到预想的“维稳”，反而为激进派，为“愤青”提供了广阔舞台。言论的控制，并没有使官史磅礴万里，反倒刺激了民间传说的发展，而民间传说需要好故事。

### 谣言与谎言

红卫兵的暴力造成了社会的大恐惧和大忧虑，这一社会心理为上述谣言提供了土壤和逻辑。在澄清事实，弄清真相的同时，我们还须追问：为什么1966年的中国会充斥暴力？

人们把这归咎于“阶级斗争为纲”，归咎于十七年的“狼奶”教育，归咎于青春期的躁动和叛逆。对，这些都对。但是，人们似乎忽略了一个心理原因——从六十年代初，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层就生活在焦虑、抑郁和恐惧之中：苏联变修了，如果不反修防修，那些被打倒的阶级就要复辟、要变天。我们就要人头落地。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国家机器开足马力，报刊、广播、会场、课堂、电影院，年年月月天天时时刻刻，将这个自制的弥天大谎灌输给国人。谎言就像病毒，将上层的心理疾患迅速传染给整个社会。社会心态从安定变为焦灼，从平和变为忧虑，被视为革命接班人的干部子弟笼罩在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狂躁的情绪之中。

毛泽东发动文革，从心理层面上讲，是要消除自己的焦虑和恐惧，消除的办法之一，就是诉诸暴力——号召青少年横扫社会，纵容他们杀人抄家。对于红卫兵来说，暴力释放了他们的内心的紧张，张扬了接班人威风 and 胆气。

谎言是谣言的导师，是谣言的温床，是谣言的老祖宗。

2010-11-14--16

## 【评论】

## 文革研究杂谈

乌扎拉

## 文革与《红楼梦》

鲁迅说《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种接受的分歧多样其实同样发生在历史身上，比如文革在人们眼中，左派看见民主，右派看见极权，老干部看见迫害，造反派看见反特权，八零后看见荒诞剧，而“维稳”派看见的是火药库。

这并不是说文革是一锅粥，而只是说，文革是一座蕴藏着各种矿藏的大山，各门各派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所需。人们据此创立了接受美学、接受心理学和阐释学，这些玄妙高深的学问，其实说的都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主体的差异性造成了客体的多义性。“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形形色色的人，自然会有形形色色的看法。

乾隆年间，江南出现了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说是剪了人的头发，就会把人的魂魄带走。妖术弄得人心惶惶，坐在太和殿里的乾隆，既担心汉人借此谋反，又担心满人被腐蚀斗志，遂敕令各地严查速办。而各级政府或应付，或拖延，或谎报军情。为什么？美国的汉学家，费正清的接班人，孔飞力（Philip A. Kuhn）教授，穷十几年之力，找到了答案：中国文化虽然统一，但并不同质。不同的社会等级使人们“对于种种相同的符号会有各种不同的解读。尽管邪术让所有的人感到害怕与憎恶，但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将妖术传说中的不同成分重新组合，使之适应自己的世界观。”<sup>37</sup>

文革不同于妖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怕它恨它，热爱它，怀念它的大有人在。河南有个武彩霞，穷大半生之力，搜集文革史料，还秉笔直书，写了本《霜叶集》，专门歌颂文革。<sup>38</sup>

在中国下层，武彩霞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只不过，他们没有武的辛苦和文笔。我举武彩霞的例子是想说明，不是妖术的文革，其成分也可以重新组合，组合成完全不同的文革史。

<sup>37</sup>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第292页。

<sup>38</sup> 胡庄子：《河南女作者出版颂扬文革的〈霜叶集〉》，载《记忆》第58期。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怎么解释文革，也不能否认客观存在和它们的基本属性。什么是客观存在？——史实。而史实之一是：北京市“1966年8月24日至29日打死551人，其中城市地区27日打死88人，28日打死68人，29日打死39人；农村27日打死23人，28日和29日两日打死177人。”<sup>39</sup>

### 文革与现实

历史，无论是古史还是近史，都有一个规律：离政治越近，离真相越远。文革中需要反修反帝和宣传爱国主义，义和团就成了香饽饽。以至于维特克女士认为，江青把《革命自有后来人》改名为《红灯记》，是受了“红灯照”的启发。

政治以利益为转移，政客盯着鼻子底下的事。因此，离政治太近的历史，就会改头换面成了宣教手册，而相关的史料也就成了禁区。

比如上边说的那些骇人听闻的数字本来是应该在禁区里的。它之所以见了天日，首先要感谢管理者的无知和疏漏——北京大学教师印红标先生，一位以研究红卫兵为己任的学者，1993年在北京市档案馆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因为北京新市委存在的时间短、档案少。所以，馆员们将其归入到1966年允许查阅的“文革前”的档案之中。这其中有北京市在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初逐日打死人的官方统计数字。

于是，印先生把整个暑假都交给了这个档案。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他叙述了当时抄录这些档案的过程：“我带着北京大学开具的介绍信，在档案馆付费提档案，一字一字地抄写，抄写档案必须购买档案馆专用纸，抄写后必须经过档案馆工作人员的审查，涂掉被认为不宜公开的内容，才能带出来。”之后，印先生将它无保留地交给了一位海外研究文革的人士，这位人士将它写到了著述之中，这些珍贵的史实才大白于天下。

近日，一位资深翻译家告诉我，她的朋友，在央视工作的俄国专家愤怒地告诉她，上面不准在播出的俄语节目中，出现“文化大革命”及类似的提法。而这以前还是允许的。这个信息具体而微地说明了现实是怎样地影响着历史。

### 文革的政治化

<sup>39</sup> 印红标：《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载《中国研究》香港，1996年秋季号。

历史与政治的关系，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为政治服务，一种是把历史政治化。前者例子无数，不必赘述。后者说的不多，值得关注。

把历史政治化，简单地说，就是“唯政治论”。历史本是多种力量纠扯平衡的结果，可持此论者却独尊政治，罢黜百家。在他们看来，别的因素——经济的、文化的、地域的、社会的、性格的、心理的、性别的、偶然的等等——都与历史无关，有关的只有政治。

当历史与政治关系密切的时候，这把尺子还挺灵。这里所说的灵，是指它很能赢得信众。比如，旅德学者王容芬发表言论，认定宋彬彬是指使打人的凶手。指责《记忆》第47期“整个一面倒，全是宋彬彬，刘进、冯敬兰，还有叶维丽他们的文章。讲出来跟历史事实走得太远了，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们想怎么涂抹历史就怎么涂抹。现在宋彬彬她们就变成了不但和打死人无关，而且刘进居然出来讲，他们几次出来讲话，制止打人，最后还是他们给送到医院，跟医院据理力争，要人道主义，要抢救卞仲耘。这历史就变成指使打人的凶手变成了抢救人的义士了。”

可是，她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让自己离历史事实近一点。她拿得出来的，只是对时下政治的批判：“选中这篇文章的是《炎黄春秋》的编辑李晨，李晨之姐李东东是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李东东之父叫李庄，李庄一直在人民日报当笔杆子，最后是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李东东还是跟宋彬彬一起并列的、师大女附中二零零六年评的优秀名誉校友。名誉校友是有政治含金量的，必须是副部级以上的。”她最后对记者说，“世界在进步，中国在倒退，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中国是红卫兵领导的，是李东东他们在掌握话语权。我的文章在国内既没办法发表，也不能够转发。所以文革研究控制在这种当年红卫兵的手中，这就当然没戏了。”

上述言论赢得了很多读者。此文在网上流传的程度可以看出这一点。

王容芬博士是在文革期间以生命挑战暴政的杰出女性，她对独立思想的坚守是知识分子的榜样，她的高尚品格值得敬仰，她的事迹将与林昭、张志新等女杰一道与日月同光。但是，女杰的话并非句句是真理。一个人的历史的地位和世间对她/他的尊敬与历史真相和学术研究是两回事。显而易见，她的上述言论将历史政治化了。这里面有事实，也有讹传；有正确，也有错误；有公理，也有偏执。

文革离政治太近，毛泽东的地位、太子党的接班、无法扼制的贪腐、日益扩大的两极分化、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人权没有保障、缺乏安全感等现实政治干扰着文革的研究。除了这些尖锐的现实问题之外，文革还关涉到政治立场。在同样要求改革的人们中间，渐进派与激进派在对文革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几乎不可调和的分歧。激进派要求彻底清算文革中的作恶者；而渐进派则认为，不能将红卫兵等同于纳粹的突击队。

所以，研究这段历史，确如美国读者钟青谷先生所说，要么成了“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要么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sup>40</sup>钟先生所指，是《记忆》47期发表了宋彬彬等人的文章。但有一点钟先生不知道，“两头受气”和“里外不是人”都是历史被政治化的缘故。

### 文革的神话化

前年，我采访一位耄耋之年的退休教授，老人告诉我，从文革一开始，他就受到了四人帮的迫害。家被抄，人被关进牛棚。我告诉他，四人帮是1974年才形成，老人怒，视我为无知且大不敬。

周伦佐谈到，某学院教授华先生，说他曾遭到造反派的迫害：五七年被打成右派，1966年6月19日又将他开除公职赶下农村。周纠正他：“1966年6月不仅没有造反红卫兵，就连官办红卫兵都没有产生，将他扫出校门的只能是官方工作组。他默然，随之流露出像丢失了手中拐杖一样难受的表情。”<sup>41</sup>

这就是柯文所说的历史的神话化。

历史的神话化，指的是对历史的虚构。这是一种特殊的虚构。它“不是捏造出来的，而是通过对不符合或有悖于其目的的历史资料的歪曲、简化和省略来完成的。”<sup>42</sup>1946年，陈伯达出版了大作《中国的四大家族》，说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立夫）四大家族贪污美援，榨取民财，聚敛了200亿美元的私产，富可敌国。这只能算捏造，还够不上神话化的档次。把林彪说成是篡党夺权的罪魁、克己复礼的信徒是歪曲。用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晚年的错误来解释文革则既是歪曲又是简化，而这些才是对历史的神话化。

<sup>40</sup> 详见《记忆》第58期的“编读往来”。

<sup>41</sup> 《“文革”造反派真相》田园书屋，2006，第38页。

<sup>42</sup> 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2页。

神话化与历史的政治化有关，但政治只是神话化的一个因素。与之同样重要的神话化动力来自于经济——香港出了好多关于文革的书，其中有不少将文革神话化的作品。这也不能怪只为了赚钱的书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经历和神话具有不容历史学家忽视的重要性和‘情感引力’”。<sup>43</sup>换句话说，大多数读者宁愿相信被神话了的历史，也不愿意相信还原了真相的历史。宋彬彬亲手打杀八人，在杀人比赛中拔了头筹的编造，比她没参与打人，但“劝阻无力，反应迟缓”的理性分析要刺激一万倍。2010年11月4日的《南方周末》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种“情感引力”的不可抗拒：在《一个开始，只能是一个开始》一文中，这家报纸的两位记者不但擅自将女附中“八五”事件的死难者从一人增加到五人，还煞有介事地告诉人们，这“五人的名字是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和汪玉冰。”而实际上，后四人都活到了新时期，梅树民至今健在。

读者心理决定了市场，市场又激发了为了出书、出名的作者向神话化靠拢的热情。然而，无论是“高层内幕”作家师东兵，“红墙纪实”作家权延赤，还是以写“四人帮传”扬名的叶永烈，从来都不会承认，他们是神话制造者，更不会把他们的作品视为历史的神话。恰恰相反，他们总是信誓旦旦，说他们的著作如何符合历史真实，以强化其制造的神话的可信度。

有趣的是，冒着非法经营的风险养家糊口的内地的盗版商们，以同样敏锐的经济嗅觉，同样精微的读者心理揣摩，却担负起传播多元文化的使命——他们选中的盗版书，往往是严肃的文革史著作或回忆录——决定大陆盗版书丰歉的是小众读者心理学，这里有另一个市场。

没有人会公开反对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但是，去神话化的后果并不那么令人乐观。柯文提醒我们：“去掉历史的神话色彩，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恢复披上神话色彩的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它常常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与死亡造成的痛苦不同），引起严重的不安，所以有时会受到人们坚决的抵制。”<sup>44</sup>从“大救星”到晚年犯了错误，就是一个神话的破灭。它引起的严重不安，到现在还在神州大地上激荡。而“晚年犯错误说”本来也仍旧是一个神话。可以想象，如果这个神话被破灭了，或者说，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所受到的抵制会有多大。

<sup>43</sup> 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2页。

<sup>44</sup> 同上，第180页。

文革的历史包含着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方向和发展主题，它与中国的现代化连在一起，而现代化则是中国政治的产物。这个问题不可能在几十年内得到解决。因此，只要造成文革的矛盾存在，文革就会继续充当制造神话的材料。历史学家也就极难客观地研究和评价它。

2010/11/17--20

**【争鸣】**

按：《记忆》第49期发表了童话《师大女附中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一文，鲍国芳写了《尊重历史真实是最起码的——对童话〈师大女附中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的一点质疑》在《记忆》第50期上发表，童话随即写了《回答鲍国芳女士的质疑》一文，刊登在《记忆》第51期上。此文是鲍国芳对童话上文的回复。

**关于童话《回答质疑》的回复****鲍国芳**

童话先生的《回答质疑》一文，有两点需要澄清：

一、关于此文的引文及结论。闻佳案是个冤案，这是我们的共识。闻佳的遭遇凡有同情心的人都会感到悲愤痛心，但是不能因悲愤痛心就可以捕风捉影编造或主观臆断地演绎情节，如此无助于搞清历史真相。

童话在《回答》一文中说：“《尊重》一文提到闻佳的班主任金元老师说我的文章是‘胡说’。”童话犯了一个错误，即将我《尊重》一文提到金老师说的“胡说”的内容漏掉了。实际上，金老师只是说童话引用闻佳同班红卫兵同学在1966年8月打了闻佳的这一段文字内容是“胡说”，因为据她所知，当时我们班没有发生过打闻佳的事，她认为这一点不符合事实，并没有说童话的整个文章是胡说。

在此，我再一次表明，对童话能对闻佳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给予关注与关怀，为搞清闻佳冤案全部真相作的努力表示敬意。但是我们作为见证人，出来说明真实情况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关于金元老师的情况。因为在《回答质疑》中，我引了金老师说的话，童话先生还提到了几年前的事，说他为了搞清闻佳的事，采访过许多老师，他们都很热情。只有“金老师接电话时很慌张，马上挂断……”这一表述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金老师就是一个他后面所说“对亲历的史实不敢说、不想说、不愿花时间说，自己不说也不支持别人说”的人。

如果真产生这样的联想，那将是对金老师的一个巨大的误解。金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她心地纯正，为人坦荡，极富有爱心与责任心。她对闻佳的情况知之甚少。因为文革期间老师都靠边站。在我们分配离校，学生宿舍关闭，闻佳没有

了宿舍也无法在学校逗留，金老师根本见不到她。1968年发生的闻佳在学校厕所里自杀、写“反标”，被校方扣押审查，并被送交公检法的过程中，校方一直都没有找过金老师，所以她也不了解内情。

另外，金老师爱人徐老师患肾病糖尿病多年，后因糖尿病足而截肢，1998年因尿毒症开始透析。由于糖尿病血管严重变形不能进行血透，只能腹透。从1998年，须每天在家里进行腹透，一天进行五次，每次至少半小时，前后都要消毒，家里要绝对无菌，还要准备一日三餐……这一切，以及所有家务，她一个人全部承担下来，其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同学们知道这种情况，都不敢登门，也不敢电话打扰。金老师当时接童话先生的电话时，可能正忙着照顾病人，无暇回答。这些情况，童话先生恐怕无从了解，所以做出了上述猜测和表述。

2010-6-25 初稿

2010-7-1 修改

## 【书评】

## 与安迪·沃德商榷

## ——关于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文革

叶维丽

最近，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Andrew Walder 写了一本关于 1966 年至 68 年间北京市大中学校文革的书（Fractured Rebellion: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1966-6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这是多年来中外学术界第一部关于北京文革的专著。长期以来，Walder 教授致力于中国文革研究，是一位受到广泛尊重的知名学者，他的这本专著得到西方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在这里，我无意对该书进行全面评价，<sup>45</sup>而只想就书中与我的母校——原北京师大女附中有关的部分做一评论，就其中若干问题与 Walder 教授商榷。

有关女附中的部分，出现在书中关于北京中学文革的一章里，只有一页左右的篇幅，涉及了女附中是什么样的学校，文革初期女附中的运动情况，以及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在 1966 年 8 月 5 号被学生游斗、折磨致死的事件。

我想就史实和观点两部分与 Walder 教授商榷。

## 一．史实（按书中出现顺序排列）

- a. 1966 年文革开始时，女附中学生中“高干子女”的人数，是否如 Walder 教授所写，占了“将近一半”？

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即如何定义“高干子女”。

据我所知，女附中学生中“干部子女”（包括“高干子女”）的比例，并未占将近一半。以我们班（1966 届初三三班）为例，45 人中干部子女为 15 人左右。

- b. 女附中文革开始时“第一张大字报”的“第一署名人”，不是宋彬彬，是刘进。
- c. 卞仲耘 6 月下旬遭到批斗及 8 月 5 号惨遭折磨以至死亡，与她的教育背景（大学毕业）及家庭出身（父为银行主）无关，学生对此并不知情。做为

<sup>45</sup> 我对此书若干章节的评论，见《亲历者的感想——〈分裂的造反：北京红卫兵运动〉读后》，载《记忆》（2011 年 9 月 30 日），总第 77 期。

党总支书记，卞仲耘是文革前女附中的第一把手，是文革中首当其冲的批判和斗争对象。

- d. 工作组在校期间，女附中出现了“反工作组”学生，分布在高中各个年级，为全校师生皆知，而非如 Walder 教授所称：没有这方面的材料。
- e. 7月31号出现在女附中的红卫兵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并非由曾受到工作组支持的学生所建立，而是由一部分“反工作组”学生组成。

## 二. 观点

在有关北京市中学文革这一章，Walder 教授选择了四所学校做为案例：“西边的中学”（“The Western High School”——我无法判断它是哪所学校），师大女附中、清华附中、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所以入选，与这两所学校在文革初期众所周知的开创性作为（成立“红卫兵”/“红旗”）有关。女附中所以入选，应该是由于卞仲耘之死。这是文革以来北京市第一起学生打死老师的事件，因此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叙述，Walder 教授基本上采用了王友琴女士的版本。<sup>46</sup>我在《记忆》47期曾对这一版本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指出若干重要的史实错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是将7月31号由反工作组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当做由工作组曾经支持的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二是夸大了文革开始以来宋彬彬在一系列事件中的作用，而无视刘进才是当时学生的第一负责人、宋彬彬追随刘进这一基本事实。

我希望 Walder 教授能够看一下我发表在《记忆》47期的《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一文，其中引用了女附中其他校友关于“八五事件”的最新调查结果。在该文中我提到，在8月5号之前及8月5号当天个人表现并不突出的宋彬彬，因为“八·一八”上天安门给毛泽东戴袖章而世人皆知，并随即被符号化和妖魔化。在王友琴女士的叙述中，宋被说成是成立于7月31号的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红卫兵”是“八五事件”的凶手；做为负责人，宋彬彬要对“八五事件”负责。这个叙述违背了基本史实，犯了“后面发生的事情”（8月18日）影响“已经发生了的事情”（8月5日）的逻辑错误。但因为它构成了一个“好故事”，而广为流传。

<sup>46</sup> 详见王著《文革受难者》中有关卞仲耘的部分。

作为一位西方学者，Walder 教授倾多年之力，写出了关于北京大、中学校文革的第一本学术专著。这令人敬佩，也使人汗颜。这本书激励我们中国的学者在文革研究领域不畏艰难，努力耕耘，做出我们自己应有的贡献。

2011年6月于波士顿

【文摘】

## 对红卫兵不能混为一谈

### ——兼谈卡玛的《八九点钟的太阳》

莫力

红卫兵作为一个群体，不能全部都视为“杀戮者”。他们中有的在文革中施行了暴力，有的没有施行暴力甚至反对暴力。大部分红卫兵还是被中共蒙蔽利用的受害者。八九学生也不全是“被杀者”。法拉奇曾说过：“即使是最崇高、最纯洁的旗帜上，都沾有鲜血和粪便”。八九学运中有流血牺牲者，也有吃人血馒头的人，不能笼统地混为一谈。

批评卡玛的人往往要将王友琴拿来作对比，苏先生也不例外。他说：“王友琴固执地‘考古’红卫兵的暴行，丝毫不顾及他们的‘理想主义’滥调，那却是卡玛所赞扬备至的。”

事实却是，卡玛并没有在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里“赞扬备至”红卫兵。恰恰相反，影片揭露了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剖析了将革命暴力浪漫化的党文化及其对青少年的影响，讲述了不同家庭出身的一代青年人，如何由盲目热衷革命转变为独立思考的心路历程。如果说影片赞扬了什么人，那就是遇罗克，一位走在时代前沿的思想者。影片以大量的篇幅记述了遇罗克的事迹，以及他被暴力杀害的事实。而这一点是卡玛的攻击者们从不提及的。

卡玛的解说词精炼隽永，充满了批判精神。她没有用革命大批判式的语言去谴责什么，其冷峻的反讽却比简单化的声讨更为深刻有力。

纪录片制片人不是教堂里听人忏悔的牧师，他们让那些曾是红卫兵代表人物的人讲述自己的经历，是为了给历史留下纪录。他们如实展现革命的场面，是通过再现过去那令后人难以想象的政治、文化氛围，来讲述个人命运的曲折，展示文革、以至更久远的中国历史的复杂轨迹。影片揭示了人性中阴暗的一面如何在特定的条件下得以恶性膨胀。与人类历史中多次先例一样，文革中的罪恶往往是借着冠冕堂皇的词语、打着正义的旗帜而得以实行的。尽管卡玛的作品也难免局限和不足，但她这种求真历史的努力是难能可贵的。

笔者在欧洲看过大量的历史记录片，一些反映纳粹时代的记录片如实展现纳

粹活动的场景，希特勒的演说。那样的历史摆出来就够荒谬透顶了，并不需要制片人再去口诛笔伐。从美学角度看，上乘的创作者知道如何让作品本身去说话，尊重观众的判断力，给观众留下思考的余地。作品的深度表现在它所揭示的矛盾和问题，而不在于它摆出无所不知的架势，提供简单的答案。

## 【文摘】

按：徐友漁先生转来马悲鸣先生此文，建议《记忆》转载。此文中提到他在《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中曾引用《开放》杂志上有关宋彬彬得到毛泽东“要武”的鼓励后亲手打死人的说法。徐先生在来信中说：“读了《记忆》47期上的座谈记录后，我就想到，虽然事情还有继续了解调查的余地，但我凭经验和直觉相信有利于宋彬彬的说法是对的。这篇文章再次指出了我的引证失误。面对事实的勇气和品格我还是有的，我也懂得流行的说法会如何阻碍人们探寻事实真相。我很遗憾自己在以前的著作中采用、引证了流行的说法，有机会我会矫正自己以前的说法。建议你们转载此文，也借此向《记忆》的读者表明我的态度。”

## 宋彬彬比赛杀人之谜

马悲鸣

【作者说明：在文革后的三十多年前，我本人曾经坚持认为，宋彬彬应当服刑。直到2004年才改变想法。但社会舆论已经成型，很难矫正了。】

2004年初，卡玛纪录文革的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引起海外中文网坛的轰动。其中最令人吃惊的是，盛传在“红八月”给伟大领袖戴红卫兵袖章，有八、九条人命的宋彬彬亲自在电影里澄清，她不但没打死过人，没打过人，连抄家都没参加过。并且她从一开始就反对动手。她从来没改过名叫“宋要武”，更从不曾写过首发在《光明日报》上的那篇《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她事先对此一无所知。和所有的人一样，她也是在看到了报上那篇文章以后才知道自己已经改名“宋要武”了。

这个澄清与近四十年来广为人知的有关宋彬彬打人的传说大相径庭，令人难以置信。于是胡平先生一篇篇“揪态度”和“追究道义责任”的《宋彬彬之谜》上了网。最后连王希哲都看不下去了。他《对胡平先生评“宋彬彬反对打人”也说几句话》：“‘红八月’里。宋彬彬自己究竟有没有动手打人？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在十七年‘阶级仇恨’的狼性教育下，在‘红色风暴’那般的环境下，在获至高无上的机遇，得天安门百万同学前面受‘最高指示’的隆恩下，‘宋要武’

居然事实确是没有因而去打人，甚至个人态度是反对乱打人，应该说，这已经是很了不起了！”胡平先生的这个话题才告暂停。

现在中国需要政治改革，需要防止文革式的动乱再现，反思文革应该以现代司法标准衡量，那就是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揪态度”、“追究道义责任”都是文革式思维。厘清事实才是至关重要的。

卡玛的电影上映之后遭到记者追问：“你根据什么相信宋彬彬在文革时确实没有打过人？学者的书里和网上流传很多说法。”

卡玛详细解释说：“这可分几点来说。首先，我认为要公正就应该把她的话报导出来。说到相信不相信，你的问题也可以反过来问：你根据什么相信她打过人？指控一个人打人，甚至打死人，是很严重的事情。我面对的是两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是网上匿名的指控以及我在当年就听说过的各种有关‘宋要武打人’不着边际的传言。所谓‘学者的书里’根据的也只是这些，传言一经懒学者引用便成了‘正史’。第二种是我多年来从许多见过宋彬彬本人或与她有直接接触的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她的为人，以及相关的时间、地点。这些人，不管原来是哪派的，都与宋彬彬本人的说法一致。例如，我问过王友琴，关于宋彬彬所在的师大女附中打死女校长的事，王友琴在这个问题上调查是最深入的，我问宋彬彬参予了没有，她说没有。”

那么究竟是哪些学者未经核实就引用了谣言呢？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乐黛云 1985 年访问美国之际在加州大学出版了一本英文书——《面对风暴》，王蒙的序。说有一个叫“胡冰冰”的师大女附中学生在天安门被江青改名叫“胡要武”。这有可能是英文编辑没弄清发音出的错，但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不难看出，说的就是宋彬彬。<sup>47</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徐友渔在《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一书中说：“现在不少回忆文章都提及作者在目击女红卫兵打人之狠和虐待人方式之残忍时的震惊心理。如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就是被一些女红卫兵打死的，而且死后还暴尸校园。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献红卫兵袖套的宋彬彬。1992 年香港《开放》杂志有文章，提到她亲手打死九人，后来有文章更正，说确凿的数字是七人。也许，她的动力来自毛泽东接受

<sup>47</sup> 《面对风暴》(TO THE STORM: The Odyssey of a Revolutionary Chinese Woman) Yue Daiyu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y 1985, Page 183-184.

袖套之后鼓励她‘要武’。在文革前，毛泽东就鼓励并赞扬中国青年女性‘不爱红装爱武装’。宋彬彬也立即把名字改‘宋要武’。”<sup>48</sup>

这位故意把红卫兵袖章说成“袖套”的徐友渔研究员也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影片中出镜的人物。无独有偶，胡平先生在《谈宋彬彬的反对打人之谜——看〈八九点钟的太阳〉有感》的第三章，3、是“一直反对打人”吗？里说：“作为老红卫兵的领袖人物，宋彬彬打过人吗？已故千家驹先生在《自撰年谱》里写到，宋彬彬和别人比赛，那一个红卫兵打死了六个人，她为了胜过那个人，就打死了八个人。可见，关于宋彬彬打死人的说法流传很广。”

“流传很广”就一定是事实吗？

《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先生在《千家驹痛述：追随共产党的报应》一文里说：“千家驹愤怒地写道：‘不是有一个女孩子名叫宋彬彬的红卫兵吗，在检阅时，毛皇帝说‘文质彬彬，要武嘛！’於是她改名为要武，她与人作杀人比赛，有一红卫兵打死了六个，她为了胜过别人，就打死八个。这都是真人实事，如非身历其境，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这就是胡平先生引用的《自撰年谱》里写到的话。但考千家驹先生并未“身历”过宋彬彬打人的“其境”。他老人家怎么可以说“这都是真人实事呢”？！

其实类似的文字可以追溯到大串联时期的1966年底。当时外地流传的很多大字报把被指为陈毅儿子的陈小虎和宋彬彬形容成飞天大盗，一会儿在某省某市打家劫舍，转眼又飞到遥远的另一省，另一市去杀人放火。其中就有上述这个宋彬彬杀人比赛的谣言。

后来陈毅发话，他没有个叫“陈小虎”的儿子，才算作罢。但宋任穷确实有个叫“宋彬彬”的女儿，所以这个谣言就一路流传了下来。1992年《开放》杂志把这个谣传印刷了出版，被徐友渔引用。自称是“不可救药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千家驹老先生又把这个谣言写入《自撰年谱》。

金钟先生称赞千家驹先生的《自撰年谱》时说：“‘秉笔直书，不为亲者讳，亦不为尊者讳。年谱印成后，不公开发行，仅赠少数友好，留为纪念。’他深信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必有实现以不说假话为荣，以不说真话为耻的一天。现在，千教授已乘鹤归去，介绍他这本内容浩瀚的年谱于一二，可以看到一位‘平生不

<sup>48</sup> 见该书第三章 红卫兵的区别与派别，香港中文大学，1999年，中文大学出版社，第64页。

打谎语，不作违心之论’的正直学者的崇高人格，也可以披露若干史料秘辛。这本年谱的史料价值绝不在那些四海张扬的名流畅销书之下。”

金钟先生的这个说法，更增加了被千家驹先生引用的上述有关“宋彬彬比赛杀人”谣言的分量。

任何指控都要允许被指控者自己辩解，这是现代人权标准。如今宋彬彬本人亲自在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中澄清：“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但是到处都是我的谣言，就说给毛主席戴袖章的宋要武，怎么怎么样打人。我觉得特别地委屈，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当时很多学校的一些红卫兵，就到我们学校来看我，但是他们都特别失望，就说你怎么是这么一个样子，你跟我们的想象一点都不一样，就好像你一点都不革命的意思。我就觉得我这个名字和形象都完全被剥夺了，我自己一点儿控制的能力都没有，特别地生气。同时我也觉得为了这个名字，使得那么多人受到迫害，觉得非常地难过。我们当初想的是批判文化教育界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现在这个文化革命已经跟我当初参加的时候所想的距离太远。”

卡玛在回答记者问时作证：“我多年来从许多见过宋彬彬本人或与她有直接接触的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她的为人，以及相关的时间、地点。这些人，不管原来是哪派的，都与宋彬彬本人的说法一致。”

## 【文摘】

**红袖章，白丝带——八一八祭**

乔海燕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佩戴“红卫兵”袖章，检阅红卫兵队伍。从此，8月18日就成为红卫兵的盛大节日，红卫兵也迅速发展成为一种运动。但是，仅仅两年后，这一天就成为红卫兵的祭日。

无论后人怎样评价红卫兵运动，它都将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一部分。尽管现在官方刻意回避，媒体也逐渐淡忘，但是，这段历史既遮掩不住，也回避不了。历史总是顽强地表现自己。在不经意的将来，总会有人在“今天”看到“过去”。事实上，红卫兵的“幽灵”至今仍在中國大地上游荡。

有青年朋友问我：你们那个年代的人，为什么会参加红卫兵呢？虽然你们中有一大部分是处于歇斯底里状态，但还是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为什么也会参加呢？是什么吸引你们呢？

这个提问，如果顺着“歇斯底里”，顺着“受过良好教育”的思路，很容易回答，答案也是现成的，歇斯底里和受过良好教育本身就是答案。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中学生，都可能参加红卫兵。但是，如果究其原因，就不是简单的一句话能回答了。从现象中得出的结论，有时候并不能说明事情的真相，更不用说历史了。

我对那位提问的朋友说，你提的问题，是个很可以深究的题目，但是，你用的词语，表明你还不了解讨论这个题目的基本前提，建议先看一些文革前有关教育的材料，也许，当你看完那些材料，你就会用另外一种词语提问，我们就可以讨论了。

教育，确实是研究、评论红卫兵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位朋友给我看《我虽死去》，这是一部电视纪实片，非常好，非常深刻、震撼，遗憾的是不能公开。

看了这个片子，有人会问，那些无法无天的学生是从哪里出来的？仿佛是突然出现的，从地下冒出来的，他们是怎样在一夜间从中学生变为红卫兵的？

德国电影《白丝带》去年获戛纳电影节大奖，这部电影讲了一个制造恐怖的故事。而恐怖事件的制造者，竟然是当地神父家的几个孩子。这几个孩子受着极

其严格、传统的家庭教育，包括行为规范、伦理道德和价值观教育，神父也经常向孩子们诉说自己心中对他们的希望，对他们的要求。就是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这些孩子却对一名智障、残疾儿童，做出残害的恐怖行为。

为什么所谓正统、严格的教育，会扭曲受教育者的性格？产生与教育目的相悖的行为？这个电影对研究红卫兵的暴戾行为，很有启示意义。

按照一般的看法，强者并不能因为加害弱者而彰显其强。但是，现实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事，比如日本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比如红卫兵残酷殴打学校的老师。红卫兵在当时是强者，这毋庸置疑。但在当时，他们并没有抱着炸药包去北部湾炸美国的航空母舰，也没有举着步枪射击在越南狂轰滥炸的美国飞机。他们高喊着“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的口号，却对那些垂垂老矣的“五类分子”，对朝夕相伴的老师，对共一张课桌的同学大打出手，竭尽暴虐之能事。电视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中，一个曾经的红卫兵讲述当年在殴打老弱病残的“五类分子”中获得革命的快感，感觉到自己的强大，这绝对是一种病态性格。即使是真正的战斗，虐待俘虏也无法叫人承认你勇士。

前几天看一本松山战役的书，作者在书中多次比较中日两国的军队，比较士兵、军官的军事素养，比较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显然，日本军队要比中国军队高。但是，就是这样的军队，在中国却干着杀害百姓的事情，其暴虐手段令人发指。人们怎么从他们受到的良好教育中找到答案呢？

显然，我们不能从正常的教育中寻找答案。

红卫兵是被教育出来的，而且是在一种教育制度下被人刻意教育出来的。这是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教育红卫兵使用的教材和语言，还有周围环境，同教育雷锋是一样的。

雷锋日记中有一句经典：“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谁是敌人？毛泽东说，敌人已经钻进我们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就睡在我们身边。一旦敌人被权威界定，革命者必然对其残酷无情。

事实上，文革前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就是一种“性格扭曲”教育。这种教育，每时每刻都在教育学生睁大眼睛，认清谁是“敌人”，尤其要认清自己身边的敌人；不仅要认清敌人，还要恨敌人，要学会恨。作为学生，他们的性格本身并无加害他人、危害社会的倾向。问题就在于，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总有一

种力量在不断激发他们的“黑暗面”，总在提醒他们时时保持警惕，时时表现出愤怒，使性格的基因时刻处在极易突变状态。一旦环境出现突变，这种被教育出来的性格就会基因突变，与形势合拍，顺势发展。再加上别有用心者呼风唤雨的撺掇，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就会把对“敌人”的仇恨付诸于实践。而他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样的斗争与平时所受教育是完全一致的。

也就是说，文革前17年的教育和宣传，已经在后来的红卫兵“造反”思潮的细胞里，注入了“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的基因。这个基因内，带有浓烈的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信息。毫不客气地说，这种历史信息经过多少专家、学者、老师，经过教育界“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筛选和系统化，已经被严重歪曲，成为当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者高华在一篇论述抗战期间根据地教育状况的论文中提到，中共在红军时期一直到抗战期间的根据地教育，普遍存在重思想教育，轻知识教育的倾向。他认为，根据地的教育是一种强化意识形态的灌输式教育，以革命政党的世界观、方针、路线为宗旨，又与现实紧密结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鼓动特点。这种教育思想，以及由此逐渐形成的教育制度，都对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教育产生相当深刻的影响。

红卫兵就是这种影响的产物。

强化的灌输式教育，并不是真正的思想教育。思想教育是启发式的，灌输的只能是精神。这样教育的结果，只会培养出服从命令、一往无前的猛士，激发不了思维的火花，也培养不出有思想的智者。

有人会问，难道精神不是思想吗？不是。中国人从来不缺少精神，唯独缺少思想。没有思想的统领，精神只是一时的冲动和热情，只是拿着大刀片砍坦克的壮举，或引起嘲笑，或引起叹息，当然，也能引起赞叹。从1840年到现在，精神总是被赞誉有加，狂热鼓吹；而思想却往往落到悲惨下场。

我认识一位台湾记者，她讲过一件在大陆的采访经历，这不过是前几年的事

---

某年某月某日，我还在台湾媒体工作，在北京某公园采访两岸民间文化活动现场，台上是“布袋戏”，滑稽可爱，台下众多小朋友看得津津有味。一出戏罢，我将摄像机镜头对准一位正在吃糖葫芦的小朋友，大概七八岁，不会

超过十岁。我问，小朋友，你看这个布袋戏，好玩不好玩啊？小朋友一听我的“国语”口音，大概马上就猜出我的身份，看着镜头就把手中的糖葫芦背在身后，摆出了姿势，他说，嗯，希望这样的文化交流更多，两岸……他的妈妈在一旁站着，听自己孩子说，报以赞赏的微笑和肯定的点头。

我当时就晕了，哇！小朋友怎么会说那样的话？好像谁教他的嘛，他应该说，这个布袋戏我好喜欢！我好想要那个木偶耶！它会喷火耶！

这位记者朋友可能没有想到，即使杀人如麻、草菅人命的恐怖分子，刚出生时也是粉妆玉琢的宝宝。

（本文作者做过红卫兵、知青、医生、记者和编辑，现为凤凰网副总裁）

## 【文摘】

## 追究卞仲耘惨案真凶

敏一鸿

《记忆》杂志先后发表《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对于寻求卞仲耘之死真相、深入研究文革史非常有益。当然，我对文中观点不尽认同。例如，校友叶维丽在〈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中说“我想，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抓凶手，而是每个人面对自己的良知。”我当然同意要面对自己良知，但说出真相，追究直接责任者、凶手以至元凶，正是良知的真正表现。延绵六十年以上的群体凶杀，正是以“革命”的名义一再藏匿真凶，才吞噬掉高达八千万人的性命。

追究真凶的第一步是调查、还原真相。卞仲耘校长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下午在学校锅炉房高台北侧大操场被群殴时，我是现场目击者。殴打卞仲耘是自发还是有人组织、宋彬彬是不是凶手、她对卞仲耘之死是否负有责任，我可以就我所知，略谈一二。

## 全校有统一组织指挥，不是权力真空

目前争论焦点之一是七月底工作组撤走后到八月五日，学校是否权力真空？这关系到卞仲耘之死是学生在“无政府状态下”自发冲动之举，还是有组织有准备的凶杀，也关系到宋彬彬是否负有责任。

师大女附中是北京取分最高的女子中学，聚集了很多中国政要、统战对象和高级知识份子之女。毛泽东的两个女儿，刘少奇、邓小平之女分别在校毕业和就读。文革工作组，由邓小平直接过问。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晚，天已全黑，闷热，大约九点多，突然有三、四个“红五类”同学进了我家门。非常严厉地说：“你明天早晨必须到学校，如果不去，格杀勿论！”说完转身离去。“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贴在大操场边宿舍楼门口已经好几天，恐怖气氛使“黑五类”人人自危。

八月四日上午，我心怀恐惧走进教室。课桌靠边，当中摆着几排椅子，全班四十多个同学，被分成泾渭分明的三类。“红五类”坐在椅子上。九个“黑

五类”面对大家，背向黑板，站成一排，我在其中。十几个出身不红不黑的“灰色”同学被指定坐在地上，让她们看批斗“黑五类”，她们可以发言，不能动手。

批斗会开始，教室门被砰然推开。董××被几个“红五类”推搡着进来，被喝斥“你什么出身？”“革军”，董说。“革军？骗人！你生父是反革命！”董的母亲是俄语教授，父亲是解放军军医，原来那不是她的生父。董分辨不清，站进我们这排。随后，“红五类”头头的郑重宣布，让我们知道全班同学都被查清了三代。

我们仍被命令继续低头。听到齐唱响起“对联”歌。接着，二十个正牌“红五类”围上来，扯下我们的“红领巾”，警告“永远不许再戴！”。于是殴打开始，同班女生打女生，拳打脚踢，刷大字报的浆糊、紫色墨汁从头上浇下来，要我们揭发父母的反动言行，承认自己是“狗崽子”。

大约两、三小时后，教室门再次被推开。高三学生黄××一脚里一脚外，与我们班“红五类”头头低声嘀咕了一会儿。我站在离门不远处，能听清几句，大意是时间差不多了，可以结束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宣布散会前，“红五类”头头特别要求全班同学第二天一定到校，有重要事情，尤其是“黑五类”必须来。

八月四日这天，师大女附中很多班级，同时召开我们班这样的批斗会。黄××的出现，表明班级的行动是有包括高年级学生在内的校级组织指挥。否则，十五岁的初二女生，怎能得知全班同学的档案资料？从哪里得到“格杀勿论”的许可？更重要的是，谁有权通知全体同学第二天一定要到校？说明第二天的日程已经排定。

### 卞仲耘蒙难日的亲眼所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我和许多“黑五类”同学一起被押到操场上看校领导挨批斗，说是“斗黑帮”。八月烈日下的那一幅画面，永远定格在我记忆中。

锅炉房高台（常常是批斗会主持者和发言人站的地方）北侧的大操场边上，尘土飞扬。卞仲耘校长被同学团团围住，你推我搡，拳脚相加，棍棒挥动。一向倔强的胡志涛副校长（女）头发被揪乱，有同学往她头上浇紫墨汁、扣字纸篓，她嘟囔着什么，哭丧的脸上仍透着不服。

我们这些被押着来看的，因拥挤推攘，渐渐乱了队。只见有同学抡着带钉子

的破旧桌椅腿，打在卞校长身上。我离她最近时，大约两米。看到铁钉刮破她的衣服，她穿着象牙白（不是漂白色，有称象牙黄）色柞蚕丝短袖衫，铁钉扎进皮肉，再拔出来，留下一个紫黑点，不是想像中的鲜血淋漓。

关于带钉桌椅腿的记忆，从校友王友琴的记述中得到证实，那是同学从木工房拿来的。谁提示或组织同学去拿的？谁决定这样打校长？

四十一年后，我通过越洋电话采访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他保存卞校长血衣至今，确认我记忆中卞校长那天所穿衣服颜色样式质地都没记错。根据几位校友的文字回忆，后来卞仲耘被押到后边小操场干重活，我当时没跟过去。再后来她又被押到宿舍楼里受到各种折磨，因为楼道狭窄，从旁目击者不多。

在大操场上批斗殴打校领导之后，她被带到另外的地方，人群渐渐散去，原来押着我们“黑五类”的“红五类”们也不见了。我和同班“黑五类”同学魏××、崔××和孙××赶快像往常一样，躲到后院堆放生物课用的动物和人体骨骼模型的小屋，捧着《毛选》“避难”去了。

第二天，从学校广播（教室小喇叭）里得知卞校长前一天被送进邮电医院，宣告死亡。后来又得知，其实送进医院前，已经死了。

### 打死卞仲耘校长的是不是红卫兵？

卞案争议的又一焦点，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卞仲耘被打死时，学校里是否已经成立红卫兵？卞校长是不是被红卫兵打死的？这关乎后来宋彬彬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与卞仲耘之死有没有关系。我可以肯定，师大女附中在七月三十一日前就有了红卫兵。

师大女附中因为学生“通天”，文革中事事闻风而动，不会落后。清华附中五月二十九日有了红卫兵后，六月二十四日，七月四日和七月二十七日的三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都一一抄录，在校园张贴。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支持的信，写于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一日之间。八月一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当天，会议印发了毛的信及清华附中红卫兵所写的两篇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

如果说清华附中红卫兵明确得到毛支持后，师大女附中直到卞仲耘蒙难的八月五日，还没有红卫兵，不是掩人耳目，就是女附中局外人。再看另一方面，现

已确认，师大女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七月三十一日已成立。该组织之所以这样命名，是为了区别主流红卫兵。仅以上述顺序论，说八月五日师大女附中还没成立红卫兵，肯定与事实不符。

至于现在想以“八一八”宋彬彬上天安门前还没有现成的红卫兵袖章为理由，证明八月五日师大女附中还没有红卫兵，打死卞仲耘与红卫兵无关，更是牵强到完全站不住脚。当时物质匮乏，买布要布票，布票都在家长手里把着过日子，学生一时半会儿弄不到布毫不奇怪。从事实看，八月四日我们班谁能动手打人，谁该被打，泾渭分明，与袖章毫无关系。

一天之后的八月五日，谁有资格斗黑帮，谁被带到木工房拿桌椅腿，谁被押到操场上看以儆效尤，都有一定之规。一如十三天之后，那五十个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红卫兵代表，既不凭袖章，也绝不会靠抽签或自愿报名而定。

早在六月二日停课之后，最初班文革核心小组成立，全由出身而定。最初的红卫兵就是红五类，红五类是当然的红卫兵，自然不过。到七月底八月初“对联”一夜间贴遍北京城，出身决定一切，不是红五类敢冒充红卫兵的，轻则批斗殴打，重则格杀勿论，与袖章毫无关系。

当然，说是红黑泾渭分明，也不尽然。时有革干子女，一夜变色，父母被揪出来，遂沦为黑五类，“好汉”变“混蛋”，成了狗崽子。就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卞仲耘蒙难这天，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明确提出党中央还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当时国人并不知情，刘少奇邓小平还是国家领导人。师大女附中开批判会，有人上台发言，刘女、邓女都在场，她们一如既往高喊“开会发言报出身！”直到八月十八日，刘少奇还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 红卫兵宋彬彬与“八一八”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上午，毛泽东正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百万红卫兵。当看见荧屏上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头头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给毛戴上红卫兵袖章，我一时完全反应不过来——天上的毛泽东和我们学校的宋彬彬面对面说话？随后，电视台解说员说“毛主席问『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宋彬彬』。毛泽东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这是“最高统帅”对毆

打和杀戮表示认可的确凿证明。毛泽东无疑是红八月杀戮的元凶。

毛与宋这段著名对话，迅速传遍全国。此后，在北京，在全国各地，又有许许多多教育工作者，死在学生的拳脚棍棒之下，更多黑五类死于毒打。校友王友琴以历史义工身份，用二十多年业余时间，记录包括卞仲耘校长在内的中国五百位以上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丧生经过。对王友琴所做的工作，我深怀钦敬之意。王友琴在为一九六六年师大女附中的学生挽回荣誉。

### 宋彬彬应该走出毛的阴影

综上所述，并参看各方证词与研究报告，可以得出如下看法：

一、直接动手杀死卞仲耘的是师大女附中的一群学生，而不是哪一个人，当然也不是宋彬彬一个人。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有极大嫌疑。

二、直接动手导致卞仲耘死亡的一群人里，红五类占绝大多数。让当时所有学生平摊直接动手杀人责任，或有意无意空谈良知，仅仅为宋彬彬一人鸣冤，都与公义原则不符。

三、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三位学生党员刘进、宋彬彬、马德秀共同贴出全校第一张大字报，全校以她们马首是瞻，八月五日她们三位仍是学校里具有令行禁止能力的人。她们是否参与群殴卞仲耘的组织和准备？尚无足够证据。

四、最近看到宋彬彬说卞仲耘被群殴时她在现场，没有参与，还作了劝阻，对此说法，我作部分存疑。因为如果刘进、宋彬彬、马德秀一同或者其中任何一位，当时大喝一声“不要打了！”以她们标志性的地位和影响力，一定有很多同学会跟着制止打人，卞仲耘当天有可能保住性命。但当时没有人出来喝阻。

五、师大女附中九十年校庆，专题是“光荣与梦想”。经中共中央判定文革是“十年浩劫”之后，宋彬彬与毛泽东的蒙太奇，竟被奉为“光荣”，是历史大倒退。宋彬彬分享光荣不辞，分享耻辱就叫屈，是什么逻辑？

六、毋庸置疑，如果毛泽东不发动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师大女附中所有学生都会照常坐在教室上课，卞仲耘会在她的校长室办公。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导致包括卞仲耘在内的两百万、也许高达三百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每一个案，都有直接责任者，应该不懈追究。毛泽东是这场杀戮的元凶和真凶，应首先追究。

因此，追究卞仲耘之死案真凶，不能不从毛泽东开始。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沾上毛泽东的边，成为在全中国呼唤“要武”的符号，导致千万人命丧黄泉。如果宋彬彬因此蒙受了什么“冤屈”，理应先诉毛泽东，切断与毛绑缚在一起的“光荣”纽带，参与将毛请下天安门、请出纪念堂的义举，宋彬彬才有望走出那张据说曾“让她背黑锅”，也曾“让她无上荣光”的著名照片带给她的一切阴影。

（作者现任北美记者，本文为原稿摘要）

## 【文摘】

## 关于一则比赛杀人传闻的辨正

方影竹

1995年来纽约，64岁的我，追忆文革期间红卫兵“造反有理”的往事，写下我站在十一学校办公楼前，同一个男生的谈话情景。下面是原文：

“老师！你当过兵，可曾打死过人？”“没有。我当兵之后没仗可打了，才转业教你们的。”

“那可不如我。我昨天在教堂打死八个。”

他刚15岁（我教的那个班都是十五、六岁），手里提着一条皮鞭，已经被血渍浸成乌黑色。他说话时是那么悠闲自在，哪里象杀人不眨眼的魔鬼？

接着他向我描述了这样的场面：王府井旁边有一座天主教堂。红卫兵先将十几个修女递解出境（当时《人民日报》曾作为红卫兵的壮举加以报导），后来便住在那里。有教堂里储存的罐头食品，吃饭自然不成问题。每天先到警察派出所问：“谁是资产阶级？”然后根据提名把这些“资产阶级”带入教堂。一带便是一家人。一家进去，立即被红卫兵分光。三个红卫兵揪一个，先将人推倒，有人喊：“一、二、三！”同时动手，皮鞭齐下，有专人拿着秒表计时，看各组打死人都用了多长时间。当然用的时间最少的是“冠军”。令我震惊的是，获“冠军”最多的竟然是宋某某等几个女生。宋某某是我平时喜欢的女孩子。她腼腆、娇小、作业认真、字体清秀、考试成绩也在班里数一数二。而现在她居然能用皮鞭连续“作业”，成为“冠军”，连眼前这个男生也流露出“自愧弗如”的神情。人之变化，令人难料；毛泽东之“神力”，也确非虚传。十几岁的女孩子以杀人为愉悦，我至今不敢多想。

这段话是我以“万英树”为笔名写的《“太子党”的青少年时代》中的一小段。全文刊登在《北京之春》1996年2月号（总第33期）第16页至18页上。过了两、三年，我的这篇文章在《东西南北》网上出现，题目变为《太子太傅谈“太子党”的青少年时代》，署名、出处全无。

不料过了几年，又出事了。我的这段话被单独拿出来，流传网上。有两个字被更动，但那是极为要害的两个字，即把我写的“宋某某”变成“宋彬彬”。又进一步见到网文，提到已故经济学家千家驹的《自撰年谱》里记载着宋彬彬比赛杀人，她为了胜过别人，打死了八个人。为了找到《自撰年谱》，我先在我住的纽约皇后区大书店和图书馆查找未果，便冒了少见的冬日雷雨，到曼哈顿纽约市立图书馆找。该馆亚洲部的钟女士作了全球联网搜索，查到一本，但保存于香港大学！我又从一家港刊上知道，《自撰年谱》非公开发行，而是作者自印，赠送少数朋友的，我只得放弃查找。

其实，细心的读者，是不会把张三的帽子给李四戴的。十一学校只有初中，男女合班。宋彬彬当时是北师大女附中高三学生，年龄也自然比我提到的女孩子大三岁。此宋非彼宋是很明白的。有人会问：“你说的是事实吗？”告诉你：均为事实。当时我和那个男生站立的位置，他的神情，至今记忆清晰。至于我提到的宋某某，她的名字，我记忆得很准确。我当时是在内心震动中接受信息的，怎能忘记？

有人会说：你十年前发表文章时，把“宋某某”的名字写出来就好了。这话有理。此刻行文，吐露她的真名，也能去除读者悬念。但说还是不说，这是问题。思之再三，不说为宜。她，今年该是五十七、八岁的母亲或祖母了，由她自己反省和处理吧！

我现在倒是想对宋彬彬说几句话。

我是倚着十一学校喷水池铁围栏，从广播喇叭中听到天安门城楼现场报道，知道你同毛泽东对话内容的。“要武嘛！”在当时可是最高指示，是要照办的呀！其罪恶影响不可估量。红卫兵的造反行动，各有各的账。你是否打过人，用什么方法打人，在什么地方发出过什么“勒令”，我一无所知。“美国之音”就你“不提、不辩、不道歉”的态度发表的评论（今年第一期VOA《对比新闻》节目），值得你深思：“如果她相信中国人已经把过去遗忘了，那她就错了。人们看到了她写的文字，这些文字激起了巨大的愤怒。很多人对宋彬彬吹嘘她在美国的成功，同时只字不提她在高中时的举动感到愤慨。人们称她是母校的耻辱，说北师大女附中90年校庆是一个无耻的校庆。”知耻近乎勇。60岁的人，面对一个专制腐败而不作反省的出生国，什么是应有的晚节，你应该做出不再令人失望的回答。

## 【网文选登】

## 迟来了四十年的道歉

徐军 (Xujun Eberlein) / Rita Lee 译自英文

2007年12月，我曾为《新美国媒体》写过一篇题为《毛泽东114岁生日时，前红卫兵领袖被往事缠扰》的关于宋彬彬的新闻评论。

当时，究竟宋彬彬在其中学副校长卞仲耘于1966年8月5日下午被殴打致死的事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于我仍是一个谜。虽然有许多中国人声称宋是有罪的（一个美国律师甚至提出将她送上当今的法庭），但在我的写作研究中，从未找到任何关于宋曾经直接参与围殴的证据。

另一方面，有见证人指出，宋彬彬当时确实在学校里，甚至有可能就在殴打卞的现场。例如，她的同学陶洛诵在其2007年证词中称，当卞和其他教师在台上被殴打时，“宋彬彬正好站在我身后。我听到她说：‘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

面部模糊的宋彬彬在接受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采访时否认曾参与任何暴力活动，我疑惑为什么她不说明惨剧发生的那个下午她究竟在什么地方。如果她想要澄清罪名，提供当天的细节不是比任何空洞的声明都有效么？

两年半后的今天，画面在逐渐变得清晰。最近一期（第47期）中文电子刊物《记忆》中，有一篇5位女士之间相当详尽的对话，宋彬彬即是其中之一。其他参与者包括宋高中时的朋友刘进以及另外三位事发时还不认识宋的低年级同学。近年来，她们都参与了对“八五事件”真相的调查。

主持这次讨论的冯敬兰在介绍中说，她们在调查中共造访了110名老师和校友。文章较长，分为以下六个部分：（本刊略）

他们对“八五事件”的调查结果可简述如下：刘进和宋彬彬当时正和其他人在一间办公室里开会，开始并不知道校园操场上正在发生的暴力。听说此事以后，刘进、宋彬彬等人到现场试图阻止殴打，在认为劝说起效后离开。稍后，听说老师们又在后操场遭到殴打，她们第二次赶到现场劝阻，见殴打停止后再度离开。黄昏时，她们惊骇地听说卞校长在后操场奄奄一息，于是赶紧将卞送往医院，并与不愿救治“黑帮”人员的医生发生争论，终于使卞进入急救，但已为时太晚。

这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宋彬彬在那次事件中的角色，让我基本上相信她既没组织也没参与那次殴打，而且后来还积极为卞校长寻求急救治疗。在我心中还有一些未解的疑问，会在另一篇文章里继续探讨。

在该文的“八五暴力事件”一节中，冯敬兰提问，刘进则根据记忆和近年来所作调查对大多数问题作了回答。叶维丽也补充了她的回忆和看法。奇怪的是，调查焦点的宋彬彬反而处于沉默。冯敬兰没有直接对宋彬彬提任何问题。宋彬彬在这一节中唯一一次开口是当提到最近去探访一位以前的老师的时候：

宋彬彬：那天去看梅老师，一进门看见他满头白发的样子，我心里充满愧疚，就说了对不起老师的话，这是发自内心的，一直想说的话。虽然8月5日事发当天，我们也去劝说、阻止过，但是并没有预想到事态的极端后果。想到卞校长被学生暴力殴打死于非命，其他校领导老师们身心遭受重创，40多年来我一直非常痛心、愧疚和懊悔。利用这个机会，我想再次表示对他们的歉意和追悔。

这个道歉是以前未听到过的，且意义重大。虽然我希望宋彬彬自己能就她在1966年8月5日的具体行为做一些细节澄清，而不仅仅是让别人替她说，我仍然为她将近44年后能如此真诚的道歉而喝彩。就像我两年半前写的那样：“至今为止，很少有当年的红卫兵站出来公开谈及他们当时的行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年逾六旬，仍然藏身于沉默之墙的另一边。我懂得他们的借口：他们之参与暴力事件是受一定历史环境所制，并非个人行为，在当时甚至是政治正确的。不过，我仍然不禁疑惑：如果宋彬彬澄清了她在暴力事件中所处的具体位置和角色，并恰当地表达了她对1966年那个不幸日子的悔恨和悲伤，人们如今对她的声讨是否会有所缓和？当日那些挣扎于恐怖之中的人们会不会原谅她？那些曾经施暴现在却想要忘却他们的耻辱的人会不会原谅她？”

我回想起几年前，看完《八九点钟的太阳》一片后，一位朋友认为宋彬彬太急于澄清自己的名声。朋友评论道：“为什么她完全不为卞仲耘的死表示难过呢？”是的，如果那时能听到她如此诚恳的话，不管是对她自己还是观众都会好得多。但现在道歉也不晚。

许多未直接卷入暴力事件的文革参与者可能认为他们不需要道歉。（“打人的都没站出来，我为什么要站出来？”）一些更明智的人却不这么想。几周前，我去哈佛大学参加一个题为“中国红色遗产”的讨论会。其中一位发言者卡玛

(Carma Hinton,《八九点钟的太阳》导演)讲述了她和高中同学去年在北京聚会时,全班集体向他们当年的老师道歉的事。那些现已年迈的老师们非常感动。我也同样。我的理解是:虽然这些同学中没人直接参与暴力,但都批斗过老师,因为那是那个时代的“正当”行为。

毕竟,文革那一代中,没有很多人是完全无辜的。文革是一场全民运动。那是一个很少有人能不受暴众心态影响的时期。即便是今天,一想到那时如果我年龄够大,很可能也会铸成什么令我悔恨终生的大错,就会出冷汗。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对懂得当时的暴众心态比对追究罪责更感兴趣。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地挖掘过去。我不认为我们挖掘得够深了,懂得够多了。我听说今年初,当观众批评张艺谋新拍的贺岁片很糟糕时,这位著名的导演声称中国人有着太多像文革那样的沉重话题,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些轻松的电影。张艺谋只从自己这一代人的角度看问题的狭窄眼界让我感到惊讶。难道他没看见当代的年轻人对文革和1989年一类的事件有多么无知?不了解父母那一代人的教训,暴众心态的新苗头已在网络上出现。

一位读者曾问我,在中国,人们不能公开讨论文革发生的事情,这种状况的影响是什么。我告诉她,真正的危险不在于政府对这个话题的限制,而在于那些曾经的参与者们的自愿沉默。因为参与文革是当时的光荣,如今的耻辱。这样的人有许许多多——包括与毛的新中国一起长大的整整一代,我这代人的兄弟们,70后和80后的父母们。

在关于人性的问题上,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我曾认为正如我的书名《酝酿中的道歉》所示,文革参与者们对当年行为的道歉永远都只会在酝酿之中而不会真正发生。现在宋彬彬和卡玛的同学们道歉了,或许这是一线希望之光。我看到,积蓄这致歉的勇气用了40多年的时间——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个勇敢的举动。也许沉默之墙已经开始崩塌?

当然,对于那些亲身参与了暴力的人来说,心理障碍要比宋和卡玛他们大得多。在这些人能否道歉的问题上,我仍持悲观态度。

原文见作者英文博客 Inside-Out China, 2010年5月5日; 译文原载《译者》博客 2010年6月9日, 本刊转载时经原作者校改。

【网络言论】

谁该道歉？谁是受害者？谁是害人者？

——《猫眼看人》网络言论摘录

2010/10/23—24

先问一声：谁有资格接受红卫兵道歉？再问一声：谁来向红卫兵道歉？

我奇怪，近年有一股风，总是纠缠于红卫兵之道歉，为什么不敢去叫红司令或其继承人道歉？

谁是直接的受害者？

举例来说，如果有一个现在86岁的老人，文革时就是42岁，解放时就是25岁。1949年以后17年，经过土改、肃反、反右、大跃进、社教……这个42岁的人当了校长。能够当了校长，那么，一般来说在所有的运动中表现就是很好、很积极、很坚定。有没有动手打人或杀人？不知道，他们不说。口号是肯定喊的，检举材料是肯定写的。

而且，一般来说，这个校长一定会反反复复、循循善诱地教育学生：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对待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对待敌人必须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

如果学生有异议呢？这个学生就是右派，就是有抵触情绪对社会不满，就是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思想……直到文革初起，校长和老师们还是很有经验地等待着学生跳出来抓游鱼的。

后来，这个校长忽然成了走资派，成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

学生怎么办？当然按照他的教育论语行动。可不可以不呢？不可以，因为那将会被别人打倒，踏上一只脚，政治运动就是这样的。

两相比较，不知道谁才是受害者，是校长还是学生？

---

所以，是校长该向他的学生们道歉呢？还是学生该向他们的校长道歉？

---

文革，是学生根据校长老师们关于阶级斗争的教育，造了校长老师的反。

---

你们知道老师关于学生的评语是多么重要吗？

如果写了一句“该生有资产阶级思想”或者“需要不断改造思想”，这就是断送了这个学生的一生。

你们知道校长在学生登记表后面盖上：“该生不宜录取”是什么意思吗？

对于老师和校长，这是毫不手软的事情。

至今，这些老师和校长道歉了吗？

---

1957年以后，人人噤若寒蝉。1962年，否认中共八大，重提阶级斗争，人人自危。现在的人也许无法想象，“阶级敌人”的这顶帽子随时会落下来，这就是文革前的政治大环境。

---

楼主所以这么说，就是同时也理解老师和校长，他们也不得不如此，否则就是自身难保，事情就是如此诡异和非理性。

---

你们知道文革初起时，每个学校的老师和校长是多么兴高采烈地等待着学生跳出来当右派吗？

你们知道死老虎（曾经的地富反坏右）的档案是谁泄露出去的吗？

不是校长就是书记！

既然国家机器都支持学生造反，学生怎么敢对抗运动呢？

---

最有资格接受道歉的首先是，那些完全无辜的“地富反坏右”，他们的遭遇比刘少奇、万里、宋任穷等“走资派”惨十倍，百倍！

---

所以，不是谁向谁道歉的问题，而是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的问题。

---

那些曾经的红卫兵的教育者们，现在没人要对你们惩罚，不知你们怕什么？急着撇清自己的责任，把责任推向当时十几岁的孩子，为自己灵魂深处的“恶”和“怯懦”做伪装，居然只要求那些曾经的孩子忏悔。当初的红卫兵毕竟是中国

人的一代，是你们循循善诱教育出来的，你们教了他们什么呢？说谎、仇恨、暴力、怯懦、迷信……一个社会居然培养出一代红卫兵，没有任何理由来要求当年的孩子来向施教者道歉的，社会不是孩子们主导的。

---

看看我们现在是怎样教育孩子的吧，  
依然是从小的假话、空话、套话，  
我们留给孩子的不仅是一个污染的生存空间，  
还有更可怕的造假、拜金、虚伪的精神世界。

---

红卫兵是有组织的，谁是红卫兵的组织者？正如战场上的集团军，下攻击命令的只有一个人或是一个组织，士兵只是这个人或是这个组织的工具而已，让工具出来向被害人道歉？那个被害人能接受工具的道歉？被害人与工具都是受害者，该出来道歉的应该是红卫兵的组织者。

---

第一，楼主只是认为校长、老师接受学生的道歉起码应该汗颜！如果一定要道歉，应该是双向的。因为红卫兵是他们十七年间有意无意言传身教培养出来的，因为他们就是没有参加红卫兵组织的红卫兵。

第二，楼主不支持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道歉，把这场全民悲剧的罪过揽到自己头上，丝毫不利于全民反思和彻底摧毁文革产生的条件。而这种产生文革的条件至今没有丝毫改变。

第三，如果道歉或者接受这种道歉，只会让真正应该道歉的罪人逃脱罪责。

---

